



革命斗争回忆录

# 忆长征

董良成著

11051

836  
4435

AGP0/25



# 征集 资料 回忆录

谢良成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10月

# 忆 长 征

黄良成 著

李永昌 插图

☆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 1/32 54印张·8插页·107,000字·印数：1 20,000 1959年9月第1次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8 定价( ) 0.65元

---

## 序

一九三三年，正当中国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反而一再屈膝倭寇，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推行最野蛮、最残暴的独裁统治，穷凶极恶地以百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红军在反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由于当时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拒绝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脱离了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指导，而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分兵把口、消极抵抗的方针，致使红军处于挨打的被动地位。因而，打了一年的消耗战，未能粉碎敌人的进攻。

为了突破敌人的“围剿”，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主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由于“左”倾路线未有得到批判，在红军退出江西以后，在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

红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到贵州的遵义。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纠正和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纠正了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脱出险境，转危为安，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之下，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迅速地将军事上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摆脱了敌人的主力，巧夺金沙江，开辟了北上的道路。然后再克大渡河天险，红军顺利到达川西北，与从川陕根据地退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一年的时间，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但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却夸大蒋介石的反动力量，对中国革命事业悲观、失望，对党提出来的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没有信心。他提出向康藏边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反对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分裂红军，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不听中央命令，擅自指挥左路军南下。由于张国焘的罪恶活动，

使紅軍遭受严重損失，特別是西路軍的失敗是紅軍史上最悲痛的事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間，我們的党，我們的軍隊得到了很好的鍛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經驗，尤其是革命战争的經驗。在这十年中，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們的党在曲折的斗争中找到了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毛澤东同志，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證，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說：“……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証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脫离了毛澤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敗，就后退……。”这是数十年来在千百次的斗争中經過反复考驗过的真理。

长征开始时，我在第一方面軍八軍团电台工作，后来調到五軍团，被張国燾扣在雪山草地，参加了悲壯的西征，在祁連山被捕入獄，一共經過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长征距今已有二十五年了，然而，在长征途中那些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紅軍不惧艰险、跋涉千山万水、忍受各种困难所創造的奇迹，却經常在我的面前出現，使我在内心燃燒着永不熄滅的火焰，鼓舞我繼續前进。很早，我就想把自己所見到的长征經歷写出来，以便鞭策自己，但是总沒有机会。一九五八年，党号召同志們写革命回忆录，这使我感到有責任把自己所知道的党的光榮历史片断、革命先輩和革命烈士們为党

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英勇斗争的事迹告诉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好让他们更具体地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让人们知道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是如何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坐牢、背井离乡、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他们在任何时候想到的只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当革命遭受失败的时候，他们不气馁，重振旗鼓，继续斗争，表现出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不骄傲，不自满，虚心谨慎地争取更大的胜利，有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通过许多革命历史的教育，使青年一代熟悉革命的历史，了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懂得今天美好生活是革命烈士和革命的老一辈用血汗培植起来的花果。从而使青年更加热爱祖国，保卫祖国，更加兢兢业业，无限忠诚于人民的解放事业，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时时刻刻保持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去完成革命先烈们的遗志，把我们的祖国更快更好地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乐园。

我写这本书，是响应党的号召，也是作为学习和通过回忆教育自己。我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动笔写作时，正巧在“文艺红旗”杂志上看到了程世才同志所写的“悲壮的路程”（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使我受到很大启示，它对我回忆西路军失败等情况帮助很大。更重要的，是今春我找到了和我一同被捕入狱，以后又一同脱险归队的难友刘玉亭同志，我们作过几次回忆和



交談，刘玉亭同志以他清楚的記憶供給了我許多可貴的材料，這對我寫“脫險歸隊”一章幫助很大。但是刘玉亭同志也告訴了我一件悲痛的消息：黨的優秀的戰士、我們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刘俊英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光榮犧牲了。我未能更多地了解刘俊英同志在長征途中的英雄模范事迹，把它寫在這本書里，我感到非常遺憾。

由於自己的水平所限，而且長征當時，我還是一個沒有脫掉娃娃氣的青年戰士，所以記憶的事件是很有限的和片面的，有些事件、地名、人名難免有出入，這裡熱切地希望同志們補充和修正。

黃 良 成

一九五九年五月于大連



统一书号：16158·58

---

定价(5) 0.65元

# 目 录

## 序

### 再見,中央根据地

- 告別苏区..... 3
- “烏龟壳”擋不住我們前进..... 13
- 負伤..... 30

### 从遵义出发

- 在遵义..... 51
- 永远怀念的政委..... 60
- 飞机掉队了..... 68
- 时針不会倒轉..... 76

### 雪山草地

- 三过雪山..... 87

草地八个月..... 101

再过草地..... 110

### 脱险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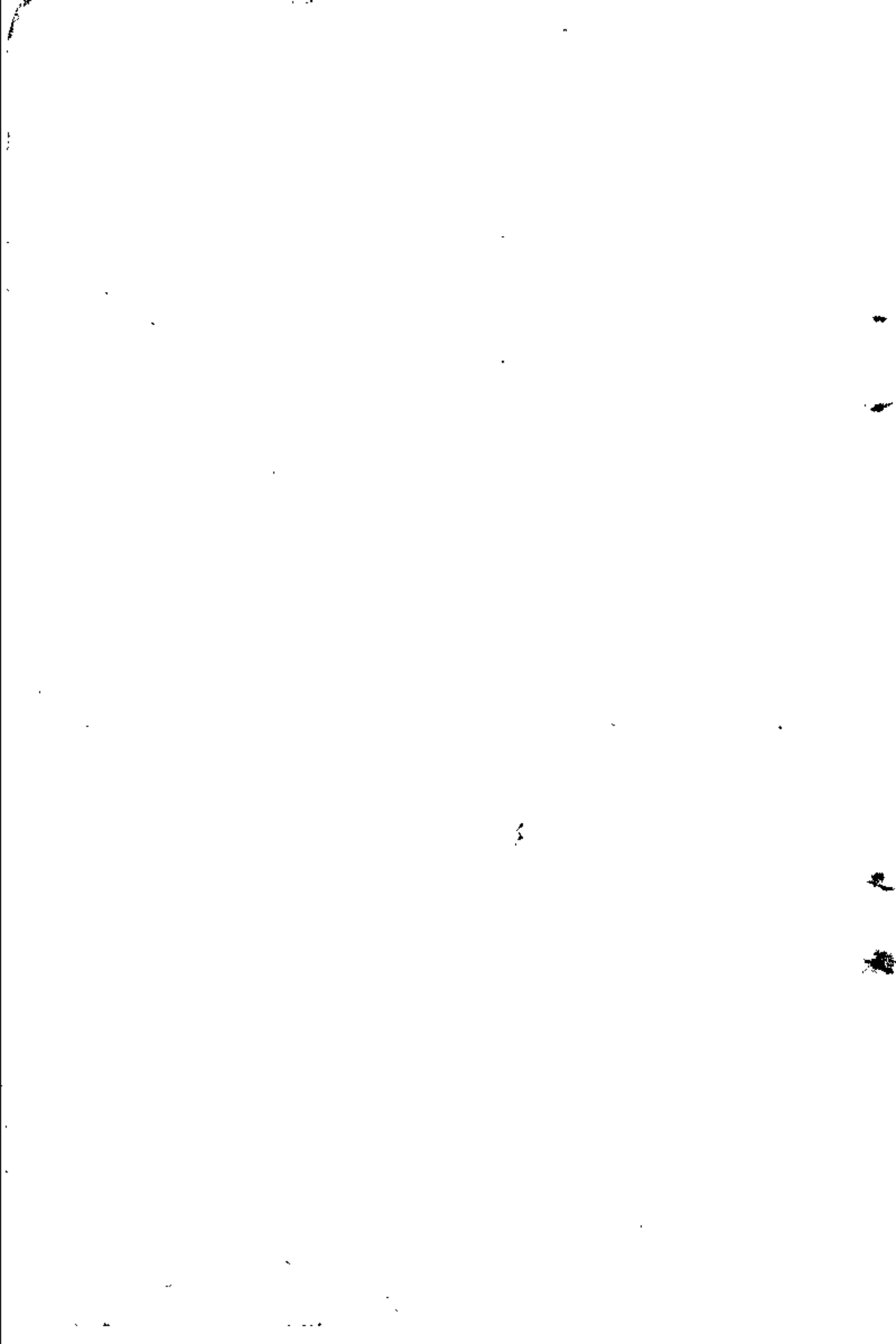
悲壮的一仗..... 123

在狱中..... 136

脱险归队..... 155

再見，中央根据地





## 告 別 苏 区

秋天，来到了江西，来到了龙口圩。秋天虽然来到了，但是却沒有秋天的气象。山，依然那样青翠，水，还是那样碧綠，天上的阳光普照，大地上的树木枝叶繁茂。

革命的根据地——江西，多么美丽可爱呀！四季草常青，八月花不謝，遍地是新生的气息，到处是欢乐的歌声。中央根据地，这是中国工农紅軍以生命开辟的乐土，那枝叶爭荣的一草一木，那如此多嬌的青山綠水，都是紅軍的鮮血所澆灌。中央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搖籃。它是照耀中国亿万苦难人民的一顆紅星，它时刻被全中国人民所怀念，它象一顆种子埋在田里，时刻在发展、壮大。

江西呀！你就是中国人民的母亲，紅軍战士的母亲，因为共产党和毛主席就住在这里。为了建設你，劳动人民不怕千辛万苦，辛勤劳动，为了保卫你，紅軍战士不惧流血牺牲，英勇奋战！

然而，近一年来，江西的上空却籠罩着烏云，隆隆的炮声，隱隱地傳來，硝烟在四周弥漫，白天，敌机三五成群，在空中来回窺扰。人們的心头遮盖上了一层暗影。紅軍战士們一个个擦拳摩掌，注視着那烽火連天的西北方，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圍剿”已經打了一年了，但是由于軍事行动上的“左”傾錯誤，不但沒有粉碎“圍剿”，而且中央根据地越来越小了。

但是，英雄的苏区人民和紅軍战士并没有叫敌人吓倒。人們冒着敌机自晨至晚的輪番扫射轟炸，在山崗上，在田野里搶收着庄稼；入夜，田野沸騰，大地里劳动歌声四处飞揚。

十月十七日，第一方面軍八軍团供給部里显得空前熱鬧。斗笠上插滿青枝綠叶伪装的战士們，来来往往，絡繹不絕，前来領取剛从后方运来的物資。

我們无綫电队的管理員徐世太同志也比往常格外兴奋。他精神十足，卷着褲腿，打着赤脚，笑咪咪地亲自扛上扁担，帶領各班派出的战士向山后东村——軍团供給部駐地走去。不到两頓飯的工夫，挑着一包一包的東西回来，堆放在队部住的院子里。战士們惊奇地問徐管理員：“領的什么东西呀？”

“棉衣，嶄新的棉衣。”管理員笑咪咪地回答。

“啊！现在就发棉衣啦？”“单衣怎么还不发？”

“有。这次，什么都有，就怕你背不动。”管理員更加兴奋起来，一面用挂在朱紅色小皮带上的布巾擦着額上的汗珠，一面叮囑司号員小朱：“看住，不准他們乱动，等我領完东西回来再发。”



說罷，把扁担往肩上一扛，又往供給部走去……。

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把我們困在蘇區里，戰鬥打了整整一年。國民黨嚴密的經濟封鎖，確實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困難：戰士們身上的子彈幾次被收回，補充給戰鬥連隊，現在只有三、四排了；夏衣至今還未發下來，仅有的兩件單衣，已經破爛不堪了。但是，奇怪，突然間卻發來這麼多東西！同志們惊奇、興奮地望着院子里一堆堆的東西便議論開了：

“今年的棉衣送來的真早呀！怎麼單衣沒發就發棉衣呢？沒料到後方物資準備得這麼充分，天沒冷，棉衣就來了。”

“有後方人民的全力支持，可不愁過冬啦！”

“後方工作做得太好了，現在該看我們的啦！”

“噯，你們知道嗎？為什麼後方工作做得這樣漂亮，要兵有兵，要糧有糧，要穿有穿呢，是誰領導的？我告訴你們，這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一個剛入伍不久從瑞金來的新戰士吳宜榮津津有味、自問自答，好像只有他最清楚後方情形似的說。

“有毛主席領導，和後方的全力支持，我們又有堅固的工事，現在又送來這許多彈藥，不管天上来多少飛機，丟下多少炸彈，國民黨來多少人、打多少炮，也攻不破我們的陣地，攻不破我們保衛蘇區的決心！”七班長魏井田滿臉笑容地說。

大家還在樂呵呵地談論的時候，晚點名的號音響了，隊伍集合在隊部門前的小廣場上。值星排長清點了人數，便開始分發棉衣。

一個個興高采烈，抱着又厚又結實三面新的棉衣回到自己

的住处，在一閃一閃的茶油燈光下試着自己的新裝，不合身材的忙于尋找調換的對象。當時我才十八歲，是我們隊部最年輕的一個。徐管理員知道我的身材矮小，特意給我留了一套小號的，我穿上正合身，不長不短，不大不小，象是量身做的，我快活地蹦跳起來。

同志們正在噦噦喳喳評長論短的時候，又來通知各班派人去領東西——草鞋和布鞋、包腳布、米袋子和挎包等等。

一個晚間大家都變成上下一身新，就象剛入伍的新戰士一樣整齊。

南方的初秋，天氣還很熱，遍地還是青枝綠葉，少先隊的小鬼們還在河田里捉魚蝦呢！天氣是那麼炎熱，前天，喜歡游泳的袁邦光政委還拉我去河潭里痛快地洗了一個澡。誰也不希望在這個時候發下笨重的棉衣，怕它成為打仗和行軍的負擔。

“管理員，我現在還不穿，先存放你這裡。”通訊員李吉祥小鬼向管理員請求。

“報告管理員，我有毛絨衣，冷不着，棉衣暫寄存在你這裡。”監護班的副班長王子云也提出同樣的請求。門外還有一些人拿着棉衣在門口等待，看看小李和班副的請求是否被允許。

“同志，你們說說看，你不要，他不要，上級叫發干什么？快拿回去，不穿也自己保存。”管理員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又說：“快回去，打好背包，明天還要檢查。”

戰士們正在忙着捆扎自己的新裝的時候，又傳來去領子彈的命令。這比領棉衣更加使人興奮，大家一擁而去，一時隊部顯

得格外狹小，里里外外擠滿了人群。有經驗的老戰士吵吵嚷嚷要求多发点子彈和手榴彈。因為他們懂得：打起仗來，要多消滅敵人，就需要有充足的彈藥。對勇敢的紅軍戰士們說來，槍的“糧食”常常比人的糧食更重要。然而，這次却出人意外，不是怕發少了，而是怕你背不動。上級決定：不論戰鬥員或非戰鬥員每人都發四十排我們自己兵工廠重新翻做的子彈和兩個到四個木把手榴彈，想多要的還可以多发。個子高大、身體魁梧的七班長魏井田一個人就領了六十排子彈和六個手榴彈，把子彈帶、挎包塞得鼓鼓的。他興致勃勃地說：“一九三二年我正在五軍團，打水口時候，當沖到敵人的工事里，正想狠狠地消滅敵人，可是子彈打光了，沒有辦法，只好和敵人拼大刀。這回，我可不會吃這種亏了，別的東西丟掉我也要子彈。如果再打仗，哼！這可要打它個痛快，敵人只要敢來，我就好好地叫他吃個飽，送他媽的回老家去！”

過去，發彈藥，總是嫌少，爭爭吵吵，甚至埋怨分的不公，這次，一個個笑咪咪地象飢餓的人得到一頓豐餐飽食一樣喜笑顏開。

在根據地里大量分發日用品和彈藥，以往是從來沒有過的。這種不平常的現象既使人興奮，又使人驚奇！為什麼一下子就發这么多的東西呢？難道要打大仗了嗎？或者有什麼新任務？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就要離開根據地。因為每一個紅色指戰員始終堅信黨中央的號召：堅決消滅敵人，堅守寸土，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的神聖任務一定能夠實現。每一個人都抱著“與蘇區共存

亡，为保卫苏区而战，为保卫家乡而战！”随时准备反攻的决心。

十月十七日夜里，无线电台的马达声通宵达旦，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划破了沉睡的夜空。我们报务员们，轮换地在马提灯光下低着头，在收报纸上抄收军委万万火急电令。那时，我在八军团电台担任报务主任工作，为争取时间，来不及在收报登记簿上登记，便派通讯员将电令一页又一页、一份又一份地跑步送到军团司令部去。

天还没亮，司令部各单位已经十分忙碌起来，电话铃不断地在响着，通讯员四处奔跑。出发的命令迅速地传达到所有部队。战士们以为日夜盼望的反攻机会到了，精神奕奕，满脸笑容，同声高唱着“高虎脑、万年亭〔注〕，我们胜利了”的歌儿，希望再来一次高虎脑、万年亭战斗。到处在擦枪，捆行李，送家具，进行着战斗前的一切准备。

太阳已经偏过头顶，下午二点，政治部在驻地后面一块小竹林里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紧急会议。政治部副主任传达了军委的转移阵地的命令，强调向等都转移是为了使主力转移到更有利于打击敌人的方面去，是为了机动作战，为了最后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

政治部副主任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

〔注〕 高虎脑、万年亭均在江西广昌县南，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红军在这里组织了顽强的抗击战，打死打伤敌人四千多人。

第一，要向指戰員解釋轉移的意義。使全體指戰員都知道轉移是為了尋找有利機會消滅敵人，不是消極地退却，而是積極地保衛蘇區，為了新的勝利。

第二，要切实檢查群眾紀律。借用群眾的東西，一定要送還，損壞了的——一定按價賠償。門板（鋪板）要上好，房子要掃淨。

第三，保守軍事秘密。夜行軍不要掉隊，要注意派人前後聯絡。還要注意鞏固部隊、鞏固新戰士的工作。

時間是那麼倉促，除了各單位分別進行內部動員之外，已經沒有時間和群眾召開告別會了。鄉親們知道我們要走，有的煮鷄蛋，有的做餅子。婦女們拿出剛做好的布鞋，往同志們的挎包里塞，並一再叮囑：“同志，早回來啊！”

一位七十多歲白髮蒼蒼的紅軍家屬鍾老公公向我們囑咐道：

“同志，我的大孫子叫鍾金堂，是前年九月參加紅軍的，上月還來信說，在一軍團第四團二營工作（其實老公公已給我們講過幾次了），你們見到他，給挨（我）捎個口信，說他的爺爺要他聽領導的話，好好打仗，消滅老蔣。屋家嗎格（什麼）都好，唔愛（不要）挂念。”袁政委住的那家女房東、五十多歲的媽媽鍾王氏，從屋裡顛巍巍地沖出來，一手拿着媳婦剛剛做好的兩雙布鞋，一手提着籃子，氣喘喘地向我們集合場走來，遠遠就喊道：

“政委、政委慢點，我有話說。政委，這一雙給你穿，這一雙嘛，托你帶給清榮，他在三軍團偵察連當班長，告訴他，這是他媳婦做的。見不到嘛，嘿，你就分給同志們穿好了。”袁政委忙把自

已挎包上吊的两双新草鞋由背后挪到面前指着說：“媽媽，你看，我还有两双新的……”不待政委說完，媽媽搶着說：“不，鞋还怕多，走路、打仗沒鞋哪行？”政委开始想謝絕媽媽的盛意，但后来他被媽媽这颗善良、真誠的心感动了，只好接过鞋来，并表示一定想办法交給她的清荣。这时媽媽才笑咪咪地說：“这才是。”接着从她那深陷堆滿皺紋的眼角上落下几滴热泪，放开政委的手說：

“你們去吧！消灭了刮民党、蔣該死可快回来啊！”

“我們一定会回来，媽媽，你放心吧！”同志們异口同声地回答。

斜阳的余輝漸漸消失，太阳沉沒了，阴暗开始籠罩着天空。出发的軍号声响起来了。

今天的軍号声特別洪亮有力，它激动着人們的心弦，震蕩着整个山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响亮的軍号声，誰知道它就是长征的开始曲！誰知道它就是离别故乡之歌啊！誰又能知道今晚的行軍就是远別家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起身啊！

軍区前来接防的同志、当地干部、紅軍家屬、老大爷、老媽媽、妇女和儿童团的小弟弟、小妹妹們一村接一村的站在路旁，热情地向我們招手送別。我們每一个同志也同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揮着嶄新的紅色五星軍帽向父老姊妹們喊：再見，再見！我們边走边回头看，誰不想多看几眼慈祥的父老、天真可愛的弟弟妹妹啊？我們就这样离別了住了两个月的龙口圩，奔向征途。

这就是二十五年前我們第一方面軍第八軍团离別毛主席、

朱总司令领导我們經過千辛万苦建設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兴国县，动身开始长征时的情景。

这就是由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違背了毛澤东同志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单纯防御的軍事路線和其他錯誤政策，結果紅軍在苦战一年之后仍然不能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不得不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突圍长征。

为了不至于暴露部队的行动目标，避免敌机的偵察和轟炸，如同以前每次轉移陣地一样，一开始便是夜行軍。前半夜的行軍，队伍井然有序，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尽管每人肩負数十斤的行装和武器，还是精神焕发，目光炯炯，雄赳赳，气昂昂，健壮而整齐的步伐不快也不慢。可是，到了后半夜，夜风清凉，使人感到有几分秋意，夜靜无声，这时大家都有点疲倦，真想睡上一觉。“不要掉队，跟上”的傳遞口令声，催促大家繼續向前。前头的队伍队形开始紊乱，出現几路縱队，时而并肩前进，时而又穿梭似的交叉着，弄得忽而停脚不前，忽而又跑步追赶。这时，后头往前傳來：“伙食担子掉队了，前头走慢点。”隔一会前头往后傳來：“跟上，不要掉队。”“派人联络，叫伙食担子跟上。”經過一陣緊張的插队之后，队伍又恢复了正常的行軍步伐，汗漬浸透了新发的衬衫，气喘喘地繼續前进。

因为在根据地行軍，如象散步在自己的快乐的园地一样，可以歌唱，可以談笑吹牛，自由地討論一切。平常話多爱吹牛抬杠的管理員徐世太同志自言自語說：



“他媽的，五次‘圍剿’打了一年了，蔣介石把吃奶的勁頭都使上了。差不多啦，蔣介石倒霉的時候應該到啦！逼得我們也不能再退了，這次的行動看樣子是大反攻的時機到來了。”

平時寡言善思的文書李忠同志這時插嘴說：

“我看是要打贛州……”

他的話沒有說完，好搶話的報務員老溫不同意李忠的估計說：

“不，看樣子是打韶關，或者再來一次水口之戰，讓廣東軍閥再尝尝紅軍鐵錘的厲害。”你一言、我一語興奮地談論行動的目的。總之，往粵都方向集結，顯然是向西或西南反攻的象徵，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

正當月落星稀話味濃的時候，不知從哪兒傳出來一個振奋人心的消息：“紅星（中央軍委直屬機關的代號）也來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都來了。”一個個忘記了保守軍事秘密的約束，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各單位都知道了，同志們都知道了。

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名字平時在同志們的思想中是愛和慈祥的化身，今天却好象一服劇烈的興奮劑，使人精神奮發，笑逐顏開，目光炯炯，腳步輕快，行軍的速度加快了。

是的，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第五軍團、第八軍團、第九軍團等全部主力和中央直屬機關一共七萬多人全都來了，這是一支浩浩蕩蕩、史無前例的長征英雄隊伍。

## “烏龟壳”擋不住我們前进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紅軍第八軍团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从江西兴国县龙口圩附近动身，随中央梯队之后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轉移——长征。

十月二十日傍晚，月亮徐徐升起，射出淡淡的微光，秋天的凉风，輕輕地扑在人們的臉上，吹散着額上的汗气，身上打着寒噤。二十三师还正在渡河，軍团的直屬机关停留在零都河边候渡。靜悄悄的河床，今天却在欢笑。这儿齐声喊着：“欢迎政治部唱歌！”那儿响应着：“我們也同意。”政治部的歌声剛剛落下，又有人高声叫喊：“唱的好，唱的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要！政治部再来一个！”“政治部再来一个！”洪亮雄壮的声音回答着。歌声、喊声、笑声震动着山谷。

几十只笨重的平板木船来回穿梭着。船工們为了把自己的軍隊尽快渡过河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圍剿”，格外加力，搖动着木

橈发出吱吱的响声，把河水卷成一个一个旋渦。数万紅軍英雄就在这一船一船渡过，战士们輕捷地跳上对岸，踏上征途，去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过了零都河，一直向西南方向前进。零都城里螢火似的灯光漸漸地消失在山崗后面。我不断地回过头去遙望那曾住过四年的第二故乡——江西革命根据地，不由得产生恋恋不舍但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經驗使我們懂得：这是要暫时的离开根据地，到敌后寻找有利机会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圍剿”啊！

走了两天，便到了白区，看見已經被前头部队打得稀烂的敌人的“烏龟壳”（碉堡）真是开心。这些“烏龟壳”現在反而成了我們的有用之物。每到一個宿营地，大家都到村外碉堡里，拆下木料用来做飯燒水。

在二十二日的行軍途中小休息时，政治部的宣傳員站在田埂上，向同志們报告胜利消息說：

“同志們，蔣介石想用封鎖政策，困死我們，消灭我們。可是，敌人的‘烏龟壳’已經被打破，我們的老大哥一軍团在信丰、安远之間粉碎了广东軍閥陈济棠防守的封鎖綫。一、三軍团已經过了章水，正向敌人追击中。我們要坚决打掉敌人的‘烏龟壳’，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圍剿’。”我們听到这一胜利消息之后，心情沸騰了，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庆賀。宣傳員繼續鼓动，高声喊：“同志們，加油呀！不要掉队，今天的行軍路程有八十五里，为了粉碎敌人的‘圍剿’，打更大的胜仗，大家来个行軍比賽，看誰走得快，最先完成今天的行軍任务！”

在胜利消息鼓舞之下，个个斗志昂扬，精神奋发，笑容满面，歌声四起：

党领导我们反“围剿”，  
人民拥护力量多，  
红军打仗真英勇，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

唱起歌儿来，我们的两条腿，就象胶皮车轮打足了气似的格外有劲。行军比赛开始了，步伐逐渐加快。下午三点多钟就到达了宿营地——王母渡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报务员李耀先同志，害了三个月痲疾，身体十分虚弱，组织上决定他留下来，到后方医院休养，可是他怎么也不肯，坚决要随部队行动，在今天的快速行军中，他却格外兴奋，紧紧跟随着，和我们一起到了宿营地。今天没有一个掉队的。

一年多没有来过白区了，没有打过土豪了。今天，政治部没收了大地主兼反动民团团总钱某的财产，把大批的粮食、衣物分给了当地的群众，我们单位也领到了一口大肥猪、五只鸡。炊事员们的动作比往常更加迅速，做饭的做饭，炖肉的炖肉，不到一个半钟头便吹开饭号了。

吃过晚饭，我们在一个逃跑地主家的院子里，召开了党、团员大会，也算是庆祝会。会上政治委员袁邦光同志报告了目前

形勢和粉碎敵人封鎖綫的重大意義之後，特別向黨、團員提出四項任務：

第一，黨、團員要在行軍戰鬥中以身作則，起模範帶頭作用，吃苦在先，克服困難。發揚高度的階級友愛精神，幫助年老體弱和有病的同志完成行軍任務，保證行軍不掉隊，爭取成為鞏固部隊的模範單位。

第二，每人每天必須寫三條標語（用木炭、石塊、粉筆、鉛筆、毛筆寫在牆上、路上、地上都可以），並積極向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護群眾利益。

第三，每到一地，人人調查社會情況，了解人民生活。每個黨、團員一個月內要完成擴充一名新戰士的任務。

第四，遇到困難，黨、團員都要做解釋工作，每天分別向小組長或支部匯報自己的工作情況和戰士們的思想情況等，以便黨、團支部及時掌握情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黨、團員都愉快地接受了黨的任務。走路時總是你搶我奪地幫助別人背米袋、擡擡包；帶頭唱歌、歡笑，活躍氣氛，減少行軍疲勞；到了宿營地，自動地担水燒水做飯，讓戰士們先休息。如果遇到飯不夠吃，總是讓同志們先吃飽；晚上站崗值班盡量使旁人多睡點覺……。我們報務員雖然組織上為了照顧我們夜間工作，規定有兩匹馬，但都不騎馬，自動讓給病號騎。由於黨支部的領導，黨、團員的模範作用，鞏固地團結着全隊的同志，我們的無線電隊，從江西到湖南沒有一個掉隊的，成為鞏固部隊的模

范单位，曾得到政治部的通报表扬。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过了章水，大军指向粤汉铁路。这时，红军已不是两个拳头打人，而是集中主力，一线突破。大军所至，锐不可挡，号称铁军的广东反动军在红军面前吓得屁滚尿流，闻风而逃。蒋介石及其顾问们以为红军主力将侧击江西南部重镇赣州、吉安，故将西线之主力急忙调回保赣保吉。担任南线进攻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被打得丢盔掉甲，狼狽不堪。陈济棠既怕红军打入广东，更怕蒋介石这个一贯寻机消灭“杂牌”的独裁者以追剿为名把嫡系部队开进广东，夺去他盘据的称王称霸、榨取民膏的宝地。陈济棠为求自保，将其主力集结韶关、南康一线，坚守粤北大门。于是，不得不削弱向西入湘走廊的防守，而使红军顺利地进入湖南南部。

十一月初，我一、三军团又在汝城、桂东间突破了湖南军阀何健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从此，敌人“消灭红军于江西”的企图已成了泡影。蒋介石在南昌大发雷霆，拍桌痛斥陈济棠、何健是“饭桶”。当时我们队里的一个文书这样唱着自己编的小调：

你“饭桶”，他“饭桶”，法西斯蒂最反动。

蒋是狼，陈是狗，狼狗本是同一宗。

你逞能，他逞凶，不过都是老狗熊。

谁好汉，谁英雄，红军赛过赵子龙。

蒋介石不但饭桶(反动)，而且昏庸，并不比陈济棠、何健高明多少。当红军破汝城、桂东之后，蒋又错估我军将攻其衡阳，威

防长沙，将主力布置在耒阳、安仁一带防我軍北进。

我軍繼續向西挺进，十一月中又突破粵汉路，入湖南南部后，占宜章、桂阳、临武、嘉禾等城，粉碎了敌人第三道封鎖綫，敌人工事全毀，堡垒尽弃，守軍狼狽北逃。蒋介石花了几年工夫，耗尽劳动人民血汗在根据地周圍构筑的縱深林立的碉堡，完全被我軍打得稀烂，“烏龟壳”絲毫也挡不住我們的前进。

突破了敌人封鎖綫，到达湘南，确实使人快乐兴奋。今天占宜章，明天占嘉禾，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捷报雪片似的飞来，群众又那么热情，沿途摆满茶水、糕点，成群結队地欢迎紅軍。

湘南的人民在大革命前后，曾受过革命的深刻影响，党在这一带进行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在这里打过游击，坚持过斗争，领导人民分过土地，建立过人民自己的政权。这里的人民曾一度自由地生活过，人民怀念着紅軍。党与紅軍和湘南人民有着深厚的血肉相連的关系。但是，几年来，蒋介石、何健白色恐怖的統治，残酷的屠杀，使湘南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中。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他們頑强地斗争着，他們怀念着紅軍，他們坚信紅軍一定要回来的。果然，今天紅軍又回来了，湘南人民以满腔热情来欢迎自己的队伍，向紅軍控訴反动派的罪行。許多青年一看有了为家人复仇雪恨的机会，都紛紛自动前来参加紅軍。

一天，下午四点多鐘，我軍解放了嘉禾城，我們无綫电队住在一个紅門大院里，連忙架起天綫工作。“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从耳机傳到大院里。我正在值班，一群青年男女象看西洋鏡似的



圍滿了整個院子，后来越圍越攏，把我緊緊地圍起來，妨礙了我們的工作。我喊門口的哨兵讓他們出去，但哨兵怎么也勸不走他們。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青年倒理直氣壯地說：“同志，我們看看有什麼關係。”袁政委走過來，想維持一下秩序，見那個青年膽大，無拘無束，就拉他到房子里親熱地談起來了，孩子們都被政委那腰間掛著的手槍吸引去了。

我六點鐘下班，吃過飯，到政委那里匯報工作，一進房，聽見政委問幾個青年人：“你們不怕吃苦？家里能讓他們走嗎？”看飯桌上還有四雙飯筷，我明白了，原來政委在擴軍呢！他們的談話要結束了，見我進去，青年起來告別，走到門口還說：“我們一定來。”政委握住我的手，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黃主任，今天一下午我們就擴充了五十多個新戰士，他們都堅決要求參加紅軍，其中很多人的父兄，是被國民黨無緣無故殺害的，他們和敵人有不共戴天之仇，這一帶的群眾條件太好了。”我半信半疑地問：“一次就擴充了五十多？”政委肯定回答：“已送到政治部三十五名了，還有二十多名，明早一定來。”

第二天一早，隊伍準備出發了，果然，二十八名青年背著自己的小背包來到政委的面前，參加了我們的行列，成為我們親密的戰友。一路上大家爭著問長問短，昨天，站在院子里那個膽大、氣壯的青年，後來在隊里當文書的江華同志告訴我說，他是嘉禾第二中學的學生，父親和哥哥均在一九二九年被國民黨以共黨分子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去殺害了。他說：“早就想為父親報仇，一直沒有機會，你們來了，我才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到了一个休息地，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样写着：

等天亮，盼天亮，太阳终于出东方，  
夜虽长，不算长，夜长哪能不天亮。  
父屈死，兄冤亡，凶犯必须把命偿，  
仇要报，恨要消，跟随红军把兵当。

我们告诉他：你的仇也就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仇，只有打倒蒋介石报了这个大仇，才能报了你的仇。他听了我们的话，点了点头，大步向前走去。

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好象冲出了铁笼的鸟儿，自由歌唱、飞翔。这时使我们回想起在毛主席、朱总司令正确领导的时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红军一天比一天地壮大，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地巩固和扩大。但是，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错误地采取单纯防御，把红军的手脚牢牢地捆在工事里，和敌人拚消耗，子弹越打越少，困难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想到这里，同志们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当红军继续把矛头指向湘桂边境，西进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忙由长沙、衡阳、桂林急调三十万兵马来绕至我军前面，利用湘江、肖水构成新的封锁线，企图堵截红军西进之路，再一次梦想消灭红军在湘江以东。

当时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前有江水，后有追兵，上有飞机，下有土匪（“罐共团”）；红军面临着万分危急的堵、截、追的困

难。这是离开根据地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严重关头。“必须突破敌人的堵截，必须粉碎敌人的最后的封锁线，必须抢渡湘江背水”，这是摆在红军面前的艰巨任务。

三军团和教导师在前面边打边走，中央梯队随后奔向湘江，为掩护中央主力过江，一、五军团在全州、汝市一带与追来的敌人周浑元、吴奇伟、白崇禧、何健等部发生激烈的战斗。这是离开江西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打的大仗、硬仗，又是在敌众我寡，没有工事，没有后方和群众支援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的被动仗。打了五天五宿，虽给敌人以巨大的杀伤，但我军亦伤亡甚重，一直到完成了掩护任务才撤出战斗，奔赴湘江。

我们第八军团由永明已进入广西灌阳，因为整个战斗部署改变，又折回道州而西，故一度和主力脱离“掉了队”，前后受敌。为了追赶主力，我们不顧疲劳和敌机轰炸，边打边走。忍着飢餓，日夜兼程前进，五天五夜急行军，终于在全州附近追上主力，和五军团三十四师会师于水车村。经三十四师转来军委火急电令：“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争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情况万分紧急。一、五军团在完成掩护中央直属机关过江的任务后，已撤出战斗向湘江跑步前进中。九军团在我们前面，只有五军团的三十四师留水车掩护全军渡江。我们便于早晨四点从水车先于三十四师出发了。水车距湘江渡口约二百四十里，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到。这是艰巨的任务。

政治部的干部们、宣传员们站在部队通过的路口田埂上，

向着川流不息的战士们喊话鼓动：“同志们，我们已经赶上了主力，但是，敌情仍然十分严重，敌人动员了三十万军队想阻止我们前进，想要在这里消灭我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粉碎敌人的‘围剿’，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志们，主力已经胜利地冲过湘江，军委命令我们必须明天这个时候渡过江去，不然，我们就有和主力脱离的危险。”最后他又提高嗓门大声喊道：“同志们，再辛苦一天，过江就是我们的胜利！胜利就在前面！”

经过五、六天的急行军，战士们都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吃饭也是边走边吃，眼睛都已经熬红了，但一听了“再辛苦一天，过江就是胜利”的鼓动之后，大家加快步伐，气喘吁吁地小跑前进。

走了二十来里，东方刚放出晨曦，雾气蒙蒙，敌机便“上班”来了。司号员照例吹“滴滴滴答答答”隐蔽敌机的讯号。

“他妈的，真早呀！”我们狠狠地骂着。但估计敌机还看不清楚目标，部队没有停止，继续前进着。

一阵嗡嗡声，敌机又来了，人们离开了大道。过了十几分钟飞机又回来了，又照样散开隐蔽起来，这样前进，隐蔽，再前进，再隐蔽，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多钟才走了四十多里。

政委利用短短的隐蔽时间，在道旁的沟里把党、团支部书记和各排排长等召集在一起，研究今天艰巨的行军任务，决定我们报务员跟随收发报机帮助运输员不要掉队，并由党支部书记赵玉魁带领李连城、朱正彬、高华和何昌平等组织成收容队，负责帮助走不动掉队的同志，并把他的马也交赵玉魁，以便收容病号，

要保証过江不丢人，完成渡江任务。

太阳挂在头顶，大約是十二点多了。两架牛一样笨大的敌机又出现在天空，它的螺旋桨转动得越来越慢，它从高空俯冲下来，嘩啦一声，一股巨风将道旁的一排梧桐树刮得直摇摆，接着便是震耳欲聾、巨雷般的轟响，烟尘滾滾，彈片横飞，敌人对我们开始了野蛮的轟炸。就在这短短几分鐘内，敌人又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們的三十几个同志牺牲了，不少同志負了伤。我們含着热泪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摘下五星軍帽，默默地向烈士們表示吊念。一个个冒着憤怒的火焰，怀着复仇的心情攙扶着伤员又繼續前进了。

走了不一会儿，从水車方向傳來战斗的枪声和炮声，由远而近。

后面的三十四师和追来的敌人发生战斗了。为了使三十四师減輕負担，我們必須迅速前进。于是，司令部发出跑步前进的号令。我紧跟着挑收发机的运输員吳宜荣，他累了，我換他，我累了，他換我，不顧飞机低空轟炸、扫射，我們抱着“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冲过江去”的决心，跑步前进。敌机尽管杀伤我們一些同志，但决不能阻止我們完成渡江的决心。

由于飞机的轟炸和“簍共团”的干扰，行軍效率不能不受到影响。一天过去了，只走百里左右。同志們的肚子实在餓极了，更加疲倦无力。

微紅的太阳已經掉下山去，天色蒼茫，黑夜已經來臨，敌机也回巢去了。黄昏时候，我們赶上了九軍团，在一个村庄里碰上

了头。我們在村外路事休息一陣，整理一下草鞋，沒有做飯吃，系紧褲腰帶，又繼續前進了。

出村不遠，在前頭矮矮的小松林山崗上，發出“拍拍拍答答答”的槍聲，敵人又向我們射擊。子彈從頭頂嗖嗖地飛過，山石被打得四處飛揚。司令部的通訊排長和譯電員小劉負傷了。敵人突然襲擊司令部，直屬機關的勤雜人員不免有點慌亂起來。奇怪，九軍團剛剛過去，哪來的敵人占領了山頭，攔住了去路呢？為了弄清情況，隊伍暫時停止前進，在路旁休息着。田里的青蛙聲消失了，人們的臉上浮現着憤怒、緊張的神情。

戰鬥部隊在後面沒有趕上來，司令部和敵人發生了遭遇，不得不進入自衛戰鬥。

軍團參謀長親自領着“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軍團偵察連，衝向槍聲拍拍拍的山頭；作戰科長也提着盒子槍帶領通訊排、政治部的政衛排和無線電台的監護排迅速地沿着一條小路插到山後，對敵採取包圍的形勢。過了八、九分鐘，山樹上殺聲四起，一場激烈的戰鬥打响了，輕機槍、步槍、駁殼槍和手榴彈响彻天空。偵察連的戰士都是久經戰鬥鍛煉的老戰士，一說打仗，個個眼睛里冒着怒火，手提着快慢機和馬刀猛衝上去，敵人原來以為我們是一些落伍掉隊的，沒料到我們的戰士象一股巨流衝殺上去。敵人阻擋不住便向山後退却，這時，作戰科長帶領的三個排由山後往上衝去，退路也被截斷，我們上下夾攻，敵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打死的不少，沒死的一個個跪在地上，高舉雙手，大喊饒命。

一場戰鬥勝利地結束了。我們犧牲了三個同志，繳獲了七

十多枝枪，捉到五十多个俘虏。从俘虏口供中了解，他们是全州县的“镰共团”，从县里赶来阻拦和捕捉红军掉队人员的。他们的团总在战斗一打响时，就被侦察连送到阎王殿去了。

战斗胜利了，前进道路的障碍扫除了，我们押着俘虏又继续前进。当我们路过山头时，在夜色朦胧中，看见敌人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地躺在那里，一个肥头大耳、穿着马裤的家伙象倒栽葱一样脑袋朝下躺在路旁，脑浆流了满地，这就是在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面前称王称霸，一碰到红军就变为丧魂落魄的“镰共”团长。

黑夜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机会。但是急行军几天了，今天，又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司令部又传出“跑步前进，不要掉队”的口头命令。我们为了不被敌人截断，必须冲过湘江，不得不忍着饥饿和辛劳，人不停腿，马不停蹄地向湘江驶进。

红军战士向来都是不怕困难的，在任何时候都充满着愉快、自信、坚毅的精神，不说怪话，不发牢骚。但是现在，饥饿有些使人支持不了，通讯员李吉祥小鬼半玩笑地说：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软丢当。我看得休息一会儿，弄点饭吃，再走起路来不是更快吗！”

“说我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倒不假，但总有点普通材料呀！都是妈妈养的，不吃饭哪能行。”另一个通讯员赖清枝俏皮地说。

“情绪可以鼓励，精神可以振作，没有东西装进去，肚子可鼓不起来。”运输员老温接着说。

“你不会往里装嗎？米袋子作什么的！”一个战士气冲冲地反問了他一句。

“是呀！米袋子作什么的？”米袋子，这一声却提醒了叫餓的人。这一合理化建議馬上被推广，吱嘎吱嘎嚼吃着大米，凉水将它送进肚里。可是牙根发酸了，两頰发痛了，肚子却不飽。真是杯水車薪，无济于事。

我正在考虑如何鼓励同志們的情緒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我肩头一下，我回头一望，原来是袁邦光政委，他滿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后面跑上来。他問我：“同志們情緒怎样？”我說：“情緒还不错，就是想弄点飯吃。”这时，政委大声說：“同志們，我們不休息，要克服困难，餓了，吃米袋子里的米，无论如何不要掉队，在困难的时候，更要坚持，赶过江去再休息。”經政委这样一說，大家也就不再提了。

黑夜那么靜悄，只有唧唧的虫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人們忘記了一切，只有“二十四小时过江去，否則被敌人截断”的警告声还在耳鼓里回响。前进，繼續前进，刻不容緩，乘敌机“睡覺”了赶过湘江去。这是同志們唯一的願望。

星月皆无，天地黑成一团，道路高低难分，个个手持一杖，跌跌絆絆地前进着。近視眼的老朱两次跌到沟里，弄得渾身泥水，我們特意开他的玩笑：“怎么，想找宿营地啦。”

拂曉了，东方渐渐发白，队伍稀稀落落地繼續前进。年岁較大、体力不支的同志和肩負重担的运输員、炊事員們都掉队了。跟上来的同志也已疲憊不堪，个个眼睛通紅，好象患了严重的沙



眼似的，歪歪斜斜地站立不穩。有的脚底打起水泡，但仍然忍受劇痛，一跛一跛地走着；有的干脆卧在道旁，在那打起鼾聲。也有似睡又走，閉合着眼睛兩脚不協調地移動着的，跌跤者為數不少。一個炊事員却個別，扛着大鍋鏟停立在道中間，站着就睡着了。我踉踉蹌蹌地走着，边走边睡，“拍”的一聲，我的前額正好碰在鍋鏟尖上，立即起了個球狀青包。

“噯！你怎麼不走呢？睡覺不會一旁去，真糟糕！”我埋怨地責備炊事員同志。

“啊！你沒有看見我站在这里？我後面沒長眼，你前頭也沒長眼睛？”炊事員同志反問了我一句。

我心想：是呀！怎能怪他呢？我只好說：“好吧，別睡了，伙計，快走吧，趕路要緊。”我倆提起精神一同前進了。

軍委限我們渡江的時間已經過去。但是距湘江渡口還有六十里路。六十里，說來並不遠，如果按照紅軍正常的行軍速度，抬起“飛毛腿”，只要三小時左右完全可以跑到。但是，這時比走六百里還難啊！一個個都已疲憊不堪，腳上象是綁着鉛塊，特別沉重。儘管陽光刺目，眼簾還是不由地垂下，“辣椒洗臉”也無效用，肚皮前後粘在一起，餓得發痛。已經精疲力竭了，但是大家還堅持着走，走，走！只有紅軍，只有共產黨教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才能這樣無比頑強，以最大的毅力，克服極大的艱難，取得渡江的勝利。

下午兩點多鐘，我和司令部的一些同志終于勝利地抵達麻子渡，望着悠悠向東流去的湘江，禁不住歡呼起來：我們勝利了，

共产党万岁！紅軍万岁！

江面只有一百米寬，水深及腰，流速虽快，但能够涉水过江。啊！我們的願望終於实现了，敌人的計劃又一次破产了。

大部分同志仍在后面陸續赶来，为了整頓队伍，恢复战斗能力，必須稍稍休息，等待后面的同志一同过江。指揮員发出通知：“快做飯吃，随时准备过江。”

敌机自早到晚，象只牛虻跟随着我們，渡口上空，馬达声震耳欲聳，它是那么欺負我們沒有高射防空武器，时而低空盘旋，在头頂飞插过去，时而由高而低，俯冲下来，盲目地轟炸扫射，江中不断溅起水花。狡猾的敌机也担心步枪把它打下来，又飞向高空，这时飞机屁股后面突然“雪片”飞揚，空中飄揚着欺騙、恫吓紅軍的傳单，这些傳单同志們都拾来作了手紙。

下午三点左右，同志們正在用茶缸、臉盆、盔帽做飯燒水，另一些同志正在树蔭下将睡熟的时候，突然，后面山头的警戒部队的陣地上响起枪声。

“所有的战斗人員集合，占領右側山头，掩护警戒部队后撤。非战斗人員馬上过江。”指揮員命令着。广西軍閥李宗仁的部队由全州插了过来，切断了三十四师和我們的联系，并打到了江边。在对岸不远的地方，掩护我們的九軍团，亦与湖南何健的截击部队发生了战斗。枪声一再催促我們迅速过江。但是，敌机仍不离渡口上空，不断瘋狂地轟炸、扫射。

我和偵察參謀肖俊英等十几个同志，不約而同首先卷起了褲腿，冒着生命危險跳下江去。走到江中，水过腰部，江水冰冷刺

骨，渾身哆嗦起來。江水浸透了棉衣，身子格外沉重，急流沖擊，簡直難以舉步。千軍萬馬正與急流搏鬥之際，可惡的敵機呼嘯着又俯沖了過來，連投三彈，轟！轟！轟！連聲爆炸，江水四處飛濺。在我下面附近的幾個同志應聲而倒，一時江水通紅。犧牲的、負傷的同志來不及得救都被江水沖走，我們含着悲痛和這些戰友永別了！我在心裡念着：

前面的同志倒下去了，  
后面的同志跟了上來。  
為了開辟勝利的道路，  
英雄沖向勝利的彼岸！

為犧牲的同志復仇！我們的機槍和步槍甚至駁殼槍都朝着敵機狠狠地打了一陣。

敵機仍繼續瘋狂地轟炸着。

我和肖俊英同志、供給部科員賴慶生、軍團首長的馬夫老秦等四個人沖過湘江以後，坐在石階上脫下浸透了的棉衣互相幫助掙去積水，然後披在肩上，向着前面的稀稀落落的隊伍跟蹤追去。

由於轟炸越來越頻繁，司令部和部隊無法繼續搶渡，不得不另尋渡口去了。我們沖過江的同志“掉隊了”。

敵人利用湘江之險，以三十萬人構成的“天羅地網”——最後一道封鎖綫，終於被沖破、被粉碎了。蔣介石企圖消滅紅軍于湘江的迷夢又破滅了，蔣介石及其帝國主義顧問們的碉堡政策、封鎖計劃跟隨湘江付之東流矣！

## 負 傷

我和司令部的偵察參謀肖俊英、供給部科員賴庆生和軍團首長馬夫老秦冒着敵機瘋狂轟炸，沖過了湘江封鎖綫之後，自動地集合在一起，單獨行動了。

敵人占領了距離江岸只有一里多路的麻子鎮，一面配合左側追擊之敵封鎖了渡口，使司令部和五軍團的三十四師不能在此渡江；一面在西側的小山坡上支上輕機關槍，“答答答”地叫囂着，不斷地向掉隊散落的同志射擊。九軍團最後一個掩護連散布在道路兩旁，一面催促掉隊的人員迅速地跟上去，一面向小山坡可惡的敵人還擊。敵人受到僅僅一連人的抗擊，就乖乖地停留在麻子鎮附近。

我們繞開被敵人占領的麻子鎮，沿着江邊長滿雜草的羊腸小道，跑步向越城嶺（亦叫老山界）方向追趕前頭的部隊。

走了幾十里，也沒見到部隊，只遇到九軍團一些傷病員。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负伤了嗎？”肖参謀問一个支着拐杖一跛一跛前进的伤员。

“哎，打仗倒沒有负伤，是昨天夜行軍摔跤，把脚筋轉了。”那位同志感叹地回答。但他沒說是哪个单位的。

“来，老秦，把你的馬讓这个同志騎騎。”

“不，我能走呀，还是讓給前头那个伤员騎吧。”他指着前面二百多步远的由一个同志攙扶着的伤员說：“他的伤很重，你們去幫幫他吧！”

“同志，那得跟上啊！快点走，敌人就在后头！”

“放心，你們先走吧！当不了俘虏的。”他充满信心地說。然后他又拍拍掖在腰里的两个手榴彈，带着激怒的声調說：“必要时还有这个！”从口音，听得出他是福建的老战士，一个坚定、頑强、充滿自信又有高度階級覺悟的战士，就他讓馬給伤员騎这一点就深深地感动着我們。

老秦扯着繮繩牽着已經疲倦不堪、不願馱人的馬跑上前去，讓那个伤员上馬。老秦在伤员旁边立了一会，不知說了几句什么，又往前走了。

“噯，怎么不騎呢？”我問道。

“他不能騎馬，伤口打在膀襠里。”扶伤员的同志回答。

“那你得快想办法找群众弄副担架呀！敌人已經离这不远了。”老肖关心他們的安全，催促他們快走。我补上一句：“你要負責任，不能把他丟掉了。”

“已經派人到前面找担架去了，放心吧同志，不会把自己的

战友任意丢下的，我們一定想办法把他拾走。”

这时我心想：沒有根据地，沒有后方，負伤是太不幸，太痛苦了。沒有群众，打仗困难真多呀！根据地和群众对革命是多么重要啊！中央根据地呀！苏区人民呀！我們离別你后，你們的处境怎样呢？至于我們，不管怎么困难，伤员是不能丢的。多一个战士，就多一分力量，就多一顆革命的种子，就多一顆可以燎原的火星呀！

黄昏时刻，我們八軍团的“小小队伍”，又和九軍团的掩护部队在老山界下約有三十多戶人家的村子里“会师”了。緊張的心情开始恢复平靜。我和肖俊英同志去找营部了解情况。范营长和教导員正在地鋪上看地图研究敌情。我們作了自我介紹后，营长告訴我們說，他們是九軍团最后一个营，負責掩护和收容任务。二連今夜住后面二里路远的葛家店，担任战斗警戒。并說敌人今晚可能赶到离这二十多里的某村，要我們最好繼續往前走。

“前面的情况如何？”老肖問。

“前面沒有敌情，我們的主力都过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就进入西延山脉少数民族地区了，房子很少，要到油榨坪一带才有大点的村庄。”

“你們明天几点出发？”

“沒有紧急情况，准备四点出发。”

我們从营部出来，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地宿营，明早提前出发，走在他們的前头。

房子挤得满满的，屋里、院里铺满稻草，躺满了人，除了放哨的和有工作的干部之外，个个都呼呼地熟睡了。要想找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肚子饿极了，我正要拿茶缸做饭吃的时候，马夫老秦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包子饭锅巴，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然后我们在营部门前不大的空坪上的禾草堆里布置了住处。从草堆中抽出几捆禾草，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卧洞，我们便钻了进去。由于实在太疲劳了，在这个四面不通风，暖而软的宿营地里一觉睡到四更天，才被营部的起床号惊醒。这是一个多星期以来最舒适的一夜。我揉着眼睛，说：“快，伙计，想办法弄点饭吃吧。”

“不，来不及了，走吧！赶到前头去，找群众买点吃吧。”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只好空着肚子上路了。

满天浓雾的清晨，如同黑夜一样，我们打着手电筒，走了好一会儿，仍不见天明，谁也没有表，不知什么时候了。其实，太阳早已东升，只是被高入云际的山峰遮盖着，浓雾遮住了晨光。

路越走越小，山越爬越陡，路窄如带，崎岖不平，仰望陡峭的山峰好象要倾倒下来似的。老秦的马不如我们走的快，掉了好几百步，我们三人喘着粗气往上爬。这是离开江西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最难走的崇山峻岭了。

约九点钟左右，浓雾尽散，天空一片明亮。马夫老秦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喊叫：

“喂，喂！前面有人家啦，弄饭吃吧！”大家抬头一望，果然右前方小竹林旁边出现一栋矮小的茅屋。一谈弄饭吃，谁也没有说

話，只是脚步加快了。

当我们离开正路向茅屋的小道走去时，一个一身衣衫襤褸、脊梁弯曲的老妇人已經望着我們向她走去，但她沒有显出惊慌躲避的样子，向我們眺望了一眼又繼續打扫那块只有二十多平方米大小的坪場。

“大娘，卖点飯我們吃好嗎？”

“老总，哪里有飯啊！你們进去看看，只要有，你們就吃吧。”大娘答复得那么誠懇、干脆。

“不，大娘，我們不是什么老总，是工农紅軍，为穷人打天下的兵。別怕，我們不会白吃你的，要錢給錢，要米还米。”我們一面作解釋一面随大娘进了茅屋。

屋里只有一口小吊鍋，鍋里剩下一点殘菜湯。牆角有一張木床，床上放着破棉被，沒有挂蚊帳。一看就知道是被剝削得十分貧困的人家。想吃現成的不可能了，只有自己动手做。老賴将自己背的米袋子嘩一声倒在紅泥燒成的土釜里，大娘从水缸里舀了一勺水，添在盆里淘起米来。老肖从衣袋里掏出火柴，点燃了松树叶子开始炊鍋了。大娘亲切、关怀地說道：“家里穷，沒好吃的，后牆还有几个南瓜，你們不嫌弃就去拿来做点湯吧。”坐在那吸烟的老賴向我瞟了一眼，我就跑去拿来一个小南瓜。我們如同到了一个新結識的亲戚家一样，一边做飯一边和大娘拉起話来：

“大娘，你家几口人呀？”

“唉！命苦啊，沒儿沒女，只是老两口。老头子前天給你們前



头的长官带路去啦，还没有回来。”

“不要紧的，放心吧，带到地方一定会回来的。”

“是啊！看你们红军个个都满好，说话也挺和气，昨天也有你们的人在我家煮饭，还拖着要我一块吃呢。老总，不，红军同志，你们往哪里去呀？走这穷地方来做什么啊？前头都是苗人！”

“我们本来也是种田的穷人，有钱的财主逼人活不下去了，我们才起来打仗闹革命的。打倒了何健、蒋介石分田地，大家都有田种，都有饭吃。革命成功了，人人平等，象你老两口也不愁没儿没女啦……。”

大娘只是笑咪咪地不断点头。

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饭好了，汤开了，大娘摆弄着歪歪斜斜的小四方饭桌，凑合了四个大小不一、粗制的沙碗。正要吃饭的时候，嗡……嗡……嗡……敌机来了。

“轟！轟！”两个不大的炸弹落在距茅屋后面二百来米的半山腰，顿时茅屋被震动得吱吱咯咯，灰尘飞扬，热腾腾的饭锅和满满的一盆南瓜汤被盖上一层厚厚的“胡椒粉”似的尘土。大娘吓得瘫软了。皱纹满额的脸上，一时变得苍白可怕，手紧紧捂着耳朵，趴在地上动也不动。赖庆生同志拍拍身上的灰尘喊道：“快，赶快离开这，敌机一定发现做饭冒烟了。”我和肖参谋搀着大娘，连拖带拉向低洼的沟里跑去，躺在一棵老槐树底下。

“轟！轟！轟！”巨雷般的连声爆炸，震荡着整个山谷，弹片呼啸，树枝横飞，沙石从半空象瀑布似的倾泻在我们的身上。在那“轟”的一刹那，我感到脖颈上潮湿而发热，左手不停地颤抖，眼

睛一阵发黑，耳朵嗡嗡直响，脑子里忽忽悠悠的，顿时昏迷了过去。当我醒来时，老秦正抱着我，肖参谋解下我的绑带，撕破自己的棉衣，扯出白絮絮的棉花正在为我包扎左手。老赖怎么不见了？老大娘呢？我正想开口询问，伤口一阵剧痛，差一点使我呻吟起来，我咬紧牙关，豆大的汗珠直滚。肖参谋两眼闪着泪光，惊喜地说：“小黄，你到底醒过来了。”“你的伤……”老秦擦着眼泪说不下去了。我的脖子已被包扎起来，左手绑死挂在脖子上。没有药，没有办法止血，血，好象一股小泉流直往外冒，厚厚的棉花和绑布都已经浸得鲜红了。原来，我的左手掌已被打穿，脖颈伤口约有四指来宽，喉管已经露出来了，右肩负伤也有两寸多长，右手也不能抬举。我喘着粗气问：“老赖、老大娘他们呢？”肖参谋说：“背老大娘回家去了。老大娘吓迷糊了。”知道他们都好好的，我才感到宽慰。我慢慢地挣扎起来，伤口的剧痛使我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我心想：这下糟糕了，行军、打仗，一切困难都不怕，可是离开根据地负了伤，虽不死，也无法随部队一齐行动了，脱离自己的部队，这怎么办？但再一想，我的腿还是好好的，还能走，只要能走，我就能够坚持战斗。想到这里我又转悲为喜，自信起来。我告诉老肖、老秦说：“不要紧，我能坚持！”

“是啊，小黄，要坚持，坚持才有胜利！”肖参谋鼓励我说。

老赖回来了。他亲切地询问了我的伤势后，我们又出发了。老秦牵着他那驯服的马儿，停立在一块石阶下，老肖要扶我上马。但是我的左手被绑吊着，右肩负伤也抬不起来，两手不能支撑马鞍，无法骑马。最后决定步行，由老肖和老赖轮换着搀扶我

一步一步翻越老山界。

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墙壁似的山坡，脚步往低走，一步一踉，一踉一痛，伤口象刀割肉一样痛。血，大量地繼續流着，由領口流到褲腰，由褲腿流到草鞋。由于流血过多，眼睛一陣发黑，身子一軟倒在老賴身上。我心想：恐怕不能归队了。我决心不再耽誤他們，不要为我使他們掉队。我說：“肖參謀、老賴，我走得太慢了，这样怎能跟上队伍啊！你們先走吧，快归队参加新的战斗。”

“不，不能把你丢下，丢下你等于把你交給敌人，不管有多少困难，我們一定把你带回去，背也把你背回去。老賴，来，我們两个人搀，下去这一段路就平一些了。”老肖說着走过来架着我的左胳膊。我被他們珍貴无比的同志友爱精神所鼓励，我忍着剧痛，咬紧牙关，放輕脚步，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

一整天我們沒有吃一点东西，两眼直冒金花。下完二十多里高的大山以后，我們已經筋疲力竭，走起路来身子不由自主地直摇晃，就象风雨中飄搖的树枝一样。

晚上十点左右，终于在油榨坪找到了九軍团的卫生部。卫生員們亲切地問长問短，为我繼續流血的伤口止血，敷药。饿得实在难以忍受了，老賴不客气地說：“同志，我們……整天沒有吃飯，是否……”“有，有飯，已經去弄飯了。”那人大概是个看护长，沒有等老賴講完就搶着回答。

我坐在草鋪的地上，把飯碗夾在膝襠里用湯匙边吃边說：“肖參謀，你們得先走了，我今天实在走不动了。找到部队請你

們把情况告訴首長，我自己會堅持下去，一定設法歸隊！”他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留老賴帶我慢慢走，負責把我帶回去。肖參謀和老秦吃完飯後繼續前進，星夜尋找自己的隊伍去了。

進入西延山脈之後，山巒重迭，樹木茂密，道路橋梁全被破壞，前頭隊伍沿途被阻，擠在少數民族地區。第三天傍晚，賴慶生同志終於把我帶回自己的單位。

在一間狹小的屋子裡，政委袁邦光同志正坐在床沿上低頭看文件，其他的同志利用不可放過的機會，正抓緊時間睡覺。我抑制着自己悲喜交集的心情，壓低聲音，在門口輕輕地喊了一聲袁政委後，眼淚就扑簌簌地滾落下來，好像一個丟失了親人的孩子重新回到母親懷抱一樣，抽抽噎噎哭開了。政委聞聲放下了文件，兩步搶上前來擁抱著我，他的眼眶也紅潤了。政委立在我的面前，象慈祥的長者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安慰我、鼓勵我：“小黃，不要悲傷難過，革命嘛，不免要流血犧牲的，有多少同志為了黨的事業，為了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坐監牢、受刑法。但是所有這些同志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儘管眼前我們遇到嚴重困難，但我們的事業終究會勝利的！你負傷了，但是回來了……”哭聲和談話聲吵醒了熟睡的同儕，他們都圍上來，七嘴八舌地問個不休。隔了老半天，政委才又繼續說下去：“回來啦，這是你不幸中的萬幸，也是我們意外的高興。”他立刻又好象下達任務一樣，關懷而又嚴肅地說：“你現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地到醫院去，快把傷養好，繼續戰鬥。明天我們還要繼續前進。你休息一下就送你到衛生部去。”

晚上九点多鐘，在一个傍山依水的小村子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了医院。回到了部队，入了医院，我感到了寬慰，便躺下休息了。

后半夜，約一点来鐘，寂靜无声，在睡梦中枪声傳到耳鼓，我被惊醒。仔細一听，枪声原来是从油榨坪方向傳来的。敌人又追上来了，九軍团又进入掩护战斗了。

不一会儿，一个身材不太高，面色消瘦的同志站在我的床边，两眼焦虑而又同情地望着我。我仔細一看，是李助理員。他見我醒了，摸摸我的額部，說：

“黃同志，情况緊急，队伍已緊急集合出发了。找不到担架，又没有牲口，天是这样的黑，爬山越岭，你怕不能随我們一齐走哩。組織上为了减少你的痛苦，很快养好伤，給你找好了一家可靠的群众关系，你到那去休养，好了再归队。”李助理員耐心、誠懇地向我解釋，手里拿着三十块白洋放在我的床边，作为我留下来养伤的費用。这种突如其来的决定把我楞住了，我的心凉了半截，万万沒有想到这种不幸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我沒有立即回答李助理員的話，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我十五岁离开了父母，自願参加紅軍，在党的怀里成长，又是共青团員，难道現在就要离开党，离开自己的队伍，离开同志們了嗎？我沒有要求牲口和担架呀，組織上为什么要我留下呢？大概組織上看我伤势重，不能跟着走？那么，我这几天又怎么走来的呢？想到这，我坚决而自信地向李助理員說：“不，我不能留下，沒有牲口我自己能走，我的腿好好的，你們放心。我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往前爬，死

在路上也甘心！”“走，我們走！”我向組織上派來幫助我的通訊員賴清枝說，於是踏着高低不平的山道隨着部隊走去。李協理員看我堅決要走，也就攙着我一塊走了。

才走到山腰，狂風驟起，下起了傾盆大雨。天黑的可怕，伸手不見五指，不知山有多高，溝有多深，前進不能，後退不得，隊伍完全停止前進了。我們就地而坐，坡太陡，坐不穩，直往下溜，賴清枝在我屁股下面用手挖了一個窩，才算坐穩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四個鐘頭過去了，隊伍仍不見移動，无情的暴雨叫囂着，打在我們身上，沒有雨具，全身淋透了，寒風凜冽，刺入肌骨，渾身打哆嗦。我的傷口已被雨水泡得發脹了，針刺一樣穿心地疼痛，簡直使我難以忍受。為了保守夜行軍的秘密，不致發出呻吟聲，我狠命地咬着牙，默念着：“堅持，堅持，要堅持才有勝利！”我盼望着天明，遙望着東方，但黑夜和无情的暴雨却沒有個完，我真不知道這一夜是怎樣熬過來的啊！

東方漸漸放亮的時候，隊伍才開始翻越高聳入雲的大山。路，陡極了，几乎是八十度的峭壁；路，只有一尺多寬，道旁就是懸崖深溝。再向前走不遠，有一段被雨水冲刷的溝渠，前面的同志以跳遠的姿態跳了過去。我却難住了，我不能跑也不能跳，後面的同志還緊緊地催促“快走，別掉隊”。我只好把身子貼在山壁上讓他們先走。一直等到來了一個炊事員用鏟子把路挖了一個落腳處，我才小心地過去。回頭往崖下看去，溝里摔下了七、八匹馬，四脚朝天地躺在那里，這些都是昨天夜里前頭部隊掉下去的。

上了一山又一山，这山又比那山高，回头望望来路，山峰一个比一个矮小了。上午十二点左右，我們终于到了一个山頂，象是上到了天，遙望祖国大地，人們欢唱，歌儿响彻云霄，气壮山河。

沿着“之”字形的路慢慢往山下走去，有些地方也陡得笔直，只好蹲下来，慢慢溜下去。到了沟里，群山环抱，好似落到井里。部队休息了，滿山遍野，溪流道旁，炊烟四起，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用臉盆、茶缸做飯吃。我們早就想弄点飯吃，但怕掉队太远，一直忍着飢餓。現在也可以弄吃了，我用那不能抬举的右手拾了几块石头，架起茶缸，賴清枝同志紧忙去檢树枝，燒起篝火做飯吃。

进入苗山之后，村落稀少，苗民又被騙四散，道路桥梁多被破坏。广西軍閥还派人化装紅軍模样到处燒民房，企图以此引起苗民对紅軍不滿和增加紅軍的困难。因此，沿途許多村子变成了廢墟，断垣殘壁，触目皆是。部队每到一处，只得露宿树林。

由于日行夜走，得不到必要的休息，又无医药治疗，許多伤員的伤口化膿潰烂了，增加不少痛苦。我自九軍团卫生部給我上过一次药后，半个多月沒有治疗了，伤口已經潰烂，发臭生蛆，身上的血衣一直紧紧貼在身上，虱子多得难以胜数。

我們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常常想起党和毛主席对我們的教导：

“困难才要革命，革命就有困难，只有不怕困难的人才能革命到底。”因此，我們沒有任何怨言，我們相信困难过去接着来的

就是胜利，如象黑夜过去必定天亮一样。

出了西延山脉苗族地区，进入黔湘边界。解放通县、黎平，捷报频传，全军士气大振。接着二方面军又于湘北澧州、桃源大捷，歼敌两师，缴获甚众，活捉敌司令张振汉的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人心。二方面军的胜利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一方面军的西进。

我们到达贵州黄平县，休息了二天，部队开始缩编，混乱现象才告结束，八军团建制撤消，并入五军团。病号编到五军团“后方医院”，我和其他伤员编到五军团的战伤医院。这时，正是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大家简单地过了个“会餐年”。党任何时候总是特别关心伤病员的，我们还发到一条手巾、一双胶鞋和一块银元的零花钱。

在黄平，伤员住在比较清静的一条后街。我们一共五个伤员，住在一家没儿没女的朱老汉家里，老两口依靠做点豆腐为生。朱老汉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朱老太太约有五十来岁，成年成月地劳累和愁虑着没有儿女养老，使她消瘦得两颊深陷下去，满脸密布着皱纹，牙齿都快落光了。但她见着我们总是笑咪咪的，她那副慈善的心肠，充分表现在关怀我们伤员的生活上，每天都要格外弄点好的饭菜送给我们吃。而她又特别关心我，因为我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也是伤势最重的一个。她简直就象母亲一样，看我要睡觉了，便走到床前小心翼翼地扶着让我慢慢地躺下去。一夜总得到床前看我几次，给我盖被子，端茶水……

我被老人那种母爱般的体贴和温暖所感动，不禁产生了这



样的想法：“如果有这样好的群众作掩护来养伤倒是很理想的。”当时，我的伤口全部溃烂化脓，我本来是个好说好笑的人，但这几天却整日陷入深思中，我在考虑：这样随部队前进，会不会给大家增加麻烦？我突然变得沉默了，可能有些同志猜到了我的心情，就劝我留下来，叫我养好伤再走。朱老太太直截了当地劝我：“小红军，看你伤得这么重，别走啦，就住我家里吧！大爷帮你买点药，好治你的伤，我也没儿没女、没亲没故的，你好了，跟你大爷做个小买卖，有你吃有你喝，我们老两口以后老了也有依托了，家业就算你的啦。”

明天，队伍要出发继续前进了！晚九点，同志们为了明天早起上路，都呼呼地熟睡了。只有我躺在床上，怎么也合不上眼睛，脑子里象塞着一团乱麻，烦乱的心就象翻滚着的油锅，往事潮水似的涌上心头：红军在井冈山时的艰苦奋斗；敌人对待革命者的残酷无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的斗争；部队首长的教导；同志间阶级友爱的温暖；肖参谋的鼓励，还有啊！一九三二年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时，毛主席亲自给上课讲的那许多革命道理……。这些回忆象火一样燃烧着我的心，鼓舞着我向伤痛斗争的意志，我痛心疾首地大哭起来，难道我真是到了无法坚持下去的地步了吗？负伤半个多月以来，又怎样过来的呢？四年前，我加入共青团的时候，不是下过决心要革命到底，对革命不惜生命吗！我用拳头捶打着胸膛，“不能留下来，我不能离开革命，不能离开红军。我要走啊！我要走，哪怕死在路上，我也心甘情愿！”哭声惊醒了熟睡的同志，他们异口同声地询问：

“小黃，你怎么啦，伤口疼得厉害嗎？要不要去找医生呀？”我顫抖的右手一把抓着身旁的老李，哭啼啼地說：

“老李，我要走！我不能离开党，离开部队，不能离开同志們……我能走，两只脚好好的，我是共青团員，我能走！”老李热情地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說：

“好，小黃！咱們一起走吧，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助，困难是吓不倒我們的。只要能够坚持，困难总有办法克服，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天剛亮，我愉快地爬起来，跟随同志們一起繼續前进了。

經過这次严肃的自我斗争的考驗，使我更加懂得了毛主席教导我們的“困难才要革命，革命就有困难”的真正道理。也使我更加体会到：当遇到困难时，必須以最大的忍耐力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才有胜利。从此，我下定决心：永远跟着紅軍、跟着毛主席走！只有永远跟随党、跟随毛主席才有胜利！

从黄平出发，使人感到有一种更加緊張而又活潑的气氛。沿途可以看到“建立湘貴革命根据地！”“打倒卖国賊！”“停止內战！枪口对外！”“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等标語口号。

在黄平一带，我們休息了几天。利用休息的时间，我們发动了群众，沒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分給穷人之外，自己也改善了生活。

这时，我軍解放余庆、瓮安、猴場，突破了天險的烏江，打垮了侯之旦三个团等胜利消息雪片似的飞来，听了真使人兴

奋。

莫道烏江天堑，且看紅軍等菊飞渡：

烏江，寬約二百米，流速每秒二米上下，南北兩岸均為懸崖絕壁。沿江北岸布滿着敵人防禦工事，貴州軍侯之貞的三個團防守在這裡，企圖阻止紅軍渡江北進。

紅軍第一軍團第二師擔負着奪取金沙江，攻占遵義、桐梓的光榮任務。

一九三五年的元旦，先頭部隊到達江邊，作了一些必要的準備之後，次日便開始了渡江戰鬥。八個英勇的戰士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之下，赤着身子，冒着寒風冰水“扑咚”一聲勇敢地跳入江中，在那冰刺骨肉的急流里游向敵岸。十分鐘後，英雄們無一損傷安抵彼岸，隱蔽在敵人警戒綫的石崖下。但是，交給他們游水拉過去準備架橋用的草繩子却因水流太急沒拉過去，因而架橋的計劃不能實現。紅軍繼續以竹筏強渡，划至江心又被敵彈打翻。強渡不成，只得叫那八個戰士再游回來。八個同志因為赤身凍了兩個多鐘頭，回來時，一個同志游至江中就游不動而光榮犧牲了。

為了避免敵人的射擊，減少傷亡，決定夜間偷渡。四團一營一連的五個戰士首登竹筏向彼岸划去。因水流過急，划至中流被巨波沖打而下，到兩里以外才回到南岸，丟了竹筏，費了好大事，才沿着河岸摸着回來。第三連連長毛正華同志率領四個戰士帶着一挺機槍乘着第二筏又向敵岸划去，隔了好久既不見到彼岸的訊號又不見回來，情況難斷。第三筏又出發了，但同第一筏

一样，划至中流不能前进，又折了回来。偷渡无效，因而停止。

经过两天的隔江战斗，敌人又增援来了一个团，沿江在加修工事，迫击炮不断向我军射击。我军的后援部队亦源源开来，强渡的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中。敌人拚命地阻击，不让红军过江；红军决心更大，一定要突破天险乌江，打开前进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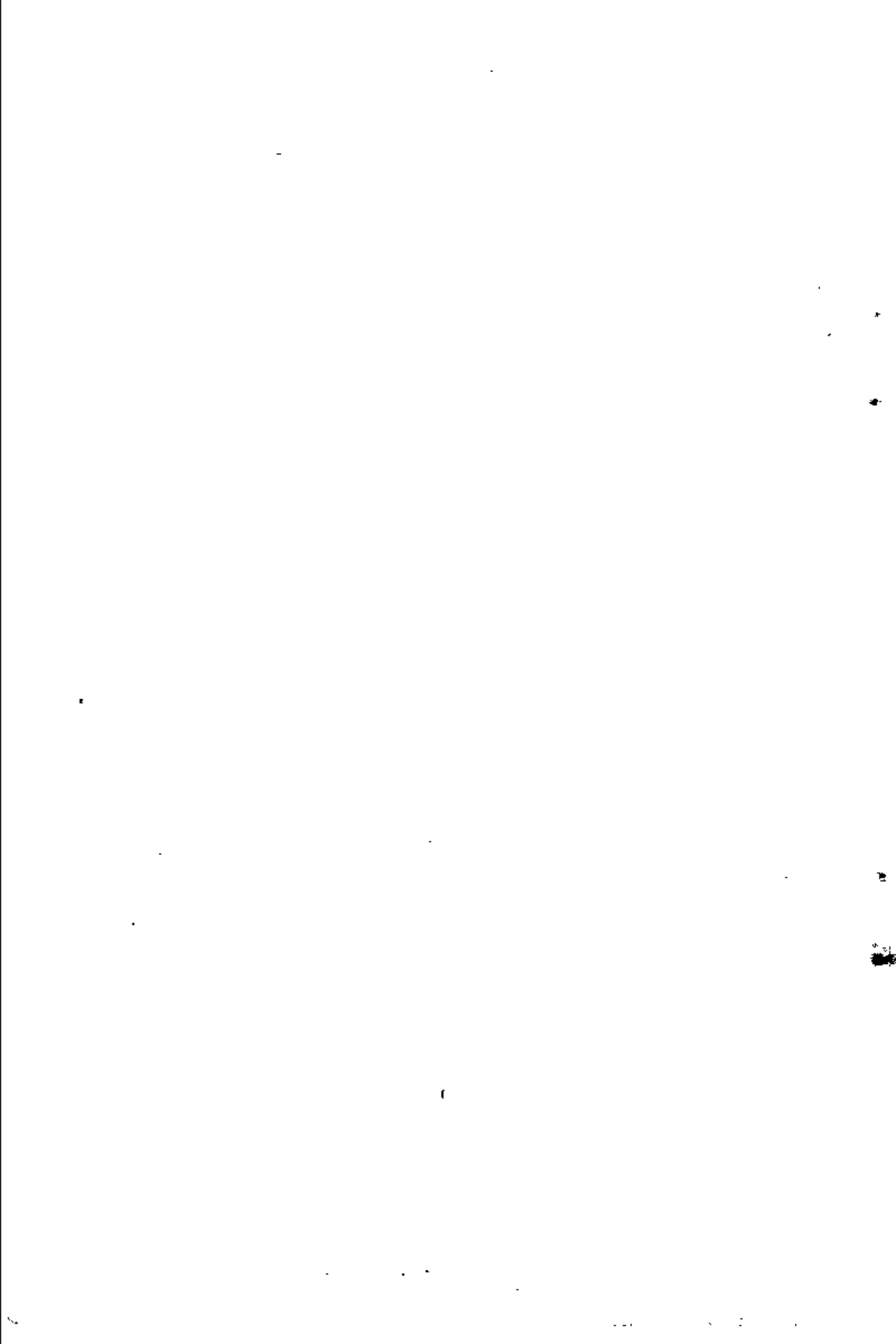
元月三日上午九点，一场激烈的强渡战斗又开始了。红军在正面的江界渡口处摆满了架桥的材料和筏子，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军只用很少的部队做佯攻，把敌人吸引住，加兵固守，加筑工事。但在离开这儿一里多路的上游，红军在浓密的火力掩护下，三个竹筏载着十多个铁人般的英雄一齐向对岸冲去。敌人发觉了，拚命向渡筏射击，筏子的撑篙被打断了，换一根又继续前进。两岸火力正在交織对射中，三个筏子接近了北岸，“水马”冲过江了，敌人这才恐慌起来，转移火力拚命地向“水马”射击。但是就在这时，从敌人军事哨的脚下石崖里，突然出现了几个红军战士，他们在敌人排哨旁边打起了机枪，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爆炸声，把敌人的一排军事哨打得落花流水。英雄们从石崖下冲上去迅速地占领了敌人军事哨的抵抗线，有力而准时地接应了三个竹筏上的红军战士迅速登岸。从石崖下冲上去的那几个战士就是昨夜偷渡过去的毛连长他们。

第一批过去的同志和毛连长会合后，继续向敌仰攻。敌人的排哨被打死过半，往上退却。这时，敌人增来一营人，居高临下向毛连长他们反攻。毛连长他们被阻不能前进，南岸的我军炮火也封锁了敌人向下反攻的羊肠小道，敌人也无法下来。

我軍后續部隊終於過來了一個排，立即組織向敵沖鋒，把企圖反攻的敵人一個營稍稍打退了几步。但是，因為山陡路小，兵力不能展開，無法前進。這時，敵人的江防司令、侯之旦的“健將”林秀生旅長親臨前綫督戰反攻，我軍最前的一個班大部傷亡，被迫後退，敵人又企圖追下山來。我軍後面的一個班也增加上去，才擋住了敵人。敵我雙方都不肯後退，但又都不能前進，形成相峙局面。

正在相峙的時候，我第一營營長羅有保也沖過江來，他發現左側有一處石崖可以攀登上去，立即派一個班試行攀登。不久，經過戰士們的一再努力，一個班的戰士終於登上峭壁，占領了敵人前方的一個石峰，用火力向敵猛烈射擊，敵人站不住了，山下的同志又發起了沖鋒，敵人開始動搖了，退却了。這時，我軍才渡過去一個連，便跟踪猛追，把敵人全綫擊潰。天險的烏江就這樣突破了。侯之旦的三個團丟盔棄甲，在江防司令林秀生帶領下不要命地逃往遵義去了。

當我們得到突破烏江、打垮侯之旦三個團的勝利消息，正在興奮歡慶的時候，占領黔北重鎮——遵義、桐梓的大勝利的捷報又傳來了。這些令人歡呼雀躍的勝利消息象一服劇烈的興奮劑，把我們一路上的疲勞一掃而光。同志們個個精神百倍，充滿信心，直奔烏江。連掉隊的同志也不知哪裏來的勁頭，飛跑向前。不久，我們就到了遵義城。



# 从遵义出发







## 在 遵 义

遵义是贵州省除贵阳外的第二大城，为贵州通向四川的要埠。遵义分新旧两城，中间有一道小河相隔，柏油马路贯穿其间。新城为商业集中区，市面繁华。红军进入该城以后，由于纪律严明，公买公卖，全城商店照常营业，更加热闹了。

红军除一九三二年打到福建漳州之外，遵义算是第二个解放的大城了。

我们战伤医院设在新城南关的一条小街上，我和另外四个伤员住在一个中学教员顾先生的家里。他主动把房间让给我们住，又把室内拾掇得整整洁洁，窗上糊了新买的白纸，窗框擦得发光，凸凹不平的泥沙地小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算达到医院的卫生标准了。顾太太还主动为我们洗补衣服，经常来问我们需要什么，象是殷勤招待远道归来的熟客。

我到遵义的第三天，天气阴沉沉的，整天没有见到太阳，敌

机也歇班了。

听说，军委住在旧城，我去总部无线电总队串门访友。出得门来，大街小巷人群簇簇，有穿着襤褸不堪，从乡下进城来看红军的“干人儿”〔注〕；有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女学生；有穿着国民党军服放下武器的俘虏兵；有戴着红色五星军帽挂着胜利微笑的红军战士。一群又一群的人们拥挤在街头上买东西，一堆又一堆的群众围着红军宣传员听演讲，熙熙攘攘的行人，嘈杂的人声，市面十分热闹，象过年过节一样。

我在新城观看了一番，便直奔旧城走去。

来到总部无线电总队，除陈报务员在当班之外，其他的同志都上街宣传去了。我同陈报务员随便谈了一会，王铮总队长进来了。他亲切关怀地问了我受伤的情形以后，告诉我说：中央首长们在开重要会议。我们在这儿还可以休息几天，要我好好休养，伤好后就在五军团工作。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进门便听见同志们正在兴奋地谈论，朱总司令要来慰问我们伤病员哪，我们怎样迎接总司令……

“谁说朱总司令要来慰问我们？瞎编！总司令那么忙，哪有工夫来看你！”我心里渴望着总司令的到来，但想知道消息是否正确，就故意板着面孔冲着喜笑颜开的老王问。

“瞎编！你不说我造谣呢！”老王沉下脸，不高兴地看着我，“哼，你不信就拉倒。”

---

〔注〕 贵州称穷人为“干人儿”。

十三師的一個營教導員馮厚生同志，是上杭才溪人，是我的同鄉，他躺在床上笑嘻嘻地說：“你們兩個小伙子別爭了，我們要很好地整頓一下內務，迎接朱總司令的到來，我去買包茶來。”他的傷勢是我們當中最重的一個，但他卻十分頑強和樂觀，總是笑呵呵的，好像他沒有負傷一樣。他隨後又說了一句：“我知道，朱總司令愛兵如子，他是關心戰士的，他老人家雖忙也會抽空來的。”

大家聽說朱總司令要來，掃地的掃地，送被的送被。老馮換上了剛發的新衣，拿着拐棍一跛一跛，上街去買名茶去了。

果然，下午三點多鐘朱總司令隨着董振堂軍團長等來到了我們的醫院，對我們一百多傷病員作了親切的慰問。

朱總司令和董軍團長走進我們房間時，我們的热血沸騰了，不自覺地滾出了感動的热泪。朱總司令操着強烈的四川口音，慈父般地向同志們問好：“同志們休息好了嗎？換了藥？”然後他很有風趣地問：“傷口還痛嗎？”他回頭向軍團長笑了一笑，忽然說：“他們都哭了哇！”

我們頓時不好意思起來，擦了眼淚，趕快回答：“總司令！我們的傷都好了，可以參加戰鬥了。”

朱總司令那張飽經風霜、消瘦的臉上，頓時布滿了微笑的皺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出衷心的喜悅。他笑盈盈地點了點頭，象稱贊一個小孩子做對了事情那樣。

接着，他親切地問了每個同志的傷勢，勉勵我們要安心休養。最後還問了我們在醫院里生活得怎樣，有沒有什麼要求等

等。

“总司令，我們要求医院負責同志，在当我们自己感觉到伤势已好，請求参加战斗时，應該立即批准，不要拖延出院的时间。”我搶着回答。

总司令把笑臉朝着我問：

“你是哪个单位的？”

“是八軍团的。”

“你是做……”总司令皺皺眉头，象是有点認識我，因为我在总部学无綫电时，总司令常米給我們作报告，我又坐在最前头。

“做报务工作的。”

“啊！怎么負伤了？”

“过湘江以后被飞机炸伤的。”

“一路上被飞机炸伤的同志是不少！”我的話似乎引起了总司令的回忆，接着总司令又問：

“剛才他說的是他个人的意見，还是大家的意見？”

“大家的意見，总司令。”同志們象在操場上回答問話一样的响亮整齐。

“好哇。”他回头对医院的張院长开着玩笑說：“听見了嗎，他們这是向我告你們的状了……”

“那你們沒有好也不能随便要求出院啊！”总司令轉过弯来叮了我們一句。

朱总司令說完后，自己也笑了起来，大家也咯咯地笑出了

声，整个屋子充满了欢乐。

“还有什么要求嗎？”朱总司令随后又問我們。

“总司令，請代我們向毛主席問好，向中央首长們問好！”馮厚生同志馬上回答。接着同志們也都說了起來。

“这个，我办得到，也忘不了。”总司令欣喜地点头。

朱总司令回总部去了，但他的亲切的声音却还留在这間屋子里。这一晚上，大家兴奋得談到深夜。

在遵义，我們住了六天，差不多天天都有首长和同志們来医院慰問。尽管这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我还記得那么清楚。当时，我們伤病員除和其他战士們一样发了手巾、肥皂、紙烟之外，还格外加发了两块銀元的零花錢。我以前那身膿血污秽的血衣，到遵义也換掉了。經過几天的治疗和休息，許多同志恢复了健康，出院繼續参加战斗去了。我的伤势也輕多了。

在党中央的遵义會議之后，紅軍精簡了龐大的后方机关，輕装前进。紅軍从遵义、桐梓出发，經松坎、土城渡过赤水河，准备在川南的泸州叙府（宜宾）間搶渡长江，入四川配合川北的四方面軍作战。

我那时伤势还未痊愈，随着医院北上。这虽是严寒的冬季，但貴州的北部仿佛象江南的初春，一点也不觉得冷。当太阳发出万丈光芒，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时候，走起路来还渾身流汗。有的同志把棉褲的棉花扒出来送給“干人儿”了。

貴州山多地少，真是地无三尺平，加上反动統治者苛捐杂稅

的压榨剥削，弄得人无三分銀，老百姓穷困得食无頓飽，衣不蔽体。記得在去松坎的路上，一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蹲在道旁向我們要錢。我走近一看，茅草似的长发披在肩上，一張黃叶似的臉上嵌着一对呆滞无情的眼睛，上身裹着麻布片，渾身哆嗦着，伸出一只枯竹似的細手，喊着：“紅軍先生，請做做好事，給我一点錢吧。”

我对她不站起来，又不是坐在地上，老是蹲着感到奇怪。仔細一看，才发现赤着脚，双腿一絲不挂，原来沒穿褲子。面对着这个苦难的姑娘，心头一陣酸楚，階級的同情心使我不覺滚出了眼泪。同志們有的給她錢，有的給她一条短褲，也有的倒給她一碗米。我心里正盘算究竟給她点什么的时候，旁边的老張对我說：“小黄，我們應該給她什么东西呢？”我說：“你看她多可怜，全中国象这样的穷人不知有多少？我把被子給她吧。”老張高兴地点着头說：“好，以后我的被我俩打伙合盖……。”

“給你这被子。”我把被子放在她的面前。

她惊詫地望着我，随后两只眼睛滚出了成串的泪珠：

“紅軍先生，多謝你，多謝你，救命恩人……”她想站起来，但又不敢起来，只能两手作揖，頻頻向我們点头，表示感謝。

这个悲慘的情景深埋在我的心头，使我久久不忘，我想：誰家沒有兄弟姊妹啊！这个社会穷人連褲子都穿不上，財主們却絲綢絨緞，真是天地之差，不革命怎么得了！

紅軍过了赤水河，向扎西前进。一天我們进驻古藺，医院的張院长对我們說：“明天部队要向后轉了，再打回遵义去过春

节。”

我們对突然折回遵义去的意义一时不能理解。大家忙問：“这是为什么呢？”

張院长慢条斯理地点了一支烟，然后才象教师在課堂里講課的姿態，神气十足地講起来：

“当我们刚过赤水河，蒋介石已发现我軍要去四川的意图，便急忙調二十万軍队将长江封鎖起来。但是，”他猛吸了几口烟，停住不講下去，故意使我們着急，待我們催問几次后，他才接着說：“毛主席英明果断地决定改变行动計劃。敌人以为我們要过长江，我們就偏偏不过了，讓蒋介石摸不着头脑，讓他在长江边等吧！这是毛主席的声东击西运动战的好战术，在江西，就这样把蒋介石搞得蒙头轉向，打败了国民党的四次‘圍剿’。后来反五次‘圍剿’不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錯誤地采取单纯防禦、分兵把口，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死守陣地，同敌人拚消耗，結果我們吃了大亏。党中央的遵义會議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中的軍事路綫的錯誤，恢复了毛主席的軍事路綫，并且确定了毛主席来領導我們……”

“是呀！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就打胜仗，在江西我們打败了蒋介石的四次‘圍剿’。”馮厚生同志激动地搶着說。

“有毛主席領導，走遍天下也不怕了……”

“張院长，我們的伤都快好了。我們要求出院，参加战斗！”同志們向張院长請求。

“你們別急，真的全好了，就出院。医院不敢留你們，你們不

是在朱总司令面前告过状嗎？哈哈……”

我們都随着他大笑起来。

第二天，我們一早出发回渡赤水河，向桐梓前进。

紅軍以神速的行動，回渡赤水河后，不到一星期工夫便傳來捷報：三軍團在二郎灘打垮了侯之旦的两个团，正向娄山关追击中；接着又傳來，占領了桐梓、娄山关，击潰了王家烈的四个团，并乘胜直追中，兵臨遵义城下；接着又傳來經一天多的圍城战，遵义这座历史名城又一次为紅軍解放。

此时，蔣介石的嫡系吳奇偉、周渾元縱队及王家烈殘部分三路向我反扑，企图夺回遵义。但紅軍銳不可挡，一、五、九軍團已赶到。在活捉薛岳，消灭“中央軍”的口号下，士气旺盛，屢战屢胜。鴨淩激战，打得蔣介石的“中央軍”七零八落，抱头鼠竄。吳奇偉的两个师被歼灭，周渾元縱队則被赶至烏江喝水去了。从江西出发，我們总是跑，敌人总是追打我們，遵义會議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現在却是我們追击敌人了。

紅軍突然回师遵义，蔣介石以为我們將再渡烏江回湖南靠龍和配合二方面軍作战。于是，急調大軍扼守烏江。但出敌人意料之外，紅軍除派善于机灵游击作战的第九軍團渡过烏江北岸箝制迷惑敌人之外，主力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向西南猛进，兵臨貴阳，将敌人远远甩在烏江北岸。蔣介石急得暴跳，因为貴阳空虛临危，于是不得不速調云南軍去保护貴阳，他亲身带着宋美齡飞往貴阳督战。

蔣介石的几架破飞机都去运兵保貴阳，敌人的飞机算是暫



时和我们告别了。但不久，从四川军阀刘湘那里调来两架笨头笨脑的飞机，来轰炸我们。可是，刘湘的飞机却没有炸弹，只好乱丢炮弹。炮弹没有了，还丢石头呢！

一天，两架刘湘的飞机在我们头上乱转，忽然从半空中掉下来一个黑黑的东西，但久久没有响声。飞机走了，好奇的同志去看那颗没响的“炸弹”，才发现原来丢下来的是大石头，把麦子压在松软的土里，使我们捧腹大笑不已。以后，飞机来了时，有的同志指着飞机说：“你最好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搬出来炸老子好了！”

当蒋介石拼命保贵阳时，红军主力又迅速渡过北盘江，占领了贞丰、兴仁等县，这时昆明又告急求援，蒋介石又慌乱一团，手足无措。从武汉、长沙增援贵阳的敌兵没有来得及下飞机，又赶忙飞往昆明去了。

## 永远怀念的政委

在茅台，我伤愈出院来到五军团电台工作。从我到电台的那天起，电台政治委员李白同志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天，我一进门，李政委便亲切地问我：“小黄，伤好啦，你受苦了。”他象是我的亲哥哥一样关怀我、照顾我，亲自为我张罗住处，政委忙了半天，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才歇下来问长问短，介绍电台情况。忽然，他发现我穿着一双没有耳朵的破草鞋（草鞋两边断了绳的），便笑嘻嘻地说：

“小黄，你的草鞋都破掉了耳朵了。”

我瞧了瞧自己脚上的破草鞋，笑了笑。他接着说：“穿破草鞋这算什么，这是暂时的，等到革命成功了，我们都穿皮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要什么有什么。”停一会儿，他又说：“你是好样的，负了伤，没有掉队，艰难困苦没有折磨断你的硬骨头……我们受

毛主席教育成长起来的紅軍战士，为了革命，具有着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偉大精神。”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沒有插言。但心想这是李政委对我的夸奖和鼓励，实际上我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还須要好好鍛炼。

“你該休息了，我說的太多啦，以后我們談話的机会多呢。”接着，他站了起来說：

“哎，我倒忘了，應該給你拿草鞋去。”

政委的話沒有說完，黃荣、鍾真益同志已經把草鞋拿来了，都爭着要送我。这倒使我为难了，要誰的好呢？我心想要黃荣的，因为他是学无綫电时（第三期）一个小組的同学，但他的脚比我脚大，不能穿，我这才笑着說：“看誰的合我脚就穿誰的吧！”最后挑了老鍾的一双，他們才不爭了。随后我們爽朗地笑起来說：“今后我們同甘共苦的日子还长哩！”

李白同志是中央苏区无綫电学校第二期的学生（第五期以后改为通訊学校），高高的个儿，身体結实、健壯，但他走道却是“八字脚”，有点象老婆婆。他那張誠朴厚厚的臉常常挂着笑容，一看到他就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正直的老实人。他待人頂和气，頂热忱，对同志的关心无微不至，象对待亲人一样。同志們在背地里都說他是个“老婆婆”。

說李白同志是个老婆婆，是同志們表示对他的敬爱。但假如你只从字面“老婆婆”来論断他的行动，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

三月中旬的一天，我們五軍团第二次到达貴州茅台，电台住在一座半山坡里。天气晴朗，藍瓦瓦的天空只有一个白晃晃的

太阳，連一朵云彩也沒有。远山近水，田野村寨看得一清二楚。敌人的两架飞机又按时“上班”来了。嗡……嗡……嗡……在我們电台的驻地上空直打旋。李政委和我們电台的报务員都在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掩蔽着。

“糟了！准是天綫杆子暴露了目标。要不，飞机怎么会象蒼蝇一样在头上叮着不走哩！”李政委自問自答地說。

我們随着他的話声，把視線投到了电台門前那根天綫杆子上，焦急、心乱，一时拿不出主意。就在这时，敌机便狂叫着在我們的近处，轟！轟！轟！接二連三地投彈了。霎时山崩地裂，岩石飞濺，濃烟如柱，黄尘冲天。我們的头上都涂上了一层尘土。我抬起头来拍打了一下帽子，抹了一把臉，向右边看了一眼，便大声惊叫起来：

“李政委呢？他到哪儿去了？”

“那不是李政委嗎？”鍾真益同志指着天綫杆急促地說。

剛說到“天綫杆”，轟！轟！几声炸彈爆炸的巨响，湮沒了他的話音。

轟炸声响过后，我們又抬起头来。只見李政委在天綫杆跟前十来米的地方一跃而起，象头獅子似的飞跑过去，狠狠两脚将天綫杆踢倒在地上。

“多么英勇啊！”我們都在內心里称贊。

正当李政委回身向我們爬来的时候，又一声刺耳的怪叫傳來，敌机又向李政委俯冲了下来，机枪象暴雨似的狂扫着他所匍匐的地面。

“完啦，完啦……”我們哽咽着，眼淚奪眶而出。

飛機狂亂地掃射一陣之後，飛到山後去了。這時我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縱身而起，想飛跑過去搶救，把李政委抱回來。我正想跨步奔去，忽見李政委向我們這裡連連擺手，要我們不要亂動，接着他便蠕動身體向我們爬來了。當他看見我們慌張失色的臉色，知道大家正在為他擔心和驚恐時，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流露出感謝的情意。他怕大家聚過去問長問短，暴露了目標，馬上用手勢招呼大家原地不動。因為他了解這些年輕的同志，一到感情沖動時就會不顧危險。李政委回到掩護洞里滿有风趣地說：

“敵機又白白地浪費了炸彈。可是，只要它胆敢再飛低一點，我們的神槍手就要送它回老家。”

我們听了李政委的幽默的話，都笑了起來。大家抬起頭來，仰望飛在高空洋洋得意的敵機，恨不得把它打落下來，才泄心中之恨。

不一刻，我們的願望果然實現了，李政委的話真應驗了。就是俯沖下來掃射李政委的那架敵機，又一次俯沖投彈時，被我們山頂的機槍打中了。只見飛機屁股後面拖着——條長長的黑煙，象斷綫的風箏一個倒栽葱！接着幾個筋斗，便——頭掉在另一座大山後面去了。另一架敵機，吓得屁滾尿流，趕快掉頭逃跑了。

敵機有的打下了，有的飛走了，我們趕快檢查了收發報機。沒有損壞，又架起天綫，繼續工作。

李政委不僅在戰鬥中沉着、勇敢，表現了共產黨員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而且就在平時也是處處關心同志，以身作則，勤勞

艰苦。

向云南进军时，一天从紫云出发，要赶过北盘江，部队一气走了一百七、八十里。一到宿营地，我的两只眼睛，就象被胶水粘上似的，掰也掰不开，瞌睡虫已经爬上脑顶盖了。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倒下便睡，一些年轻多觉的同志和我一样，也打起了呼噜声。

在睡梦中，我忽然听见有人叫我，长期军人战斗的警觉性使我马上惊醒过来。我一头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惊慌地问：

“什么事？”

“洗了脚再睡！”

我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见李政委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床前放了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顿时，我的睡意全消，难为情地使我的脸红到耳根。从茅台出发时，我们在行军前的动员会上就讲过，干部除在行军途中帮助同志背背包、搀扶伤病员、照顾同志之外，还要担负起每天宿营时烧水给同志们洗脚的任务。保证洗脚，在行军中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从江西出发以来，领导上都特别重视洗脚，如果头天晚上不用热水烫烫脚，活活血脉，那么第二天就会走不动了。我感到这天没有担当起烧水洗脚的工作，十分难堪，何况政委还给我端来洗脚水呢！

“政委，你洗吧。我自己去端。”我一边起身一边说。

“你快洗吧，还让个什么。你昨夜工作没有睡好，今天走了一天路，快洗了脚再睡，你今晚还要值班。”他一把按住我坐下，便匆匆忙忙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半晌也沒有动一劲，好象我被什么釘在地上一樣。直到政委和鍾真益、黃榮等同志端着洗脚水走过来的时候我才站了起来，跑过去爭着夺下政委手中的盆子。

“唉，你怎么不洗呢？水都快凉了！”政委走过去用手試了試我鋪前的洗脚水埋怨地說。

随即，他又去叫运输員老王：

“老王，洗脚了，快些起来！”

老王挑了一整天担子，睡得特別香，鼾声象打雷似的，翻了一个身，又呼噜开了。

政委不再叫他，一面給他脫着草鞋，一面对我們說：

“他也太疲倦了，难怪他不醒。”語气里带着无限的撫爱。

炊事員老何端了一盆洗脚水，一眼看見政委在給老王脫鞋，他就来火了，两步躡到老王鋪跟前，“拍拍”就給老王两下：

“你还不睜开眼看看，是政委呀——你真享福！”他經常和老王打鬧慣了，接着又說：“你真成了猪八戒了，什么时候都睡不醒！”

我們哈哈地笑了起来，老王惊醒坐起来看着政委，只是呆呆地笑着。

有的同志被我們吵醒了，有的同志被我們叫了起来，有的同志被老何打了起来。政委看見每个同志都开始洗脚了，才高兴地走开了。

炊事員老何是个老同志，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最妥和同志們打鬧。政委走了以后，他的話匣子打开了。他一边吸着烟

鍋子，一邊对大家說：

“你們這些小伙子真不象話，洗腳還得要人家照管，又不是七、八歲的娃娃……”

“別他媽占便宜，你的嘴就沒個把門的，說起話來，就象倒尿罐一樣，臭氣難聞！”老王一面洗腳，一面也不客氣地斥着老何。

大家聽了他說這番話，都嘻嘻哈哈地笑成一片。但是老何還是不放過，只見他使勁吸了一口煙，噴着煙圈說：“說正經話，你看政委多累，一到宿營地就安排大家吃住，抽空還來幫我們廚房劈柴挑水，給你們端水洗腳也不是一次兩次的事了，你們年輕輕的就沒有精神，願意變豬八戒。以後我看見再懶得洗腳，到地方就倒下睡大覺的，就給他幾金箍棒！”他用煙鍋敲了老王几下。

老王沒有還手，認真地說：“老何說得對，政委的確比我們哪一個都累。以後，我們再別叫他為我們多操心了。”他回頭對老何說：“我保證以後一到宿營地就先洗腳，你說我做得到不？”

“我不管你做不做得得到。反正我以後看見誰不去洗腳睡大覺，我就敲他的腦袋！”老何忍不住又用煙鍋去打了老王一下，接着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

吃過晚飯後，除值班的以外，政委都叫大家趕快睡覺休息，因為明天很早又要出發。

我已睡了一覺醒來，但見政委的房間里還點着燈。我很敬佩政委這種辛勞忘我的精神，但我更為他的健康擔心。行軍中的情況我是親眼看見的，自己很少騎馬，他的馬不是馱病號，就是



馱糧食，自己跑前跑后照顧大家行軍。一到宿營地，正如老何說的沒有休息過，他比誰都累啊！

我決意去勸政委休息睡覺，便輕輕地爬起來走到政委的房間。

“政委，你還沒有睡啊，都深夜了。”

“小黃，你怎么還沒有睡覺？”政委放下正在記筆記的鋼筆，抬起頭來，驚訝地說。

“我都睡醒一覺了……我看見你房間里有燈，才來勸你休息睡覺的。”

政委感激地看着我，眼光里流露出無限愉快。他接着說：“我習慣了很晚睡覺。我的身體很結實，沒有關係。”

“你的身體再結實，總不是鐵打的呀！拖久了也會垮的。”

“拖不垮的。你沒有聽說過‘百煉成鋼’的話嗎？”他微笑着看了一下筆記本，然後收了起來，把鋼筆也合上放入了口袋。隨後說：“小黃，你去睡吧。我接受你的勸告，也立即睡覺。”

李白同志在整個長征中始終如一的模範行動，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的許許多多的動人事例是說不完的，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上。我永遠懷念他。

## 飞机掉队了

四月中旬，紅軍主力胜利地渡过了北盘江，占领了贞丰、兴仁等县来到昆明城下。

昆明地区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山青水秀，遍地葱绿，鸟语花香。这虽是南方炎热的四月，可是这儿的太阳还是那么明媚宜人，徐徐的南风是那么清凉爽心。但我们以一小时二十里的快速行军，向前飞驰，汗水淌遍了全身。

我们五军团为了掩护主力——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北进抢渡金沙江，在昆明附近摆开阵势，动员群众大做爬城云梯，虚张声势作佯攻昆明模样，迫使敌人空运兵马增援昆明。那时，我们电台住在嵩明以南，离昆明三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看见敌机天天从东北飞来，如同定期到达昆明的班机降落在城下。

由于敌人空虚恐慌，简直不敢离城一步，死守城垣待援。我们则在城外养精蓄锐，有的洗补衣服，有的在互相帮助剃头，有

的編草鞋，有的在擦槍、磨刺刀，有的在發動群眾打土豪，分財物，而且还擴充了新兵。三個月行軍作戰的疲勞又全部消除，恢復了精神。

在昆明這些天，野戰軍的各電台每早都告以“出發”的特約信號。從這裡知道一、三軍團和軍委是在向金沙江急進中。

所有的通報對象都在行軍，白天沒有工作，我們便出去做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政策，擴充新兵。

這時，紅軍完全擺脫了敵人的尾追和阻攔，蔣介石的主力遠遠被拋在後面。從遵義會議之後，軍事上的主動權完全操在毛主席的手中。同志們高興地說：

“蔣介石是個大草包，打起仗來才糟糕，東一跑來西一跳，丟盔棄甲人馬光。叫他堵長江，就去堵長江；叫他守烏江，就去守烏江；叫他保貴陽，就去保貴陽；現在叫他來昆明，他就來昆明。蔣介石聽毛主席指揮了。”

一天軍委來電說，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將全部過完金沙江，令我軍團立刻放棄昆明火速趕去過江。

從昆明附近出發的头一天下午，我們電台政委李白同志從司令部開會回來，樂顛顛地跑來對我們說：“我們已經完成了掩護任務，又要急行軍了。這次急行軍怕同過湘江差不多。電台是全軍的耳目，我們要保證沒有一個掉隊的同志，有掉隊的就要影響工作。”听了李政委的話，我們都下了決心：保證完成任務。

晚飯後，開動員大會，政委講明了過金沙江的重大意義以後，要求同志們發揚紅軍光榮傳統，互相幫助，克服困難，保證沒

有一个人掉队，胜利过江。这些都是政委每次急行军都要说的话。他永远记着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是灵魂。”他很善于抓住机会对同志们进行教育，关心同志们的进步。

第二天，天刚亮，老乡们还没起床，部队就整队出发了。我们踏着朝露，迎着红霞，呼吸着新鲜清凉的空气，迈开了虎步，开始急行军了。

一个上午，我们竟走了八十里左右。同志们不知哪来的劲儿，吃过自己带的午饭，步伐较上午更加快了。前面不知哪个俏皮的同志冒充指挥员发出“往后传，飞机掉队了”的滑稽的传话。这是什么行军传话呢？为了不影响传话，我也传给后面的同志。我一边走，一边为“飞机掉队了”的传话纳闷。忽然李政委跑到我们的身旁，亲切地问：

“小黄，累吗？快去骑马吧，到地方你还要当班工作。”

“不，政委，我一点也不累。看你身上都背了两个背包、两枝枪哩！”李政委笑了笑接着说：

“小黄，当兵当兵二十五斤。我这个大个就应该来个双份。你没听说，敌人行军也要背两枝枪哩！”

原来，王家烈的兵都吸大烟，带一枝步枪、一枝烟枪。我们都笑起来。我问：

“政委，我们这样快速行军，一天恐怕要走它个一百八、九十里吧……那敌人捡烂草鞋也捡不着了。”

“是啊！敌人那些烟鬼、痨病鬼怎么行，我们这样七走八走的，他早就见不着我们的影子啦……你没有听见吗？刚才的传

話‘飞机掉队了！’你看，战士们用了多么形象的语句，来描写我们的急行军呀……哈哈……”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样的传说，正是生动地说明了同志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也说明了红军对敌人的鄙视。

这天我们整整走了二百里。晚上，我们宿在一个村庄里。一到宿营地，身子就象刷了浆子的布壳完全僵硬了，铺了被子，倒头便睡。说实话，在酷热的太阳曝晒之下，荷着枪，背着东西，身上几十斤重，走得那么快，汗珠滴滴地流出，衣裳湿透了，加上只是早上吃了顿饭，中午吃了点干粮，走了二百里，虽说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这时也确实太困倦了。更不用说还要值班工作呢！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又出发了。同志们精神仍然抖擞，虎势阔步地在道路上奔驰着，就好象今天才第一天出发似的。但是，走到二道河附近吃中午饭的时候，忽然从后面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和噼啪的枪声。原来，我们后面的三十九团跟从旁侧袭击来的敌人万耀煌部打起来了。究竟是边打边走，还是停下来摆开架子打一仗呢？我们正在猜想时，突然传下了命令：不走了，要打仗。战士们一听要打仗，都乐得摩拳擦掌地蹦跳起来。大家吵着说要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五军团的厉害。

这一仗打得很好。原来敌人只以为我们打打枪，掩护掩护部队前进，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和他们大打一仗。司令部很快地部署了战斗，军团侦察连从二道河绕至敌人的后侧，击溃了敌人

的敢死队四百多人，三十九团从坎登出敌意外地来了一个猛虎下山岗的猛击，象疾风扫落叶似的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拔腿追击，一气追了几十里。敌人看我们猛追，简直摸不着头脑，他们认为我们要反攻昆明，吓得星夜逃走，又保昆明去了。谁知我们却并不远追，急忙收兵，回头又向金沙江飞驰。这一来，真把敌人抛到了九霄云外，云里雾里，蒙头转向。待敌人大梦初醒连夜追来时，我们五军团全部人马已顺利渡过金沙江，与敌人隔江挥手告别，敌人气得直跺脚，而我们只派了一个侦察连守住渡口，敌人也就毫无办法了。

大队人马欢天喜地又向会理前进了。

我们到达金沙江已是下午四点左右，烈日吐着火焰，把沙石烧得滚烫，我们热得头脑发晕了。

靠江两岸，万山重迭，高耸云霄，峭壁悬崖，令人惊心。树木稀少，零星的枯草，点缀着光山野坡。晚霞映射在沙滩，闪着金黄色的光芒。啊，这就是金沙之江！站在江边，举目一望，江宽约三百米左右，两岸是陡峭的石壁，白如镜面的江水湍急飞奔，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白色巨龙在飞舞。滚滚的江水飞溅起浪花，不时狂打在两岸的石壁上发出巨响，江水的喧嚷，有如万马奔腾。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因为江水湍急，过去的船只需七、八分钟光景，然而回来的船则需首先上行好几里，然后顺流飞来，就需要半点钟的工夫。船行在江上，忽而被巨浪抛起老高，忽而被巨浪吞没不见踪影，真是令人胆战心惊。想起在黑夜抢渡金沙江的干部团的勇士们，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金沙江里浪滔滔，  
两岸峭壁插云霄，  
巨浪翻滚几丈高，  
船行水上一叶飘，  
时而吞没无踪影，  
转眼抛向大山腰。

金沙江里浪滔滔，  
红军意志比天高，  
哪怕急流似飞箭，  
何懼巨浪起狂涛，  
英雄插翅要飞渡，  
征服金沙立功劳。

天險的金沙江渡口是这样占領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帶領總部幹部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從幾百里路外一下子撲到了江邊，捉到了過來偵察紅軍的一隻船。晚間，幹部團便偷渡過去了一排人。敵人以為他們自己人回去了，便喊：“喂！你們怎麼搞的？才回來！”接着，便是一聲低沉而嚴肅的命令：“不准動！”敵人的兩個哨兵莫名其妙地當了俘虜。紅軍押着被俘的哨兵，衝到敵人的連部，從容地叫着：“開門！”里面聽到叫門，很不高興地罵：“活見鬼，半夜來叫什麼門。”紅軍戰士聽到從屋里傳來“白板”“三索”打麻將的聲音，便又拍打着緊閉的門欄：

“開門啲，先生！”

“干什么的？”

“过路的。”

“过什么路，明天再来。”

“我們过路的，来納稅的呀。”

“納稅的？好！好！”

敌人听說是来納稅的，便急忙出来開門。这些搜刮民脂民膏的蠹虫滿以为可以弄到一把錢了，却意想不到紅軍从天而降，只好束手就擒。紅軍沒有費一枪一彈，就捉到六十多个俘虏，垂手夺取了天險金沙江。

五軍团从昆明到金沙江，急行軍五天，每天行程平均一百七、八十里。这是从江西出发第二次最快的急行軍，但却不象搶渡湘江那样漫无秩序了。

一方面軍全部人馬过金沙江后，便駐軍于会理附近。一来这里的群众条件好，二来敌人又未过金沙江，三来从遵义出发后的急行軍(除五軍团在昆明休息外)使全軍很疲憊，因此，軍委决定在这里很好地休息一下。这是从江西出发后第二次休息。

在会理，住了一个星期。剪了头，洗了澡，打了新草鞋，补了破衣服。有的衣服实在不能补了，便把繳获地主反革命的那些紅綠大褂都拿了出来穿。开始几个人穿还不觉得怎样刺眼，后来穿的人多了，五光十色的簡直很不成体統，必須染了才能穿。但哪儿去找染料呢？紅軍总是有办法的，大家开动脑筋，把廢电池里面的炭棒取出来，和衣服煮在一起，終于染成不紅不綠了。就这样，一部分人又换上了新衣服。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穷的太穷，富的太富，地主家粮谷满仓，鸡鸭成群，猪肥牛大，我们发动群众，展开斗争，把地主家的财物分给穷人。

我们电台，当时住在距会理城南十几里的地方。白天，怕敌机来轰炸，把收发报机都搬到麦田里工作。我们挖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坑，几个人看守天线杆，敌机一来便拔掉天线杆，伏在麦田里，敌机走了再立起天线杆，继续工作；晚上，我们又把机器搬进屋里来。敌机天天来，但是找不到目标，我们舒服地蹲在坑里指着它骂：“瞎了你的狗眼，我们就在你眼下，你也看不见，真是个大瞎蛋！”

## 时針不会倒轉

紅軍渡过了惊濤駭浪的天險金沙江之后，进入了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更严重的困难。这时，唯一能够前进的道路就是水急河寬，既无桥又无船的大渡河，这是更大的天險。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大軍向大渡河挺进。

过大渡河，由会理出发，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經過西昌，翻小相岭，从越篛到大树堡渡河，对岸便是富林，这是去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經西昌到泸沽，向左走至冕宁，通过“保保区”，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順場，这是一条崎嶇的羊腸小道。走第一条路已不可能，因为敌人已在富林、大树堡等地部署了重兵扼守，堵截我們，于是只得走第二条路了。但是，为了迷惑敌人，我們五軍团占領了越篛，作出意欲强渡富林的模様，以掩护大軍直趋冕宁。待先头部队已过“保保区”到达安順場时，我們五軍团才迅速折回，快步赶去。

到达冕宁那天，天气热得使人发慌。蓝澄澄的天空万里无云，火镜似的太阳象带着千万根钢针扎得人生痛。树叶蒙着一层灰在树枝上打着卷，灰蒙蒙的野草在路旁弯着腰，狗儿趴在地上长伸着舌头，骡马喷着鼻子喘气。没有一丝风，搧扇子的风也是热火火的。每个人的脸上热汗直流，一摘下帽子脑袋就冒着一股股热气，好象揭开的锅盖。天气是太炎热了！

在街沿坐着休息时，当地群众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蜂拥着围了上来，端来茶水和点心，你不喝点吃点，他们怎么也不罢休。我们吃了一些，也给了钱。一些胆大的小孩还跑过来摸我们的机枪。有几个小孩摸着我们电台无线电的机器又说又笑，象在看宝贝一样满心欢喜。从这些情况看来，前面部队在这里已召开过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性质，而且宣传工作做得很好。

休息的时候，看见几个身材高大、骨瘦如柴的保民。他们披着破烂的“察尔瓦”（羊毛织的衣服），长长的头发垂吊在黄蜡般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却闪着喜悦，向我们作揖致敬，嘴里念着红军“卡沙沙”（谢谢红军的意思），红军“苦瓦瓦”（万岁的意思）！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前面部队从县政府监牢里放出的保民。国民党怕保民不肯上粮纳税当差，就从他们各个部落里抓来一百多人关在监牢里作抵押，这一批完了又换另一批，轮流坐监，永无休止。红军来了，放了他们，他们感激得很。说红军要打国民党，有些保民也报名参加了红军。

“这简直是土匪，是绑票嘛！这些混蛋王八！”我们听完老乡

的訴說后，都憤恨地罵反動派。

李政委借着这个机会便向聚过来的十几个老乡宣傳了党的民族政策。政委說：“由于国民党官府长期地用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兄弟和我們汉人結下了冤家仇恨。汉人也好，少数民族也好，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子，大家都要象亲兄弟一样和睦团结。我們都是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强盜，打倒蔣介石、国民党反動派……”老乡們听了这番話后都連連点头。

在冕宁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繼續前进了。

从冕宁出发，每人除从前携带的物件外，又新增加了木板、竹竿、繩子一类准备在大渡河架桥用的东西。太阳毒得很，把沙石晒得燙脚，风也是热火火的，汗水把衣服湿透了，粘漉漉的湿衣紧裹着身体，使人十分难受。

下午，到达了“保保区”的边界——大桥。許多老乡都来欢迎紅軍，他們提了茶壺，拿着大碗，拿着香烟、糖果，热情地招呼：“紅軍先生，請用。”我們吃了一些，都按价給了錢，他們非常高兴。这些老乡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面色焦黃，一臉光骨头，个个都是瘦筋筋的，他們被軍閥土豪压迫、剝削得苦不堪言。除了汉人来欢迎我們以外，也有許多保民。他們头上卷着一卷头发，身披破烂的“察尔瓦”，都是赤脚，男女都不穿鞋，女人都穿衣裙，不穿褲，耳戴长条彩石环，見了我們嘴里咿咿呀呀的在說着“卡沙沙”“苦瓦瓦”，拱手作揖向我們問好。

我們在大桥休息了一下，宣傳員同志向各个单位又进行了

一次宣傳。大意是說：從大橋上山，便到“倮倮區”了，要嚴格遵守他們的风俗習慣，不准隨便到民房去，不准住民房，不准燒他們的柴草。他們生活很苦，如來向我們要錢要東西，都盡量地給他們一些。宣傳員還講述了軍委劉伯承參謀長，跟倮倮族的一個沽鷄家部落頭目小叶且，在海子邊喝鷄血結義弟兄的事。

出大橋，一片荒蕪，沒有人烟，行走約十餘里，便開始上山，走了幾個山坡，便看見有二、三十個彪形的倮倮兵，裹著頭光著腳，有的拿著梭鏢，有的拿著舊式步槍。他們還拿著紙紅旗，有兩個頭上還頂著紅軍布告。這是來歡迎我們的。見面以後，他們就圍攏來看我們的槍炮，看我們的臉巾茶缸，有的向我們討錢，有的向我們要子彈。當天，在拖烏露營，按照規定我們不進民房，用自己的行軍鍋、臉盆做飯吃，燒飯的柴火也自己上山撿。在大橋以南天氣挺熱，這裡卻變成秋天一樣，夜晚露營還有點冷呢。

第二天，到了離安順場六十里的小堡子，只有三十多家人，又是大雨傾盆“雨營”了一夜，大家凍的直哆嗦。

由於黨和毛主席偉大的民族政策，爭取了少數民族的同情，我們順利地通過了“倮倮區”，克服了過大渡河的第一個困難，來到了安順場。

在群眾的支持下，先頭部隊一軍團第一師的十七個勇士從安順場強渡了大渡河，消滅了敵人的一個營，隨後第一師全部渡過河去。但是水急如箭，水深無底的大渡河無法架橋，雖作過多次嘗試，但均被沖垮。架橋不可能，船又很少，何況尾追之敵相隔不遠了，阻攔的敵人又大量增援上來，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

下，不容許延誤時間。於是紅軍毅然決定奪取離安順場三百里的瀘定橋。渡過河去的第一師從右岸而上，第二師從左岸而上，整個野戰軍隨後，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沿着大渡河兩岸直奔瀘定橋來。

五軍團還是擔任壓後掩護任務，通過了“保保區”到安順場，又火速前進了。

從安順場出發，走不遠，又遇着傾盆大雨，整整下了兩天兩夜，雨傘、雨衣、油布全失掉了防雨作用。

大家淋得象水貓似的，風聲、雨聲、奔騰的水聲，呼呼嘩嘩地叫成一片，象天要坍塌下來似的。紅軍就在這兩岸高峰形同峭壁的大渡河左岸，右面臨河，波濤洶湧，左靠高山，直聳入雲之間沿着崎嶇的羊腸小道，開伐道路，攀藤附葛，攀登懸崖，沖鋒陷陣，殺退敵人來到瀘定橋邊。

大概是由於長期行軍，飲食失調，過“保保區”時又喝了從雪山流下的生水的緣故，從安順場出發那天起，就開始有瀉肚子的，經過兩天的雨淋，瀉肚子的人越來越多，差不多全瀉肚子了。

瀉了幾天，人的眼睛都陷進三分了。本來，在這樣的大熱天行軍，又要走一百多里的崎嶇不平的山路，已經是够受的了，再加上拉肚子，其情景當然可以想象。然而，紅軍戰士却在“不怕累不怕餓，堅決奪下瀘定橋”的口號下克服着一切困難，還是歡天喜地快速前進。

當時，我的肚子也拉得很厲害，簡直是提着褲子走路。

一天下午，途中坐下休息了。政委李白同志跑到我身旁，關

切地問：

“小黃，拉得不行了吧，來，我給你拿點東西好嗎？”

“不，政委，你不也拉肚子嗎？再說，我還能支持得住。”

“我知道你的倔脾氣，是個好小伙子。但是，這山路不好走呀！”

“政委，別說我還能走，就是爬，我也要爬過去！”

“噯，這麼堅決！”

“政委，這事情我還沒有對任何人講過……好吧，我就給你講。我負傷以後從黃平到遵義，有一次下大雨，路滑得站不住腳，要上一個陡坡，那時我的左手綁吊在脖子上，就是匍匐在地上用兩肘爬上去的。傷口疼痛厲害，爬上後，我就昏迷過去了。”

“為什麼同志都不幫助你？”政委用責怪的口氣問。

“不怪同志們……”我連忙解釋，但政委打斷了我的談話。

“噯，我知道了，一定是你不肯。”他微笑着看着我，“這樣也好，紅軍戰士就要有這樣的骨氣……再說，年輕小伙子多吃些苦，這也是鍛煉……不過，你這次拉肚子，實在吃不消了，你就讓我給你拿點東西吧。”

我堅決地搖頭，他懷着愛憐的心情把我看了很久，拍了拍我的肩膀，點了點頭，便走開了。

當紅軍向“倮倮區”前進時，蔣介石在南京準備慶祝呢！吹噓什麼“共匪”已經進入天羅地網了，走上了末路，說什麼“朱德和毛澤東要變成石達開第二了”。一切反動統治者總是希望革命的新生力量被消滅，希望歷史停止前進，甚至向後轉。然而敵人怎

么能懂得人民革命的新历史呢？他们只能以已经没落的历史观来安慰他们即将死亡的政治命运，他们一时的“欢笑”将变成死亡的丧钟！

我们从安顺场出发，每到一宿营地，便津津有味地开起讨论会来，讨论红军会不会变成石达开第二？为什么？

我们电台的同志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题时，发言可热烈了。

李政委主持讨论。他刚说完谁发言后，同志们就纷纷举手要求发言。

一个运输员老张首先发言，他说：“敌人封锁了湘江，说要把红军消灭在那里，结果我们胜利过来了；敌人封锁了乌江，说红军过不去，结果我们又过来了；敌人封锁了金沙江，说红军过不去，结果我们还是过来了；大渡河有什么了不起，十七勇士就已经抢渡过去，消灭了敌人的一个营。”

“红军是红军，不姓石，这是蒋介石白天说梦话，胡说八道。”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红军战士打仗勇敢，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所以大渡河天险也要过去！”

“红军是工农阶级组织起来的军队，有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战士都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勇敢、坚强，必要时可以牺牲宝贵的生命……从江西出发，我们遇到了多少困难：天上有敌机，地面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追击，还有反动地方武装的捣乱。但是我们却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正象时针不会倒转一样。我们是



工人农民的军队，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红军战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阶级战士，机警、顽强、勇敢，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伟大的奋斗目标，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红军永远胜利，永远不会失败！

今天，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我们当时的论断是多么正确啊！

五军团到达泸定桥时，抢夺泸定桥的战斗早已结束，敌人已被先头部队打得鸡飞狗跳，逃出了泸定县城了。

抢夺泸定桥的这个光荣战斗任务，是一军团第四团担任的。

一个亲身参加了泸定桥战斗的孙耀明同志，在抗战时期和我一起工作时告诉了我这段战斗经过：

“当时，敌人把桥板抽了，只剩下几根光铁索。敌人在对岸约有三个团的兵力防守，桥头河边一带以及山上，都筑有坚固的工事，两挺机关枪架在桥头上，象放连珠炮似的不断向我方扫射。敌人很洋气地向我方喊话：‘共匪，你能飞过来？你飞过来，我们就乖乖交枪！’敌人欺负我们没有长翅膀，我们战士也高声回答：‘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枪！我们不会飞，我们会爬呀！’

红军英雄们为了北上抗日，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胜利，一切都寄托在泸定桥战斗的胜利上。当时我们接到军委‘坚决迅速夺取泸定桥’的命令后，全体指战员热血马上沸腾起来，纷纷要求参加夺桥战斗，最后挑选了久经战斗考验的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织成抢桥战斗的突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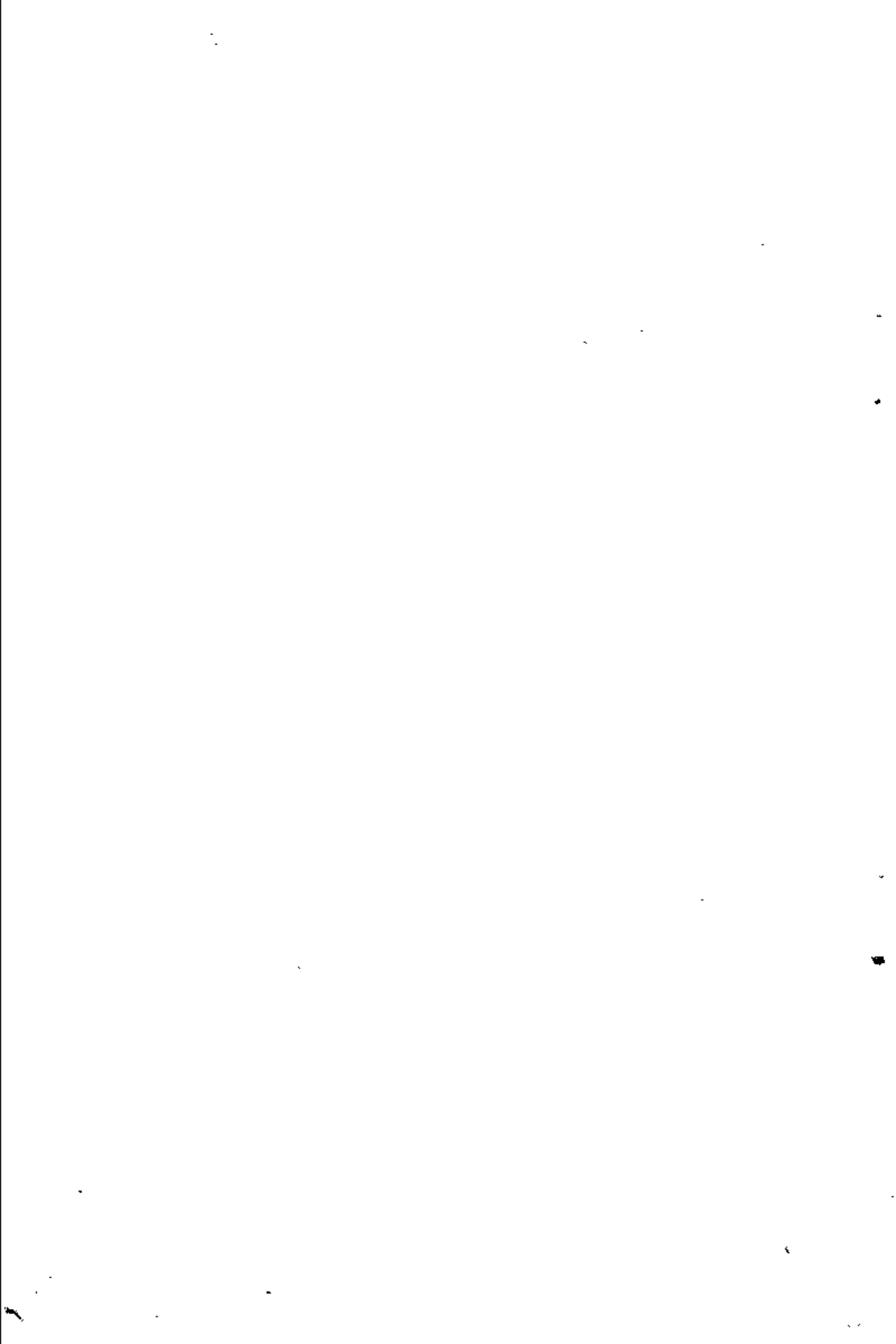
当指揮員將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二十二名英雄时，他们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而感到无上光荣和骄傲。为了桥、为了全军的胜利，个个都抱着自我牺牲的最大决心去战斗，有的先写下了‘遗书’，有的把身上剩下的钱全部交作党费或团费，准备把宝贵的生命交给党，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然后满身束上手榴弹，手持雪亮的大刀，挎上二十响盒子枪，在同志的掩护下，跳出工事，爬上铁索，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向敌岸冲过去。英雄们刚冲到对岸桥头，敌人放火把桥头的亭子燃烧起来了，企图阻止英雄们前进，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我们都为抢桥的英雄们担心。但只见英雄们象怒狮似的跃进火焰，接着就是一阵巨响，浓烟如柱，全然看不见人了。待浓烟散后，看见敌人的工事全毁，二十二个，不，是以一当十、十当百的英雄，迅速控制了桥头阵地。敌人一个营组织反扑，又被打垮了。英雄们冲进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烧了，眉毛、头发烧了，一切都不顾，只是冲杀，一直追到市镇的街上和敌人进行巷战。子弹、手榴弹打光了，拔出了马刀和敌人厮杀。正在危急时刻，后续部队赶来了，把国民党那些烟鬼兵打得鼠窜四散。抢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名英雄光荣牺牲了三名，泸定桥就这样胜利地占领了。”

英雄们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又一次创造了战斗奇功，为红军杀出了一条继续北上抗日的道路。

一方面军过了大渡河，便向四方面军靠拢，六月中旬两大主力红军于川西北的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了。

雪山草地





### 三 过 雪 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我們剛剛战胜大渡河天險，又攀藤附葛走出那澗不可下、岩不可攀的抱桐崗，来到天全、蘆山向邛崃山脉前进。面前横亘着人迹罕至的雪山——夹金山。

从天全出发，就傳来了过雪山的消息。同志們听了都感到有点奇怪：六月三伏天，哪来的雪？当地群众还告訴过我們：“过雪山得上午过，不然，过了十二点‘神风’一来就过不去了。过山的人都得带一块小木板，到了山頂留給‘山神’……到了山上不准說話，不准笑，不准坐，否則触怒了‘山神’，‘神风’就会把你打死……”

这自然是迷信。革命战士都是唯物主义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神怪可信的。但是我們当时听了这些話，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我們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来自祖國的南方，別說是雪山，就連雪花是什么样，还没有看見过呢！然而长征路上那些艰苦險阻

的历程又自然地使大家联想到雪山的險惡了。

穿枪林、越彈雨、渡天險、攀峭壁，宇宙間能够阻挡紅軍前进的力量还未曾有过呢！

队伍到了宝兴，領導上就动员大家要做好过雪山的准备工作。要求每个人都尽量买酒、辣椒、生姜、胡椒等能起御寒强心作用的物品。可是这一带人家很少，又加上前面已經过去了好些队伍，这些物品也就很难买到。

来到大碓磧，前头的三軍团派回来几个同志介紹过雪山的經驗。他們告訴了我們雪山的秘密和过山必須遵守的“規則”。他們說：夹金山拔海四千余公尺，高聳云天，从山脚下到山頂上三十余里。山腰云霧繚繞，看不見山峰，下山只走二十里便到川康高原。每到下午則狂风怒号，大雪飞揚，风雪交加之际宛如暴风席卷沙漠，天昏地暗，一不小心就会被大风刮跑。天气很特別，山下很热，山上很冷，象两个天下。总之，群众的傳說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应当作好充分准备。为順利地过山，当时曾規定：十一点以前通过，走到半山腰以后，不要快走，不要不走，緩緩不停地前进，不准坐下来休息。上山不要唱歌，不要講話，走路要跟前人的脚印，不要自己开路。

有了先头部队的經驗，我們將从大碓磧出发到大維的一百三十里路程，分作两天走：头天到夹金山脚下露營。第二天，天剛亮就开始上山，翻山時間充容一点，以保証十一点以前翻过雪山。

雪山，多么雄偉啊！它象一把白色的宝劍，放着寒光，威震

天下，直插云霄。雪山，多么险阻啊！有如一道白钢的墙壁顶天而立，飞鸟难展翅，走兽无踪迹。雪山啊，多么险恶！狂风卷冰雪，天摇地动，鬼神皆惊。但是，雪山啊，你能够挡住红军战士吗？红军战士生就一双钢铁的翅膀，他们要从剑刃上飞过，他们要把钢铁的冰雪墙壁打穿一条通路。看，那就是我们的红军队伍，云里红旗飘，人在云上绕，雪山，飞过去了！

沿着夹金山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步步地往上爬，这是先头队伍开出的路，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太阳出来了，站在山下向上望去，山顶闪闪爍爍发着寒光，寒透心腑。同志们无声无息，只是微笑着，招着手，就象一条巨龙盘山一般回绕着向上爬去。越往上爬路越小，山越高，坡越陡，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急促。但是，同志们个个不示弱，爬一步，停一停，一口口地倒气，实在太疲倦了，要倒下了，但是不能，大家都记着出发前的规定。风暴刮起，真是飞沙走石，那碗口大的雪团猛打在人们的脸上，头昏眼花。任凭风削，任凭冰雪打，红军不怕它，手牵手向上爬。人被大风打倒了，被大风卷走了，五星军帽飘向九天云外。那就让它去作证吧：这是当年红军留下的纪念！

在风雪中，在刀山下，我们沿着前头部队踩成的一条雪巷前进。在这用千万双脚踩成的雪巷的两旁，静静地安眠着上百具英勇的红军战士。他们为了给红军过雪山开辟道路，他们为了给中国革命事业开辟道路，在这冰天雪地，含着自由的微笑，愉快地闭上了眼睛！他们的尸体冻僵了，我们用双手为他们筑起高大的雪坟。他们就象这冰雪的大山一样永远屹立不拔！

我們电台挑机器的运输員老赵爬到半山腰，一步不小心，便滑到三丈多远的的一个雪坑里，政治委員李白同志急了，不顧一切一骨碌滑了下去拖他，可是李白同志也摔进雪坑里去了。好在那个雪坑才半人多深，沒有被雪埋盖进去。他俩掙扎了半天也爬不上来。我們在上面急得滿头大汗。后来，我和黄荣、鍾真益同志把三双綁腿解下，扭成布繩丢下去，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俩拖上来。

雪，軟綿地象棉絮，幸好，人沒有摔伤。但是，收发报机却摔坏了。

李白同志抱着烂机器爬了上来，叹了一口气，說：“怎么办？工作成問題了。”机務員陈明同志說：“到地方想办法修吧！”后来到了大維，找到四方面軍的电台要来一些零件，好容易才把机器修理好。

李政委把收发报机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一晃一晃地又繼續向上爬。

快到山頂了，只有二百公尺左右，空气更加稀薄，呼吸几乎停止了，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空蕩蕩的，好象三天沒吃飯。

到了山頂，个个筋疲力尽，但个个精神振发。又一关被冲破了，那时真不知这一路是怎样走过的。紅軍战士鳥瞰脚下，群峰綿亘起伏几千里，云在脚下、天在脚下，祖国的大地都拥进我們的怀抱，我們的心头不知有多么暢快，然而这只是一瞬之間。国难当头，当我們想到蒋介石出卖东北、华北，祖国正遭受日寇鉄蹄蹂躪的时候，怒火又在心头燃燒，战士们一个个紧握着鉄



攀，望着山腰处那几百堆高高的雪坟，暗暗发誓：头可断，血可流，不辱国耻，誓不休！

下出了，又走了一段路，大家才感到轻松了一点，又重新回忆起上山的经过。不知是谁讲了一句：“上级真想得周到，要不叫那条规定，雪山也就过不来了。”是呀，这时大家才完全了解“不要快走，不要不走，不准自己开路，不准坐下休息，不唱歌，不讲话”等等规定的原因。因为走快了呼吸量不够，就会昏晕；自己开路就有坐“汽车”滑下山的危险；那样疲倦，要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唱歌讲话会消耗氧气而上不去山……。

终年冰雪不化、人迹罕至的夹金山终于过来了。

走下山来，忽然卷起狂风，太阳被一层密密的乌云挡住，天昏地暗，接着一阵急雨，雨中夹杂着冰雹。不一会儿，又雨止风停，太阳又恢复了原有的光亮。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山下走去，把那高大的雪山远远地撇在后面：

啊！雪山雪山！

山峰高插入云天。

千秋积雪不化，

地冻冰厚三尺三，

悬崖绝壁坡道陡，

大雪风暴遮天。

红军北上翻雪山，

哪管它峰高路险！

哪管它雪地冰天！  
勇敢往上爬，  
牺牲也不怕，  
用革命烈火，融化冰山。

下午三点多鐘，我們安全地到达了大維。四方面軍的同志，沿途摆着开水，热情地招呼我們喝水。

紅四方面軍原来活动在川陕边，以南江、巴中、通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英勇无敌的紅四方面軍，曾先后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苏区得到巩固。但是，当时在四方面軍工作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墮落为革命叛徒的張国燾，当他知道一方面軍撤出江西长征以后，便認為革命低潮到来了，应该实行总退却，擅自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占閬中、劍閣、彰明等县，接着又过涪江，占北川、茂县，再渡岷江，向川康边退却。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与一方面軍会师于懋功。

一、四方面軍会师后，我們在馬尔康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我仍在一方面軍五軍团电台工作。革命更加艰苦了，沒有粮食吃，我們就天天到几十里外的山上去打野物。可是，我們这个单位一連去打了几天都空着两手回来，同志們有些泄气說：宁肯少吃些和餓些也行，再不跑冤枉路，弄得筋疲力竭的，反而更餓了。

就在大家出怨言，不願再打野物的第二天，李白同志又来动员我們去打野物。那天天气晴朗，微风吹散了霧气，太阳露出了头，白亮亮的，这是草地少见的好天气。吃过一点早飯后，李白

同志兴致勃勃地跑进屋来，对大家说：“今天天气很好，这是打野物的好时候，我想，今天我们一定会满载而归的。你们说呢？”

我是理解李政委的心情的，眼看着再过两天就要断顿了，不去打野物解决吃饭问题，又怎么办？一听李政委这么说，我就赞成，何况今天的天气也很好，说不定还会弄两只什么回来呢。

“对，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走，反正在家也没事，不能等着饿肚子。”我期望着大家赞成我的意见。

“李政委！不是我说话泄气的话，我看天气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一连几天，都一无所获，吃饱去，做着肚子回来光赔本，人都弄得腰酸腿疼。我看，干脆算了吧，别再跑冤枉路了。”老王懊丧地说。

“嗯。其他同志的意见呢？”政委笑咪咪地问。

“去也行，不去在家歇一天也可以。我反正是少数服从多数，没有什么意见。”老张第二个发言。

“我想，政委说得对，今天天气很好，有希望，我不信，到处是山，就找不到一点好吃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不过这几天天气不好，没有碰到野兽罢了。哼，只要有，它就逃不掉，我们都是神枪手，你们今天看我的！”黄荣同志兴冲冲地讲着。

“好，我赞成老黄的意见，再去打一天。再说，粮食都快吃光了，不能等着挨饿。”陈明表示赞同。

其他同志也赞成了。我们急急忙忙准备好枪弹，就出发了。

我们在树林里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快步走着，但是大半天也没碰到一头野兽。老王、老张的情绪又有些低落了。

我和政委怀着忧虑的心情走着，沒有說話。突然，我发现在距我俩二百米远的一棵大树下，有一头似牛非牛、似野猪又非野猪的怪兽，正懒懒地趴在地上舒展身子。我高兴极了，生怕那野兽听见了我们的动静。我几乎是在喉里说话，轻声地叫着政委：“李政委，李政委，你看……”“砰砰”两声枪响，那怪兽怒吼了几声不动弹了。政委高兴得象孩子似的大声对我说：“小黄，打着了！”“政委，你枪法真准，真是神枪手！”我赞美地说。

我俩跑了过去，其他同志也随枪声跑了过来。这的确是头怪兽，大家都叫不出它的名字。这家伙还真有重量，四个人才把它扛回来。

当天晚饭，我们欢喜地大嚼大咽，这是许多日子以来没有吃过的美味了。饭后，大家围坐谈论着今天的猎获。

“我们可以改善两天生活了。”但是，政委语调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他向来决定某一项重要工作时常有的态度。他接着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改善生活，可不要忘记更需要改善生活的伤病员同志。我个人的意见是：除我们留下一部分外，其他的都送给医院的伤病员同志吃。我想，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吧？”

是的，谁都不会有意见的，从江西出发的那一天起，即使是在枪林弹雨中，同志们都没有一刻忘记过阶级友爱。

但是，我不得不惊叹，李白同志对同志们深切的关怀，就在这个时候还想得那么周到，表现着共产党员那种同舟共济、舍己为人的高尚美德。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一、四方面軍会师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繼續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据地，以迎接日益发展着的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紅軍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党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議。党正处在艰难的日子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却发生了两条不同政治路綫的斗争：一条是以党中央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綫，另一条是以張国燾为代表的坚持退却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这两条不同政治路綫的斗争，在一、四方面軍会合后，中央两河口会議为开始，发展到張国燾公开反对紅軍北上，破坏党和紅軍的統一，自立伪中央为最高峰。

当时，毛主席对国内外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这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証明。毛主席認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党内三次“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使它受到严重挫折，但并没有失敗，而且也不会失敗。只要我們接受历史教訓，改正錯誤，我們就能繼續取得胜利。毛主席特別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他認為：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領了东北，向华北进攻，企图灭亡中国，就使民族矛盾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由于大敌当前将逐渐降为次要矛盾。因此，国内阶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除少数的民族敗类、卖国賊和亲日派以外，民族資产阶级将发生动摇；小資产阶级在大革命失敗后跟着大資产阶级跑，但这时他們会逐渐向左轉，同情和拥护民族革命运动；广大的中国人民都会团结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旗帜下面，而国民党中的爱国軍人也会逐渐轉向抗日。如“一二八”十九路軍的抗

战，就是証明。毛主席認為，当时正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的任务，应该团结大多数，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发动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党所领导的工农紅軍，应当迅速开到抗日前綫陣地发动抗日战争，驅逐日本，收复失地。

右傾机会主义者張国燾則認為：中国革命战争基本上已經失敗，发展到三十几万人的紅軍只剩下几万人；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已全部丢失。以蔣介石为代表的中国資产階級已取得政权和巩固了政权，中国革命处在繼續退潮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希望同蔣介石联合抗日那只是“小資产階級的幻想”。因此，張国燾認為，既然中国革命处在繼續退潮时期，党的任务是：领导和組織革命退却，保存有生力量，观察，等待，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为此，他主張在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反对把紅軍开赴抗日前綫。

这是一场激烈的严肃的政治原則的斗争。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綫的斗争。經過毛澤东同志耐心地說服，最后大多数中央委員贊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綫，否定了張国燾退却逃跑主义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

当年八月間，紅軍按照党中央的決議，組成左右两个縱队，分左右两路北上过草地。右縱队为党中央毛主席亲自率領，以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团，加上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两个軍組成，由毛儿盖經毛龙出腊子口到甘南北上；左縱队由朱总司令、張国燾率領，以四方面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加上一方面軍的

五、九軍團組成，由卓克基經上、下阿坝轉東北到甘南北上，但是，左縱隊走到阿坝時，張國燾則公開了反黨、反中央，背叛革命的真面目，進行破壞黨和紅軍統一的活動，不執行北上命令，擅自率軍南下，扣下五、九軍團，又電令右縱隊中原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三十兩個軍南回。毛主席則帶領一、三軍團繼續北進。

那時我們已進到了大藏寺以北距阿坝不遠的地方，這一帶的藏民房子多數用牛馬糞糊牆、蓋頂，房頂再鋪上石板。那幾天正下着連綿不斷的秋雨，雨沖着牛屎澀澀漸漸地滴漏在我們的床鋪上，地上變成了粘糊糊的糊個滿腳，使人麻剝剝的起着雞皮疙瘩，發生痙攣。有兩個運輸員已病倒在床上，發着高燒，說着夢囈。一連住了好幾天，部隊也不北上，同志們都沉郁起來，一來是擔心着生病，二來是擔心着糧食不夠吃，三來是急切地盼望着趕快北上走出草地。

一天夜里，李白同志去軍團部開緊急會議直至十點多鐘才回來。同志們都熟睡了，只有我九點鐘下班，靜听着秋雨的肖肖聲在等他。

門開了，他淋得象才從河里打撈起來似的，渾身直淌水。

“政委，回來啦！”我坐起來悄聲地說。

“小黃，你不用起來。”他一邊拧衣服一邊走到我的床前坐下。接着說：“明天，部隊要回頭了……”

“要南下？不北上了嗎？”我驚訝地問。

“南回……不北上了。”他帶着失望的語調回答。

“那，那為什麼呢？”

“不，不为什么——說这是張主席（張国燾当时是苏維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四方面軍都称他为張主席）的决定。”他那灼灼的眼光中夹着愠怒，呆望着我：“小黃，明天要出发了，我們今晚好好准备一下。其实，别的倒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只是……”他回头扫視了一眼那两个生病的运输員，又对我說：“只是，他們怎么走，还有挑子呢……他們退了燒沒有？”他立即起身走到运输員床前。

我下床来，也走过去，摸了他俩的額头。还好，已經退烧了。然后，我們又回到我的床上。

“退了燒，这就万幸了。关于挑子……”

“关于挑子，就由我負責。”

“不，政委，你的身体也远不如从前。为了更好地領導我們单位，你也應該珍惜自己的身体。挑子由我們报务員負責，你放心好了！”

“不，不能这样。你們到地方还要工作，我对你們的身体也是要負責的！”他斬釘截鉄地說。

“那么，我們对你的身体就不該負責了嗎？”我不滿意地反問。

“你說得对，彼此都該負責。但問題是，你負过伤，至今一到阴雨天，你的伤口还隱隱作痛。要是創伤复发，拖垮了身体怎么办？”他看我正要开口，馬上阻止了我的話，他繼續說：“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很結实嗎？尽管消瘦了些，但是没有病疼……就这样办吧。現在，該睡了。关于出发的事，明早再告訴同志們。”



他不願再听我的辯解便上他的床了。从我到五軍团电台工作起，我就深知李政委的脾气，他向来不肯輕易决定事情，但是一經决定后，他就不再輕易更改，而且說到做到，坚决做到底。我也沒法再和他爭論了。

在这次行軍途中，李白同志挑着挑子飞快地走起来，他一天挑了八、九十里也不覺得累，同志們劝他歇一歇，換換人他都不肯。同志們很受感动，大家都贊揚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們的学习榜样。

不几天，回到懋功，我从五軍团調任四軍电台台长，就和李白同志分开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白同志被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被捕后，在獄中受尽严刑拷打，沒有露出一字真情，出獄后繼續工作。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就是主要描写李白同志的对敌斗争）。李白同志虽然已經长眠在上海的烈士墓中，但他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偉大精神和他那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質，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張国燾率領大軍南下，給部队造成极大困难。走了十几天草地，去的时候带着粮食，南回时粮食已經吃光。

由于指战員的英勇作战，四方面軍在南下途中打了許多胜仗，連克宝兴、天全、蘆山、雅安等城。此时，張国燾在天全成立了非法的所謂“中央”。尽管英勇的紅軍战士們奋不顧身与胡宗南、刘湘、邓錫侯等敌激战数月，但是，不久終因張国燾的反党政治

路線的錯誤，建立川康根據地的企圖失敗，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便被胡宗南等部壓回雪山草地。我們又第三次翻越雪山——夾金山。

## 草地八个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紅四方面軍被數倍于我的敌人压回雪山草地。

队伍一到懋功，張国燾就下令：不准随使用粮食做飯吃，要把带的粮食带到草地作长期打算，誰要随便做飯吃以違犯軍令論处。当时，沿着大、小金川还有些著名的“雪梨”，梨子尚未成熟，这些青疙瘩梨子也就变成我們唯一的“飯”了。雪梨，的确是好吃的水果，起初吃一两頓还不错，吃多了就要泻肚子，而我們天天吃梨，也天天拉梨，这一来肚子也拉得光光的了。一开始，有梨吃还算好，但不到三、五天，这几万人的軍隊便連梨树叶子也吃得精光。

在草地，最大的困难就是吃粮問題，維持生存是严重的斗争。一进草地，首先吃回回菜、野葱，几天工夫这些东西就都吃光了，随着便开始吃起野草根来了。最初吃野葱、野草时沒有經

驗，中毒的人不少，那時藥物很少，救治一不及時，便造成死亡。

野草根吃完了，怎麼辦？於是各個單位只得派一部分人出草地，到附近的山上去摘野果子、打野物。

我們電台的一個報務員陳小柱同志，一天從清早出去找食，到晚間還未歸來，象這樣的情況，總是凶多吉少。我們正在叨念他，忽然下起瓢潑的大雨來了。風把油燈吹得忽閃忽閃的，雨點飛濺到屋內。暴雨在草原上喧嚷，一片黑暗，一片雨聲，此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了。“他是不可能回來了……”我難過地自語起來：“我們要是隨着毛主席北上早已到陝北了，那有多好！哪會有今天。究竟要留在草地幹什麼？這滿目荒涼的草地能建立個什麼根據地？要叫我們過着原始時代的非人生活嗎？使得多少英勇的同志都無辜地犧牲在荒山僻野了……”我懷着悲憤的心情上了床，我默默地念着：“他是不可能回來了……”

天亮了，但是霧氣仍然緊鎖着天空，陰沉沉的，使人窒息。我和幾個同志去找陳小柱。這時天晴了，但昨夜的大雨又把好多地方的叢草淹沒了，更增加了行路的困難。我們向草地經常弄糧食的地方走去，小心翼翼地踏着叢草走着，積水浸過了腳背，冰沁沁的格外寒冷。從來草地後，我們的腳除了上床睡覺之外就沒有干過，毒水已把腳泡得浮腫了。

在一個山谷里，找到了老陳同志的屍體，原來他從峭壁滾落到山谷里摔死了。地上一大灘鮮血，他手里還握着裝滿着野果子的口袋，他為同志們的生存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我們懷着悲痛的心情把他埋葬了。我拾起一塊石板，用鉛筆寫上：紅軍戰士陳

小柱之墓，折把野花放在坟前，向小柱同志默默致哀：小柱同志，你安眠吧！我们将继承你的未竟事业。我们和小柱同志永别了。

不久，不但把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粮食吃干净了，而且附近地区的地里的、山上的一切可吃的东西，也都一扫精光。再出外到更远的地方去弄粮食，已经不可能，因为敌人在四外驻扎重兵，严密地封锁着我们。人少不敢走远，人多弄到一点也不够来回路上吃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忍痛杀自己的马来吃了。

有一天，我和不久前才由五军团电台调来我台当政委的钟真益同志商量，决定杀我们的马了。我们俩互相争着杀自己的马，争了好长的时间。

“决定杀我的那匹马吧，不用再争论了。”我下结论似的说。

“不行，决定杀我的那匹马。你负过伤！”

“别老是提负过伤的事，我的伤几个月前早就好了……再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拿负伤来照顾我呢？从前，李白同志是这样，现在你也是这样……我是好人，已不是个伤病员了！”我生气地说。

“好了，我们不必再争论了。反正，我的身体比你结实……决定杀我的马。”

钟真益同志不管我同不同意，跑出去把他的马夫老常叫了进来。钟政委对老常说：

“我们不得不杀马吃了。我想，这种情况你是了解的，不用

我多講。現在，你快牽馬去吧。”

老常哭喪着臉，不說話也不走。

“不殺馬，那你又能想出什麼好辦法呢？”鍾政委焦急地問。

自然，老常也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他紋絲不動地站了好一會兒，才眼淚花花地點了點頭，低着頭出去了。

我看見老常耷拉着腦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騰騰地把馬牽到靠河邊的空地去。這個空地是經常殺馬的。只見老常溫柔地撫摸着馬鬃，含着淚水的晶瑩的眼睛呆呆地凝視着他的馬兒。馬兒乖乖地站着享受着主人的撫愛，它不時地还用頭挨擦着它主人的身子。老常沉重而難過的心情我們是理解的，他曾經為了它付出過多少心血！飼養它，訓練它，它已經成了他的親密伙伴。我嘆了一口氣，仰望着天空，天陰沉得快要塌下來似的，陣陣冷風呼嘯不停，草原更加蒼茫了。從廚房裏走出來一個殺馬的同志，要開始殺了。老常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馬兒，他不忍心看見馬兒倒下，最後，他絕望地掩着面走了。同志們見那跟隨我們長征有過功績的馬兒倒下了，不忍心再看，也都很快地離去了。

“我們還要在草地住多久啊？現在殺馬，以後只好喝風了。”

“這個鬼地方——唉，誰知道他張國燾要搞個啥名堂……”

“跟毛主席到陝北去多好呀！”

“那，我們就不遭這些洋罪啦！”

“說別人是機會主義，我看……”

“朱總司令都到麥地裏搓麥，他（指張國燾）呢……”在路上，我看見幾個同志悄聲地嘀咕着。他們漸漸走遠，我聽不清他

們的談話了。

朱总司令到麦地里搓麦子，那是我亲眼看見的。

总部在卓克基住的时候，有一天，虽然刮着阴风，但太阳终于从一块黑云里射出了光芒。那天，我們許多人都到附近麦地里搓麦子，正弯着腰双手揉着尚未成熟的麦穗，忽然听见旁边的同志惊喜而又象是行军傳話似的說：“朱总司令来啦！”我忽地抬起身来張望，跟着也說了一句，傳給旁边的同志了。同志們随着“朱总司令到来啦”的話声，都抬起身子带着崇敬而欣喜的眼光看着他。朱总司令消瘦多了，但还是精神奕奕。他满面笑容向同志們頻頻点头招呼。他是多么喜爱这些由党、毛主席和他亲自教导成长起来的紅軍战士啊！

朱总司令满面透露出慈祥、謙逊和厚道的笑容。他穿着和我們一样的带补釘衣裳，穿着草鞋。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温厚长者的談話，使人在他面前感觉不到任何拘束，就象在自己家里和父亲在一起一样。

朱总司令和我們一起搓麦子，我們感到温暖和鼓励。我們心里乐滋滋的，兴奋得忘記了肚餓、腰酸、脚脹、手疼。我們猛干起来，搓麦子的效率比以前高多了，就象我們在总司令指揮下勇猛地斬杀敌人一样。

到了中午，大家各自拿着茶缸、臉盆就地炒麦做飯吃。吃午飯了，同志們团团地圍坐在朱总司令身旁，一面嚼着麦粒，一面靜听他講述井岡山的故事。看見朱总司令也和我們一样吃着炒

麥粒，我們都感到難過。然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一邊吃一邊用強烈的四川口音繪聲繪色地講着。

他說：紅軍在井岡山時，也很苦，不比現在好多少。敵人緊緊地包圍我們，沒有吃，沒有穿，有的同志說怪話，發牢騷，說什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當時，紅軍用禾草當棉花，野果當糧食，堅持了鬥爭，克服了困難。後來紅軍發展了，建立了根據地，不是不吃南瓜了嗎？……現在，我們又遇到嚴重的困難，沒有糧食，自己下地搓麥子。但，只要大家團結一致，堅持革命到底，草地總要出去的……

朱總司令的講話，一字一句都深深刻印在我們的腦子里，就象鉛水灌在字板上凝鑄鉛字一樣。我們得到了極大的鼓舞，更加充滿着勝利的信心，忍受着暫時的艱難，繼續向前。

偶然，我們發現了朱總司令的雙手和我們一樣也已經磨破了，大家更加難受起來。我心想：“要是他和毛主席一起北上有多好……”可是，黨需要他率領左縱隊……為了革命，他和同志們一起忍飢挨凍，同甘共苦，住在这荒無人煙的草地……黨需要他留在这里堅決向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鬥爭。他耐心地說服張國燾，促使他覺悟……。

到草地後，朱總司令有暇時經常到我們電台來玩，同大家下棋，聊天，講革命道理給同志們聽。為了黨的團結，為了愛護同志，在談話中他雖然沒有直接指責過張國燾，但他從側面來教育同志們認識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那時，他只要一講話就提到毛主席北上的正確路線，告訴我們，毛主席帶領一方面軍到了陝



北，打了大胜仗，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等等。

又开始搓麦穗了。同志们要求朱总司令回去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他还说他身体很结实，从小就干地里活，真的，干起活来，我们一些同志还比不上他呢。“朱总司令真是老当益壮啊！”同志们赞叹地说。虽然他的头发有些斑白了，他消瘦得多了，但他的身体却是健康的。然而，只要我们仔细一想，从南下到草地以来，他担着多么沉重的担子，他为革命和同志们的艰苦生活，又操着多么大的心啊！他在草地和同志们一样煎熬着饥寒，还要和张国焘进行斗争，只有象他那样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久经革命锻炼，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的人，才能经受得住这个千折万磨，才能战胜一切困难，永远忠诚地、辛勤地、愉快地为革命而工作。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一点，是每个同志所深切认识到的。

我一边回忆着往事，一边带着沉甸甸的心情回到了屋内，屋内充满了使人窒息的沉郁的气氛，几个同志在久已不响一声的发报机旁失神地坐着，他们从前那红润的脸膛已经变得灰黄，两颊已深陷了下去，他们消瘦多了。我知道我也和他们是一个样的。

那时，一天照例两餐，一百多人煮一大锅皮子、草根、野叶掺上二、三斤米麦的饭。那二、三斤米麦，在一口大锅里简直成了沧海一粟了。大家去盛饭时，还开着玩笑地说：“脱了衣服下去也捞不着呀！”就在那样的艰苦日子里，红军战士仍然你忍我让。这是多么高贵的阶级友爱啊！

在草地八个月，有六个月沒有見着米麦，紅軍不得不以树叶、草根、野果、皮带（腰带和枪带）、馬鞍皮，甚至到各处垃圾堆里去寻找藏民丢掉的破皮鞋来充飢，維持生存，坚持斗争。在草地八个月中，約有四个月沒有吃着咸盐。那时的盐真比金子还珍贵。从四川带来的盐巴（块盐），一人分了指头大小一块，用布包着，用火柴匣装着，每到吃饭时，便拿出来用舌尖舔一舔。人們吃不到咸盐，身子軟搭搭的沒有力气。那些上山、过河摔死的、淹死的同志，恐怕与沒有吃盐身上无力有很大关系。

吃野葱、野草，不断发生中毒，加上长期的飢餓劳累，长期生活在风霜雨雪之中，使得病号大量增加。那时，生病的同志躺在床上，想喝一点稀飯都很难得到。同志们目睹这种情景，象热鍋灶上的蚂蚁一样难过、不安，爱莫能助，眼含泪珠，对自己的同志只能作口头上的安慰。就这样，数以百千計的同志在恶劣的气候下，在飢餓的煎熬下，在沒有葯物医治下，在劳累的折磨下結束了他們革命的青春。

吃的問題正令人愁虑万状的时候，无情的冬寒又降临了。康藏高原的寒冷无情地折磨着我們。这个康藏高原地方就是在夏天也是十分阴冷，当然更不必說冬天了。

当时，我們的衣服破烂得不堪言状，原来在江西发的棉衣已經“三变化身”：棉变夹，夹变单，袖子、褲脚剪去补破洞，上衣变成衬褂，长褲变成褲衩。这怎么能渡过严冬呢？于是，大家为战胜冬寒，开始忙活起来。但要找布匹和棉花那是比上天还难。怎么办？只得用草了。我們拾了許多草来晒干，垫也是它，盖也是

它。至于衣服，我們則东奔西跑地去寻找藏民抛弃的牛羊毛和自己杀馬留下的馬毛。当时，大家白天搞吃的，夜間就捻毛綫。捻毛綫，这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第一，这些毛并未加工，易断。第二，沒有工具。成天成夜地用双手搓，手都搓烂了。但艰难困苦折磨不了紅軍的斗志和硬骨头，我們终于把毛衣、毛褲、毛袜、毛鞋都織好了。同志们兴奋地穿上自己亲手制成的衣物。可是，沒有衬衫，沒有衬褲，那硬而粗的土制毛衣穿在身上，毛茸茸的，象毛虫一样刺扎得光痒痒，走起路来把两腿刺扎得火辣辣地痛，左刺右扎，竟把腿都磨破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天很冷脫不下来，只好忍痛讓它刺扎，于是一出汗水，毛和破烂的皮肉就如漆似胶地粘在一起，破烂之处渐渐地化膿潰烂了。

我們就是这样渡过草地里的冬天！

草地八个月的令人难以形容的艰苦生活，并没有动摇我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这光荣的紅軍队伍。

但是，草地八个月的苦难生活，却深刻地教育了四方面軍的同志，对張国燾背叛党中央，坚持个人錯誤路綫的罪行，已經認識得一清二楚了。

## 再 过 草 地

正在艰难的时刻，传来了喜讯。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二方面军由任弼时、贺龙同志率领北上到草地来了，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地区。

在二方面军还未到来的前一个月，张国焘就开始着忙了。他赶快把伪中央牌子取下来改成了西北局。又连日下命令把伪中央的档案文件，收回焚毁。

二方面军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加强了，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也由于“草地八个月”的教育，都已觉醒，开始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坚决要求北上。八月初，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开始北上了。

过草地，必须准备充足的粮食。六月中旬，我们就开始积极准备了。我和鍾真益同志由瞻化（今新龙）轮换地带着同志们翻山越岭走出二百多里，到雅龙江下游东俄洛一带去搞粮食。听

說准备粮食，北上过草地，不知同志们哪来的那股劲儿，又恢复了从前生龙活虎般的样儿，去为北上筹購粮食。我們費了一个多月的工夫准备了到阿坝的十天干粮。

經過八个月的飢寒交迫，一个个黄皮刮瘦、疾病累身的四方面軍拖着沉重的步子向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的西康大草原出发了。

今天，天气晴朗，沒有飄飞雨雪，太阳还射出微弱的光芒。一眼望去，辽阔无边的草原竟象綠油油的大海，风吹着密茸茸的草丛，好象翻浪的波浪。我們就象一只海船，在这不着边际的草原上航行。大家謹慎地踩着軟柔柔的草丛，探索着一步一步地前进。草丛下面是泥深沒踝，人走在上面飄蕩蕩的，有如公园里孩子們玩的浪桥。

同志们虽然知道要走出这块“倒霉的”草地是十分艰难的，但一想起赶快走出草地到陕北去和一方面軍老大哥会师，重新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怀抱时心情却十分愉快，消瘦的脸上閃起了光彩，嘰嘰喳喳的談話声、清脆的笑声和歌声使荒凉寂寞的草地顿时熱鬧起来。

走了一程，休息号声响了，大家就地休息。到处是潮湿的水草，只好用包袱甚至用枪放在屁股下垫起来坐一会。虽然走得腿酸腰痛，精神还是爽快。

“小罗来一段快板好嗎？”“欢迎，欢迎！”一陣热烈的鼓掌。同志们一致要求我們电台的一个由通南巴（通南巴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苏区出来的小通訊員罗常明表演。他站起来

笑嘻嘻地把大家扫视一眼思考着说：“来一段什么呢？”

“小鬼，我知道你有两下子……就编一块草地吧！”政治委员 鍾真益同志也跟着同志们一齐来指名点姓要小罗唱快板。又一陣掌声和欢呼声，聪敏活泼的小罗思考了一下，便唱起来了。旁边的同志有的敲扁担，有的击茶缸为他帮腔。

咳，叫同志，听我言，今天来把草地谈一谈。这草地，真古怪，污水淤泥一大片，稻不长，菜不生，要想难住我红军。

这草地，真古怪，天气一日三大变，一会晴，一会雨，一会风雪大得很。雾蒙蒙，风凄凄，要想难住我红军。

咳，叫同志，听我谈，咱们红军是好汉，千种苦，万种难，红军从不怕困难。草地难不住英雄汉，草地八月要过完。

今天起，过草地，红军抗日要北进。叫同志，加把劲，快马加鞭过草地。过了草地打日本，过了草地打该死（蒋介石）。狠狠打来狠狠打，反动军阀都打垮，日本鬼子滚回家。你说红军伟大不伟大！

一阵热烈的掌声夹杂着喊叫：“小鬼唱得好，小鬼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罢？”“要！要！要！”小罗喘着气直招呼：“快行军啦，下次再唱吧。”同志们又笑又叫：“不行！不行！”忽然，行军号响起来了，这才给小鬼解了围，不然，小罗一定还得再来一个。

今天走的路不多，只约六十里，一切还算顺利，下午两点左右就到了“宿营”地。没有房子，但有些矮小的树林，前头的部队在这利用树枝搭了鸟巢式的棚子，但已被风吹散了，我们又拾起枝杆随便弄些草很快地恢复起营棚。从这天开始我们又过着草原生活。

从甘孜出发到腊子口出草地整整走了二十八天。除阿坝有房子以外，二十七天没有住过房子，没有见过人烟，完全露宿草地。草地到处潮湿泥濘，不能卧地而睡，只得互相背靠着背成宿地坐着，坐得腰酸脚麻了，起来走几圈。谁如果不能忍耐想要卧睡一会，那他第二天就会腰痛腿酸不能再走了。

从草地出发的第二天，我们受了一次极大的惊恐。天刚亮，我们几个同志正在整理行装，突然马夫惊惶失色地跑来报告，说是我们的那匹又骑人又驮粮的马儿，在昨夜扯脱钉在地上的拴马木桩跑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雷。眼看就快出发了，没有马，这过草地不成了大问题了吗？我自己当然可以走，然而这些粮如何办呢？我简直急得象旋风似的直打圈子。突然，我听着远远有着马群的嘶叫，马夫大叫一声：“有办法了！”我并不理解有什么办法，但是我见马夫跑出去，我也跟了出去。只见前面不远有一群野马奔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可是马夫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骑着另一个同志的马去抓野马去了吧？然而，我哪能等待，不能把这天赐的机会放过了，必须赶快去抓。我匆匆地跑到其他单位借了匹马，正骑着追上去，忽见从野马群中跑出来一匹马，向我奔来。我简直高兴极了，于是纵马追去。嗨，原来就是我们的那匹马！它也自愿地来归队了。这时，我那失马的惊慌心情，才如释重负地轻松下来了。原来马儿也是群居的动物，它只身地跑到陌生的马群里也是不习惯的。从此，所有的马夫在过草地时，都从这次失马取得了教训。他们宿营的时候，把拴马木桩钉在地上后，又把绳子拴在自己的脚上，因为草地的地质很

軟，釘不牢靠。現在，如果馬兒一旦扯脫了拴馬木桩，也就扯醒了馬夫，這樣便可萬無一失。

都說康藏高原草地的天氣一日三變，真是千真萬確。早晨霧氣蒙蒙，天昏地暗，烏煙瘴氣，如同黑夜一樣，伸手不見五指；過十點以後又必有一段晴天，藍藍的天空，靜悄悄的草原，天地相連，一望無邊；而到下午兩點以後常是狂風四起，傾盆大雨，或者氣溫急降，雪花紛飛，或者烏雲密布，冰雹墜地，打得野物到處竄逃無藏身之處。因此，我們在草地行軍只能天不亮動身，下午兩點以前安妥住處，尋找躲風避雪之所。

從甘孜出發的第四天，我們住在一個小小山坡上。大家用棍子、扁担和槍枝當支架，被單作棚布搭起了“營房”。傍晚，一團烏雲從西北方向我們壓來，狂風咆哮，接着排山倒海似的暴雨傾瀉下來，“營房”全被吹散，有的甚至被吹到數十里以外。就連我們電台工作用的帳篷也被吹倒。大家背靠着背圍坐在一起，川流不息的山水從屁股上刷過，衣服全濕了，一個個象是落湯鷄。雨過便是挑大的冰雹，大家又只好用衣服、被單頂在頭上，抱頭掩面，任憑“天老爺”的擺布了。真是：

日行泥濘路，  
肚皮餓的苦，  
寒冷沁肺腑，  
薄暮無棲宿。

這一夜間，許多同志病了。我們電台担機器的運輸員也病了好幾個，我和鍾政委不得不親自白天背機器，夜間做工作了。



沿途沒有柴，沒有鍋，煮飯燒水成了嚴重的困難之一。由於吃炒面吃肉干，口渴舌燥，我們每到一宿營地之前必須從幾十里外開始沿途拾糞片（藏族牧民的牛、馬糞），把揹包、衣袋塞得滿滿的。但是，即便有糞片，又沒有風箱之類的吹風工具，燃燒起來，也十分困難。我們只有用報紙、書刊或樹葉片等卷成吹火筒，趴在地上輪換着吹，可是腰痛了，腿麻了，嘴也吹腫了，口吹的更干了，還燒不開一碗水。在草地要想喝碗開水也成了大問題。吹燒糞片不但費力而且糞味臭得噁人，糞煙熏得人直淌眼淚，我們竭力的忍受着，因為我們時時想到為了革命，我們必須頑強地堅持鬥爭，生活下去。

出發之前，我們盡了一切努力，準備了些干糧，以備作過草地之用，但只走了十二天，糧食差不多都吃光了。到阿壩還要三天才能走到。我們電台的運輸員每天要比其他同志付出更多的气力，所以也就吃得更多些。他們的糧食完全吃光了。我們黨委決定動員大家節食獻糧，以保證勝利到達阿壩。政治委員鍾真益同志和我及其他幹部都自己只留最後的一斤糧，其餘全部拿出來分給無糧的同志。可是就這樣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離阿壩還有兩天的路程，我們的糧食已完全吃光了。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們只好把裝機器的皮箱煮來吃，動員大家拔草根，摘野蒜來維持。

到了離阿壩三十多里的地方，一條寬約三十多米、深及頭頂，水流湍急的阿壩河攔住了我們的去路。當然不可能有什麼船隻。搭橋嗎？周圍百十里地沒有樹木，搭橋當然不可能。我們

只好涉水而过。会游水的同志勉强过去了，不会水的、有病的和女同志都无法过去，只得依靠有限的几匹马来驮病人过河。其他的同志依靠会水的人，手拉着手连扶带拖冲过河去。

我和鍾政委都会游水，但鍾政委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他还是下水去帮人。他那带病的身体战战兢兢地象一片落叶，漂荡在水上，喘着粗气，脸色更加苍白了。我一再劝他上岸去，他都不听。他来回走了好几趟，直至浑身打哆嗦站立不稳时，才上岸去了。

我背着无线电机骑马送过去后，便下水去来回送人过河，整整在水里泡了一个多钟头。人过完了，我们在水里的人手脚也冻僵了。

整整走了十五天才到达阿坝。

阿坝是康藏草原方圆数百里最大的喇嘛寺，从远远数十里外便可看见耀眼辉煌、金光闪闪的阿坝喇嘛寺的金塔顶。它分上、中、下阿坝，以上阿坝为最大，有三百多户人家。仅仅寺庙就可以住四、五千人，当时红军总部机关全住里头还绰绰有余。喇嘛寺的陈设异常雅致，雕刻遍布，粉饰鲜丽注目，地毯内外相连，院庭皆种植香花异木。我们到时，正是花木盛开，香气扑鼻。建筑物之幽雅精致，象我这样的“土包佬”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不过大家均忙于烘烤衣服，谁也没有闲心去鉴赏景物。

我们在阿坝休息了两天，要在这里补充粮食才能再走。哪里有粮食呢？满山遍野去寻找，没有找到一点。最后只能从喇嘛庙的仓库中和藏民家中收集一点他们未带走的粮食，我们把银

子留在放粮的地方作为购粮款子。

从阿坝到白骨寺，出草地，还须走十多天，可是我们每人只分到不足五斤的干粮。粮食不足，也得赶快走，否则多住一天，多吃一天粮就更少了。成千上万的红四方面军正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一个个担忧饿倒在草地泥潭的时候，二方面军的同志在离阿坝八十里的地方巧遇藏族大牧主的牛羊群，不仅解救了二方面军断粮的危机，而且为四方面军送来了二千多只羊、一百多头牦牛。我们每个人才依靠着五斤干粮和几斤牛、羊肉，饱一顿饿一顿地走出最后一段草地。

从阿坝出发到白骨寺，路更加不好走，草更深，泥更烂，连山丘也都湿淋淋的。成天成宿两脚不干，雨天更多了，差不多天天乌云簇簇，细雨纷纷。许多人又没有雨具，身上没有一点干处。由于走了十几天草地，饥饿寒冷的袭击，加上每到一处不是露营就是“雨营”，不能好好地休息睡觉，于是病号大量增加。

我们电台政委锤真益同志的病越来越重了，几天吃不进饭，身上烧得烫人，我们担心他再继续病下去，恐怕连马也不能骑了。但他却仍然乐观地说：“小黄，不要紧。我再熬它几天，病就会慢慢好的。”一天，他骑着马不慎陷进泥潭，马儿挣扎着，但越挣扎越往下沉，四脚象钉子一样插入地去。马夫也两脚深深地陷了下去，眼看连人带马快沉进去了，焦急难受的心情象毒虫啃噬着我们的心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去拉啊！最后才想出办法：把几个人的绑带解下来，拧成布绳抛过去把政委和马夫拖过来。马儿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慢慢地沉埋在烂泥里了。就这

样不知有多少馬、多少同志长眠在雪山草地里！

漫长的二十多天草地行軍，經過多少折磨，忍受多少艰难，付出多少代价啊！紅軍以百折不撓、无比坚强的精神，克服了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的艰难，终于翻过了高耸入云連年积雪的高山，走出了澤国草地的原野，来到了甘肃南部的岷洮地区。当时我們又写了一首诗：

草地辽阔漫无边，  
毒水污泥阴森天；  
絕粮无盐整半載，  
野草皮子当美餐。  
飢寒煎熬千万苦，  
共产党员齐爭先；  
黑夜終有黎明日，  
严冬过后有春天。

翻过岷山，出了腊子口，心情豁然开朗，喜悅的滋味，就象失去亲人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样欢暢。放眼一望，这和雪山草地簡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正是秋天季节，天高云淡，太阳射出万丈光芒，山色青青，田間一片金黄，飞鳥鳴叫，秋虫唧唧，真是美极了。

岷洮地区群众对于我們一点也不生疏，除少数的地主逃到岷州城里之外，不論回族、汉族，不論男的和女的，都来夹道欢迎紅軍。小商小販把担子、籃子摆在路旁，平常冷落的小村鎮現在

利市百倍。一天，我們住在脚力鋪，电台剛剛架起，一群孩子圍攏來看稀奇，如同在根据地一样，这种情形差不多两年沒有遇到了。我开始有点惊奇，后来才知道，孩子們所以不怕紅軍，是因为一方面軍一年前在这里經過时給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良好印象。

次晨，我們向岷州哈达鋪出发时，群众再三相劝，要求我們不走。我們电台住的那家房东，一个中年汉子对我們說：“紅軍先生，你們不是說帮助穷人的嗎！你們別走啦，把岷州打开吧，魯大昌要粮要捐逼死人。”我們只好对他說：“是的，我們是帮助穷人，是要打岷州的，而且还要去打日本鬼子呢。”群众对我們这样的信賴，象是回到根据地一样，使我們心情快活。

向洮州进发，沿途看見橙黄的稻麦，我們个个喜形于色，心花怒放。

一天，我們到了岷州哈达鋪附近，主力部队不断向洮州开去。总部发来通知：要大家三天內准备好十五天的熟干粮。我們有点怀疑了，怎么不快到陝北和一方面軍会师呢？反倒通知大家准备十五天干粮做什么？向哪里去要十五天的熟干粮呢？好不容易才把干粮准备好了，我們一心要到陝北去見毛主席，可是又发生了变化，一个个哭丧着脸，沿着洮河来到了洮州城。在洮州住了两天，总部在这开了高級干部會議。后来我們才知道會議上張国燾主張把四方面軍拉到青海去，企图破坏一、二、四方面軍的大会师。由洮州到青海要走三十六站大草地。在會議上由于多数同志的反对，張国燾的阴谋才沒有实现。否則将会使三

万多人的四方面軍葬身在青海大草原上。

出草地后第四天，我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突然大流鼻血。血象噴泉似的流着，怎样也止不住。沒有医药，卫生員同志只好用棉花堵，冷水捂。但是仍旧无效，堵住了鼻孔，血又从口腔里出来。整整流了一天，床前象是杀了猪似的，以后我便昏迷不省人事，高烧起来。行軍时，同志們用担架把我抬了十几天，至今想起来，我都常常被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所感动和鼓舞。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二、四方面軍胜利地完成了举世聞名的长征，和一方面軍老大哥会师于甘肃的会宁。三軍将士，齐声欢唱，眉开眼笑，精神奋发，斗志昂揚，满怀信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狠狠地打击敌人，重新建立根据地，并准备和一切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人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張国燾并未能从这血的里程中接受教訓，改过自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反而变本加厉，繼續坚持其反对党、分裂党、分裂紅軍的阴谋活动。为实现个人野心，竟欺上瞞下，假傳中央指示，擅自将五、九、三十軍組成西路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夜从靖远附近渡黄河西征。过黄河的西路軍由于脱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連山，遭到了慘痛的失敗。

張国燾对中国革命，又一次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脫險歸隊







## 悲壯的一仗

黑夜降臨了，巍巍峨峨的祁連山立時被黑暗吞噬下去。寒風怒吼着，漫天大雪從高峰上、從峽谷中猛撲過來，象沙粒一般抽打着人們的肌膚，寒透骨髓。就是那堅硬屹立的頂峰也經不住這冰封的奇寒。然而紅軍戰士們却象一個巨人，頂天立地，他們身穿破爛不堪的衣服，在這海拔三千公尺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祁連山的高峰——石窩山上經受着革命的考驗。紅西路軍一千餘人，從這裡出發了。

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由於張國燾的罪惡活動，潰不成軍的西路軍，退到了祁連山的石窩山，遍體鱗傷的紅軍戰士面臨生死關頭。我們抱着槍，背靠背，蜷曲着蹲在雪里等候着上級的決定，人們都在想着一個念頭：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早已到達了陝北，取得了長征的勝利，然而可惡的張國燾却把我們送入祁連山。但是我們決不能就這樣算完，我們要誓死

冲出重圍，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傍晚，高級干部的石窩會議結束了。會議決定：为了保存下革命的这一点种子，将最后剩下来的一千余人分編成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以三十軍留下的千把人和总部机关的几十个干部組成，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帶領向西打游击；右支队以五、九軍剩下的三百余人和总部妇女独立团剩下的女同志、伤员、干部等組成，由玉树声、朱良才等同志帶領向康龙寺敌后打游击，担任扰乱敌人、箝制敌人的任务。我当时被編在右支队，在右支队这四百多人中，除了女同志、伤病員以外，有枪能够参加战斗的只有二百人左右。

我們在这人烟絕迹的祁連山上，砸毀了不能带走的武器和电台（西路軍共有七部电台，除留一部輕便的五瓦特的机器随左支队外，其他全部砸碎了），滿目凄凉，四面楚歌。右傾机会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叛徒的張国燾把我們送到彈尽粮絕、悬崖絕壁的悲惨境地。

晚上九点多鐘，左、右支队同时出发了，走了一程，便向左、右分路了。在分路的岔口上，依依难舍的心情象泉水似的涌上每个人的心头，一步一回首，从此以后，天南地北，路遠千条，誰能知道，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将何日再相見啊？等到消灭敌人，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凱歌声中几人还！亲爱的党啊，敬爱的毛主席啊！您的忠誠的战士們多么想念您啊！为了您，血可流，头可断！有了您，紅軍战士不怕远征难！为了您，紅軍战士要扫平这漫天风沙的黑暗！有了您，光明一定会出現！

我咬着嘴唇，抑制着憤怒燃燒着的心頭，熱血在沸騰，在奔流，淚水奪眶而出。左支隊離開我們了，分別了。祝你們勝利，祝你們健康，祝你們一路平安吧！

走了一程又一程，翻了一山又一山，山山緊相連，心頭怒火更增添，誰不痛罵張國燾！想起張國燾，往事在眼前：

那是一九三六年十月末，由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成為可恥的革命叛徒的張國燾，為了實現個人野心，獨霸一方，與中央鬧分裂，欺上瞞下，假傳中央指示，將在雪山草地折磨了八個月，歷盡人間艱辛，剛剛走出來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又以五軍、九軍、三十軍及總部直屬機關二萬多人組成西路軍。在“打通國際路線，對我有援助”的口號下，由甘肅靖遠上游渡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向西北高原退却。當時，我在總部電台工作。

西路軍進入河西，失去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便遇到了數倍於我的胡宗南、馬步芳、馬步青等擁有步、騎、炮的優勢敵人，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戰五個月。初戰古浪、土門，九軍損失過半；高台血戰一周，使轉戰數萬里、英勇頑強的五軍復沒，寧都暴動領導人之一董振堂軍長英勇犧牲。只有主力三十軍仍完整無缺，全軍士氣仍旺，一個個義憤填胸要為五軍烈士復仇。“雙十二”的第二天晚上，我從無線電新聞中第一個知道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等一批親日反共頭子，促蔣停止內戰，抗日救國。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各個角落，全軍上下拍掌歡呼，群情沸騰。岌岌可危的西路軍，本應利用西安事變的有利時局，迅速揮師東進，配合新的革命形勢。但是，剛

向东回头走了一步，在永昌以西之西洞堡附近，出敌不意，打了一次胜仗，消灭了馬步芳宪兵团、手枪团一千余人，便冲昏了当时领导者的头脑，提出敌我力量已经发生变化，顽固地继续执行错误的西进路线，又掉头西进。前进中九军余部和总部机关被敌困于沙河堡，三十军则被切断在后面。五军驻高台被围告急，总部派骑兵师（约不足千人）增援高台，途中遭敌阻击溃散。总部在沙河堡守堡候援，苦战数日，三十军仍未赶到，总部便不得不弃堡突围。突围中又遭敌伏击，伤亡甚重，指挥机关被打乱，电台遗失，全军指挥系统一度中断，士气大挫。

尽管西路军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如果领导者能够接受教训，改正错误，重振旗鼓，再挥师东进，即或坚守城堡候援（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已经出动到镇原，即将渡过黄河，解救西路军），仍可挽救悲惨的失败。但是，却在“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援西军过河反攻”的口号下，放弃城堡，将西路军拖入荒凉寒冷的祁连山脉。敌人哪能让红军喘息养锐，三个骑兵旅、二个步兵旅又紧紧地抓住不放。在退入祁连山途中于南流沟、黎园口两次恶战，九军几乎全军复灭，所剩无几；三十军亦损失惨重，伤亡累累，元气丧失。西路军已经难以挽回失败。残部便向祁连山高峰退却。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早晨，最后剩下不过二千人的西路军退到祁连山的康隆寺，敌人又尾追赶到，满山遍野的骑兵向我猛攻，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不分男女，背山依林且战且退，死命抵抗，杀死杀伤敌人千余，最后退到石窝山组成左、右二支队分散活动。

我們右支隊離開主力以後，向康隆寺敵後進發，一夜不知爬了多少懸崖，翻過多少山崗，在密密重重的山林里串來串去。天明，我們又回到了康隆寺喇嘛廟。因為一夜的快速行軍，這時只剩下一百七、八十人了，帶槍能打仗的戰鬥員只有一百二十多名和一挺機槍。其他的同志都掉隊走散了。首長也找不到了，象一群沒娘的孩子，遍地滿山亂串。兩天沒有吃飯，沒有休息，又累又餓，大家都向康龍寺喇嘛廟走去，想在那弄到點什麼吃的。我們剛剛坐下，想休息一下，突然聽見槍聲大作，遙見四處滾滾黃塵，馬彪的騎兵旅追趕來了，把我們包圍起來。正在慌亂中，不知誰大聲喊道：“同志們，沉着，趕快向右邊上牛毛山。”我們一窩蜂似的鑽上了牛毛山。

牛毛山拔海三千多公尺，一片原始森林，密密層層的古樹遮住了天空，陽光射不到密林里，二、三尺深的積雪把那些參天的馬尾松壓得彎下腰來，矮小的牛荊、薔薇和芨芨草都被埋沒在雪里，只露出尖尖的幾根。我們一到山上，就感到一股陰森森的寒氣沁入肺腑，好象進入冷宮世界，格外寒冷。

離喇嘛寺二百多米是一片光禿山，大概是被喇嘛們砍伐了。我們很快地跑上了山，敵人却撲了個空。但是敵人在康龍寺稍稍休息後，騎兵象是一群螞蟻似的又向山林沖來。我們這些原本不是一個建制單位的同志便由右手已經負傷的原九軍的宣傳部長尹子林同志出來指揮，把我們分成三個小隊，利用有利地勢和密密的森林向敵抵抗。尹子林同志派三小隊四十多個同志在一個負了傷的同志指揮下，散伏在樹林的前沿，二小隊占領左側

一带，防止敌人插到我们背后，一小队作三小队的掩护。敌人以为我们是散乱的逃兵，早已逃入深山密林了，大搖大擺地騎着馬向山上走来。待一群二百多人的黑队騎兵冲到离树林十多米的近处，一陣排枪，接着几十个手榴彈飞向敌群，几十个敌人連人帶馬滾下山去，其余的敌人撥轉馬头飞跑。这时，尹子林同志身旁的那挺机枪怒吼了，向敌猛扫，敌人一片片地倒下去，庙后的坡上躺着上百具敌人的死尸，我们为一个小队欢呼！

沒隔半个小时，五、六百敌人又冲来了，这次敌人沒有騎馬，一个个低着头，哈着腰，一字形散开着向树林冲来。机枪向树林狂扫，打得树枝和树上的积雪一堆堆地掉落下来，我們的头上、肩上落着厚厚一层。我們一小队有几个同志負了伤，撕下自己的衣角把伤口扎起来又繼續战斗。敌人已到了树林旁边了，尹子林同志喊了一声“打”，几十枝步枪、手榴彈乃至石头向敌人打去，在烟尘滾滾中，敌人又一批一批倒下去，有几个敌人倒栽葱滚下山崗。前面的敌人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来，一小队牺牲了一些同志，我們三小队接上去繼續狠狠地打击敌人。敌人冲进了树林，我們利用密密的树干負隅頑抗。一个滿臉胡子戴着黑羊皮圓帽的家伙，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向我杀来，我正要迎战的时候，从我后面“叭叭”打来两枪，那个家伙应声而倒。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玉亭同志的駁壳枪子弹射穿了敌人的胸臆。前一个敌人剛倒下去，又一个斜眼歪嘴的家伙肩上横挎着枪，手执大刀，离我只有五、六步远了，沒等他举起大刀，我的左輪手枪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这个家伙立即躺在我脚下。我几年沒有拿枪

打仗了，枪法还满准呢。我过去踢了他两脚，拾起马刀，连忙退到树后。……

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战斗，敌人剩下不到一半又退下去了。下午，敌人调来炮兵不断地向牛毛山轰击。

一天的战斗，我们也有很大伤亡，只剩下七十多人了，已无法和敌人正面打了，敌人几个旅团团围住我们。我们只能向深山密林退却。

山上冰雪封冻，山风狂叫。入夜，气温下降至零下三、四百度。我们在山上蹲了两天一宿。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取暖，冻得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来回的爬山，兜圈，但又饥饿无力。大家身上的干粮只有最后一点点了，谁也不舍得吃，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吃的，要留下作“长期打算”。饿了、渴了，只能随手在地上抓把雪放进嘴里。空空的干粮袋塞满了雪球和冰块，以备随时充饥解渴。饥饿、寒冻和疲劳已经攫取了一部分伤病员同志的生命，这些长征过来的英雄烈士含着满腔仇恨长眠在冰雪中。

第三天的晚上，才由尹子林同志主持召集一部分同志开会，讨论如何坚持斗争，确定行动方向。开会商量的结果，决定把最后剩下的七十几名同志重新整顿，另行编队，坚持斗争，设法突破重围，到河西走廊东山（龙首山），然后渡黄河回陕北去。

当时敌情严重，敌人包围了我们，一定会上山搜索，我们必须马上起程，希望趁晚间摸下山去，离开敌人的包围圈。说要突围，大家自动地将最后剩下的一把干粮交给不能随着突围的伤

員。當夜八點，我們便匆匆地出發了。同志們被新的希望所鼓舞，大家精神抖擻地走得飛快。蜿蜒崎嶇的小道已被積雪覆蓋，大家朝着下山的方向摸索着前進。走了一陣，突然前面停止了行進，前面有一個大約兩丈多高的懸崖。前後左右又無可以通過的地方，好像走到了絕路，我們只得裹緊衣服象石頭似的滾了下去。有的同志摔傷了爬起來繼續前進。走了一個晚上，還未出山，天便拂曉了。我們在山上遠遠望去，看見平坦無際的河西走廊平原，沒有山也沒有森林，簡直沒有一個可以隱蔽之處，這几十個人成群集隊的行動，一定會暴露目標的。當時便決定：“分散隱蔽”，劃分小組繼續活動。

我們這個小組共有六人，有三枝槍，我有一枝小手槍，另外還有兩枝子彈很少的匣子槍。劉玉亭同志是我們的負責人，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天黑下山穿過平原。從西山到東山走廊約有八十里路，估計一個晚上是可以穿過去的。我們便往山高路窄的地方走去，一方面是為了隱蔽，另一方面是想找個人家搞點飯吃，因為兩天沒有吃過飯了。到晚上七點左右，好容易找到一個放羊的人家，苦苦的哀求才買了一隻羊，殺了吃。然後衣袋里塞滿了羊肉和冰塊，我們便急急忙忙上路了。天上星月皆無，漆黑得分不清東西南北，路不熟，我們在山上亂串了一個晚上，仍舊沒有摸下山去。這時，東方已經發白，濃霧籠罩着大地，天已大亮了。

“我們怎麼辦？”我焦急地問。



“怎么办？白天不能走，找个地方藏起来，夜晚再走吧。”刘俊英同志皱着眉头回答。

接着一阵沉默。

“不，这样办！我们把枪埋起来，化装老百姓继续走！”刘俊英同志又提议。

“对！就这样办。趁着浓雾走快点，跑下山。让那些狗日的东西去搜山！”曾清良同志说。

要把枪埋起来，开始我们这四个人都不同意，经过一番讨论后才把意见统一起来。于是，把枪拆开零散地埋在石头底下，把红军军帽藏在怀中，当时，我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不详细辨识，认不出是红军。大家小跑似的走起来。

浓雾消失，太阳高高挂在天空，远山的景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正走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刘玉亭走在前头，刚才露出头去，就望见不到二百米远的地方，有几十个敌人的骑兵向我们扑来。忽然枪声大作，枪声中还夹杂着喊声。

“敌人搜山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惊讶起来。

跑是来不及了。正在万分危急中，发现了一个石洞。

“赶快到石洞里躲起来！”老刘象下命令似的说。

我们急忙串进石洞，用草把洞口挡住掩护起来。石洞约有五尺来长，三尺来宽，高约四尺，六个人身靠身地藏在里面。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见机行事：“一旦敌人找到我们，如果他们人少就跟他们干。”这时我埋怨不该把枪埋起来，用枪和他们拚了该多好。“如果敌人开枪，我们就……”一语未了，敌人已到了

跟前。

我們清楚地听着敵人在喊：

“鬼紅軍，趕快出來投降，不要自己找死！”

接着，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遠而近。

我們屏着呼吸，仔細地听着外面的動靜。

“這裡有個洞！”敵人象發現寶貝似的喊。

“他媽的，裡面一定有人。趕快去搜！”敵人軍官命令着。

沒有人應聲。

“都是些膽小鬼，老子把你們燒了！驢下的，趕快去看看！”

敵人軍官咆哮着。

一陣腳步響到了洞口前。

“快，快……他媽的膽小鬼……用刺刀把草挑開……準備好！”敵人軍官緊張地下命令。

刺刀一下挑開了草堆，一道光綫射進洞里，我們仍然沒有動，洞口密密麻麻地站滿了準備着射擊的敵人。

“驢下的，趕快出來！還他媽裝相！”敵人軍官露出一排狗牙在叫喊。

我們被俘了。

滿臉短胡的軍官，把我們身上搜了一個精光，除了幾塊白洋揣進他的衣袋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

從山上把我們押送到平原草坪敵人的營房，沿途所見，真是一幅大屠殺的淒慘圖景，樹上吊着屍體，樹下捆着被奸污後殺害的女同志，被砍死的、被槍擊的屍體黑壓壓地一片，到處血迹斑

斑，連道路都染紅了。万惡的敵人罪惡如山，我們的心中怒火燃燒，我們含着熱淚悲憤到極點。我默默地念着：“戰友，安息吧。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总有一天要清算這筆血債！……我們要活下去，為你們復仇！”

在敵人營房押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敵人就派了一個副官帶着四名騎兵押送我們六個人去西寧了。

他們用繩子把我們每個人的胳膊扎扎實實地捆住，又用一根長繩把大家拴成一串。押送我們的這五個敵人，都是回族，對共產黨很陌生，對紅軍不十分了解。但他們是知道這一點的：紅軍很英勇，紅軍不怕死，紅軍不投降敵人。沿途，只見一片荒野衰草，光禿禿的枯樹，稀疏的村落，逶迤坎坷的碎石道上，只有稀少的行人和載貨的車馬。北風勁吹，刮得沙石在空中打轉，天灰蒙蒙的，太陽也象蒙了一层面紗，更顯得淒涼。大概，副官感覺寂寞吧，或者是要想顯示他的學問，便趾高氣揚地開口和我們談起話來。我們也借此機會，向這五個被他們的長官欺騙蒙哄的家伙做起宣傳工作來了。

“你們說什麼抗日、聯俄，打走日本人，俄國人又進來了，這不是一樣？”

“日本和蘇聯完全兩樣，日本是帝國主義，蘇聯是社會主義。”

“什麼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外國人都一樣。”

“日本是財閥、軍閥掌執政權的國家，專門侵略。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它不侵略別人，而且幫助一切被壓迫被剝削

的人民。”

“你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

我們馬上火了。刘玉亭同志理直气壮地反駁說：

“紅軍是穷人組織起来的軍隊，从来也沒有放过火、杀过人、搶过东西。这些都是你們长官編造的謠言，你們受騙了。你們和我們打了几个月的仗，你看我們哪里杀过人，燒过房子，搶过东西？說我們共产共妻，更是笑話。世界上只有共产党人才真正是妇女的解放者，我們不但反对共妻，而且主張男女平等。”

副官被駁得哑口无言，四个兵瞪着两只眼睛，听得出神。看来，这些国民党的下級軍官是长期被騙的无知无識的人。事实不正是如此嗎？紅軍到河西走廊，不但从来沒有杀过人，放过火，即使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也沒有拿过老百姓一針一縷。在鉄証如山的事实面前，他們当然无言以对，只得默默不語。

一天，风很小，天空无云，太阳亮光光地高挂晴空。我們也如往日一样边走边向这五个敌人宣傳。他們越听越有兴趣，我們越說越来精神，步伐較剛出发时加快了許多，快走到前面村子了。在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小河沟边，我們看見一个赤身裸体、被敌人杀害的女同志尸体，憤怒的火焰燃燒着我們的心。

“我們要过去給她盖上草，掩埋她的尸体！”我指着尸体向副官大声地說。

突如其来的問話，使他楞住了，他一时答不上話来。他看了看我們六張憤怒的臉，不得不点了点头。

我們走了过去，拾起草，怀着敬意把草蓋在她的身上。我們

崇高的阶级友爱的行动，把敌人其中的一个骑兵也感动了，他居然也情不自禁地下马来帮助拾草掩盖尸体。

“谁是土匪？谁是杀人凶犯？谁奸污妇女？这就是最好的铁证！”我们朝着副官冷嘲热刺地痛骂了一通。

仇恨还在我们胸中汹涌，谁也不愿和他们讲话了。大家默默地走了一程。副官开口了，他象是良心发现，吐出了真情，他感叹地说：

“你们红军的女兵真英勇，有一个女红军被抓到后，我们营长要逼她当太太，就在那天的晚上，她把一颗手榴弹藏在炕里，等到半夜，轟的一声，她和营长都同归于尽了。”

多么悲壮的故事啊！有谁能够毁灭我们红军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的赤心呢？

披着白雪的祁连山远远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那巍峨雄偉的气势正象我们红军的英雄气概一样。我呆呆地望着它，怀念着左、右支队的战友们。你们走到哪儿了？同志们都健康吗？祝你们一路平安，祝你们顺利地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怀抱吧！

## 在 獄 中

一天下午四点多鐘，我們被押进西宁監牢。

我們六个人关在一間牢房里。这是一間阴暗潮湿而又臭气熏天的屋子。屋很小，长约一丈，寬約丈余，四周是污秽的磚墙，除房門上有一个小小的铁框外，沒有一扇窗戶，四墙結着厚厚的冰霜，阴暗气悶，簡直象到了十八层地獄。潮湿而发霉的泥沙地上散乱地摆了三床象鷄窩似的草垫，草垫上放着两床血迹斑斑的被子。靠門的牆角，左边放着一个当灯用的缺口大破碗，右边放着一个泥罐作尿桶。沒有一条凳子，自然更不用說桌子了。

“他媽的，簡直是人間地獄！”老曾一进去就罵开了。

“这些狗东西，将来总有一天要他們自己进来的！”我也憤怒地罵起来。

我們一边咒罵，一边走向草垫，躺了下去。从和左支队分手到康隆寺直到現在，我們日日夜夜翻山越岭，飯沒吃好过一頓，

覺沒睡好過一夜，走得腰酸腿疼，連骨頭架子都快散了！休息下來，躺在草墊上，舒展了一下身子，一時不知道是什麼滋味。老劉正要說話，忽然一陣吵雜的人聲和雜亂的脚步聲從走廊外傳了進來，接着聽見一聲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這聲音有如一聲春雷震撼着屋脊。跟着，是一聲清脆的耳光夾着怒罵：

“你他媽的，快變鬼了還叫什麼！”我們抬身一躍而起，心一陣收縮，呼吸都變得急促了。又是兩聲高喊：

“紅軍萬歲！”“毛主席萬歲！”這聲音更加高昂，象是巨人的怒吼。又是一聲清脆的耳光夾着怒罵：

“他媽的，打死也不怕的老共產！快把嘴給他堵住！”

聲音越傳越近，我們蜂擁着跑向房門，向鐵框外望去。從走廊的右面過來十多個荷槍的士兵，分排兩行，當中走着一個滿臉橫肉的軍官。軍官後面就是將要臨刑的我們的同志。瘦長的個兒，兩手被反捆着，長長的頭髮，蒼白的面孔，兩眼卻炯炯有神。他安詳地走着，不停地向走廊兩旁的牢房張望。他在向同志們告別，也用他那閃着光彩的眼睛鼓舞我們的鬥志。他是如何的英勇不屈啊！我們怀着崇高的敬意，一直目送着他走到走廊的盡頭。

我問老劉：“是誰？”

老劉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頭髮亂蓬蓬的，衣服撕的稀爛，認不出來了。”

我們緊握着拳頭，牙齒咬得咯吱吱作響，復仇的怒火燒着我們的心坎。我們恨不得飛身出去，三拳兩腳把那些殘暴的劊子

手打个稀烂，把这个世界捣毁！

看不见了，我们还靠着房门，想着他那双闪着光彩的眼睛。

“来，我们商量一下。”刘玉亭同志悄声说。

六个亲密的战友，坐在草垫上，象往常在队伍中开讨论会一样商量起来了。

“我们要作万一的打算，”老刘扫视了一下大家，“死，我们是无所惧怕的。说实话，闹革命就准备流血牺牲……”

“老刘，”老曾打断了老刘的话，“我们闹革命就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谁怕死，要干什么，你干脆说！”

“是这样：我们根据情况，看他们提我们出去过堂，还是枪毙，要是提我们出去枪毙，只要他们一来捆我们，那就跟他们拚了，还是在石洞里说的那句话：抓够本钱！”老刘最后那句“抓够本钱”说得斩钉截铁。

“要是拼打不过，被他们捆起来去杀，我们也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向刚才那个同志学习。死，也要死得英勇。”老曾补充说。

“那是一定要高呼的。不过，我们不但要在监牢里喊，还要在大街上喊，这样影响更大些。”我又补充了一句。

“咕咚”一声，门打开了。看守拿着锁和一串钥匙站在门口，后面跟着个持枪的卫兵。厨房大师傅提了一个木桶和一筐碗筷走了进来。放下东西，他捂着鼻子喊：“吃晚饭了！”随后，他划了根火柴，点上油灯，便匆匆地走出去。门锁上了。

大家爬起来吃饭。是什么饭啊，简直比猪食还不如。半桶



飯就全是水，盛第一碗時，要想舀着飯粒，就象海底撈月似的。六個人就給端來一大碗菜，里面是些蘿卜和蘿卜叶子。

廚房大師傅又捂着鼻子進來把碗筷木桶收走了。我們吃過飯後仍回到草墊上躺着。肚子嘩嘩直响，吃什么飯？水，灌滿了肚子。

豆大的燈光，象坟地里的鬼火一樣，屋子更顯得黑暗和陰森了。

“大家睡吧，太疲倦了。記住先前商量的事。”老劉小聲地說。

我合上了眼，但思潮象大海一般翻騰，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着：“死，我是不怕的。從江西出發直到現在，我已經死過幾次了。搶渡湘江幾乎葬身江中，那次負傷幾乎被飛機炸死，負傷以後幾個月之急行軍幾乎被傷口的疼痛折磨死，過草地吃野菜野草幾乎中毒而死……還有在槍林彈雨的战斗中，還有……。死，我是不怕的。但是，我又是多么想看到革命的勝利，我又多么想回到延安，再看到毛主席啊！……記得我參加紅軍時才十五歲，人還沒有槍高，同志們都笑我。以後，黨把我送進無線電訓練班學電訊，後來我做了報務主任、台長。黨和毛主席教導我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培養我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六、七年來，我一直遵循着黨所指示的道路前進！這是我所感到寬慰的，也是我引以為自豪的。但是，我為黨工作得太少了。我經常勉勵自己，為黨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我還年輕，我是——一定能夠做更多的工作的。……然而，現在我在敵人的監牢里……親愛的黨，親愛的毛主席啊！我絕不會辜負您的教育，我永遠要做黨的忠實的儿子……”

我輕輕地叫着身旁的玉亭，他在翻身，大概也和我一樣在想着共同的心事吧？

“老劉，老劉。”

“小黃，你怎麼還不睡呀？”

“老劉，我睡不着，說實話，死，我是不怕的，我都死過好幾次了。但是，我又想能夠回到延安再看到毛主席，再為黨為革命多做點工作……我又想要是看到革命的勝利，那該多麼好啊！”

“是啊，我也和你一樣在想；剛才那個被槍殺的同志也和我們一樣在想……你還記得那件事吧？我們三十軍的一個文工團在永昌，到部隊去巡回演出，走到一個村子里被敵人包圍了，他們只有幾枝槍，卻和敵人抵抗了整整一天，大部分同志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下，剩下幾個女同志，她們唱着紅軍的歌跳進了火坑……”

“老劉，我怎麼不記得。前幾天聽見敵人那個副官講的那件事，不也够英勇壯烈了嗎！那是我們總部女子獨立團的一個女同志。那個狗營長異想天開，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要逼她當太太，結果一個手榴彈和他‘結了婚’。”

“是啊，在我們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中，在紅軍里有多少這樣可歌可泣的故事，它將永遠流傳在人間！”

遠遠地傳來几声刺耳的尖叫，老劉憤怒地說：“敵人又在折磨我們的同志了！敵人是殺不完我們的。只要殺不完，革命就一定會成功，會勝利！”

“你說得對，共產黨員是殺不完的。共產主義傳到中國才不

到二十年，信仰它和願為它的實現而奮鬥的人就越來越多，敵人要想用‘圍剿’、屠殺手段是阻止不住革命力量的發展的。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不怕死的，前面的犧牲了，后面的又跟上來了，前仆後繼。只要有黨在，革命就一定會成功！會勝利！……革命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是要流血犧牲的。血，灌溉着土地，開出鮮艷的花朵，看到鮮花的人們會永遠記住栽種鮮花的人！”

一聲凶惡的喊叫，把我和老劉的談話打斷了。

“趕快吹燈，現在已經十點鐘了。”看守在房門上的鐵框口前叫着，“你們這些新來犯人，好好記住：九點吹燈，熄燈後不准再講話！”

老曾離燈近，翻身爬起來，氣沖沖地吹了燈。“你不知道我們沒有表嗎？狗爪子！”老曾噁里咕嚕地罵。大概看守沒有聽清老曾的罵聲吧，抑或是知道紅軍的厲害在裝聾，他看見吹了燈便夾着尾巴走了。

被窩睡暖和了，臭虫虱子從草墊里被子里接踵而出，象敵人一樣吸吮着我們的鮮血，我順手撚死了好幾個。這一晚，臭虫虱子咬得我們睡不安寧，大家連連翻身。

我和玉亭繼續討論着：

“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抓住了，可惜，黨又把他放了。”

“他答應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才放他的。”

“內戰怎麼現在還沒停呢？抗日也還不抗呢？”

“放蔣介石是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叫全國人民看看共產黨不記私仇，光明磊落，真心救國。”

“蔣介石是大流氓，說話不算話，我們會不会上他的当？”

“那怕他什么。只要全國人都知道我們真心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再打內戰，就死的更快！”

“他媽的，不是为抗日救國，統他媽的鬼！”

“是呀，我也这样想。”

这时老曾也醒了，插上一句：“他不願統，就再把他抓起来。”

长夜漫漫何时旦，在監牢里簡直是度日如年，盼着天明，又盼着夜晚：

白天不見太陽，  
夜間不見月亮，  
黑糊糊阴森森，  
簡直地獄一样。  
遙望圣地延安，  
默念亲爱的党，  
共产主义思想，  
永远閃爍光芒！

这几天，敌人天天瘋狂地杀人，有时一次就是十几个。敌人殘杀我們的同志都是在黄昏时候进行暗杀，他們的血腥屠杀当然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下昭告于老百姓的。入夜，常常傳來同志們遭受严刑拷打时凄厉的惨叫，这些声音象尖刀似的攪割着我們的心。

敌人的殘暴罪行是吓不倒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的志士，它只能使我們更加認清敌人的豺狼面目，激起我們強烈的斗志，抱

定为革命牺牲的坚定决心。

一天下午五点钟，房门忽然打开了。我们不觉一怔，因为照往常送饭的时间是六点，这出乎意外的开门，究竟敌人想干什么？门口出现了四个人，看守拿着锁，一个军法官挎着枪，满脸怒气，两手叉腰地站着，他身后跟着两个恶狠狠的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我们看见这种来势汹汹的情况，又想着这正是敌人经常杀人的时间，于是我们彼此望了一眼，暗示准备。

“快点出来，送你们到另外的地方去！”军法官气呼呼地叫。

“要到哪儿去？”老刘也气呼呼地问。

“这个你没有权利问，快点出来！”军法官怒气更大了。

我们慢腾腾地走了出来，注视着敌人。敌人没有捆绑我们，军法官领头，两个兵压后，走出了监牢。我们被送到军法处。一个穿便衣肥胖的矮个，大概比军法官官衔大点，他对我们说：“再晚几天，就没有你们的命，现在蒋委员长有令，叫把共产党都送到兰州去。明天，就由这个军法官送你们去兰州。”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军法官之所以怒气冲冲，原来他是不愿担任押送共产党俘虏的危险差事呀。

到了兰州，我们被押送到兰州以东三十里的孔心墩飞机场旁的一个集中营里。

这个集中营是陆军营房改造的。它用土砖砌成高大的墙围，能够容纳下一千五、六百人左右。大墙围里还有一个小围墙，军官队就住在里面。当时，被俘的红军编为两队，一个叫士兵队，

約有一千二百人，一個是軍官隊，約有一百三十多人。我和玉亭、俊英、庆良等六個人被編在軍官隊里。

這個集中營的戒備是很森嚴的。圍牆的四周裝有電網，牆高兩丈，牆頂上安有警鈴電網。儘管如此，但敵人对紅軍的干部仍舊害怕，又在軍官隊住的小圍牆的四角，修了小炮樓，架了機槍。儘管大門上了鎖出不去小圍子，不能和士兵隊見面，但是在那個圍子裡倒是允許在規定的時間內可以走動。

我們是進入軍官隊最後的一批，以後軍官隊就再沒有人進來了。記得，我們進去的第一天，一個挂着武裝帶的准尉官指定我們六個人住在東排最後一間只有八、九平方米，除了門之外，沒有任何通風透明的房子里。床鋪是離地面一尺多高，用活動木板架起的，上面放了二十多塊磚頭作為枕頭，此外，什麼也沒有。我們到後不到半小時，一個穿着破爛紅軍服，頭髮長得象個女人模樣的人來和我們談話：

“同志，你們是哪個單位的？干什么工作的？”

“這些事你用不着管！”我氣沖沖地頂了他一句。

“嗚，好厲害的小傢伙！象個紅軍樣。”他笑嘻嘻地說。

“你們從哪里來的？”他又問。

“從西寧來的。”玉亭回答他。然後他就走了。

我們六個人七言八語地猜開了。誰知道這個問“單位”問“工作”的是個什么样的人呢？我們怀着戒備，警惕着。

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們六個人在床上就這件事小聲地議論着：

“我看，軍官队这么多人，一定有我們党的組織，莫非来問我們的那个人，就是来跟我們取联系的。”刘玉亭首先說。

“这也有可能。不过，我們要提高警惕，謹防叛徒。”我接着說。

“小黄說得有道理。”庆良第三个发言，“当然，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你快說出来，吞吞吐吐的……”我不耐煩老曾“当然”說不出个所以然来。

“你怎么不讓人家考虑一下！”老曾有些生气，声音稍微高了些。

“輕一点。”玉亭看着老曾。“我們應該仔細对那个問話的人观察一两天，再作决定，我們也必須馬上和党組織接上头。”

第二天，我們暗暗地观察着那个人。看見他在同志間很活跃，对人很热心，个个对他都很亲切。显然，一个叛徒要在紅軍干部中有这样好的关系，那是办不到的。可以設想，我們的好同志，对叛徒除了横眉冷对、嗤之以鼻之外，不会有别的。后来知道这个人叫辛元林，两天来有空就和我們攀談，不过我們和他也只是作了平常的閑談，並沒有进一步深談什么。

在軍官队里，秦奇偉（总部的）同志是公开了身分的，其他的同志都沒有暴露真正身分。不說自己是參謀，就是文书；不是司务长，就是收发。秦奇偉同志公开了身分，其他的人还能隱瞞身分，我們断定这里面必定有党組織，秦奇偉一定是領導者，而辛元林一定是党組織的一員。

刘玉亭同志是宁都暴动过来的，自从离开左支队，他一直是我们的负责人。这几天，我们小组有什么事都是叫刘玉亭同志出面。

第四天，刘玉亭同志代表我们小组去开过一次会，回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和党支部接上了头，以后我们的联系人就是辛元林，刘玉亭是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和党支部联系什么，或是党支部传达什么都是通过老辛，党支部其他的成员，当时我们就知道了，但我们估计几个高级干部如方强、秦奇伟、徐立清等同志只要他们忠实于革命事业，必定是领导人。有了党的领导，就如孩子有了娘的带领，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许多日子来的焦忧疑虑都被这高兴的巨浪冲走了。

军官队在集中营里，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于是便展开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敌斗争。当时，所有的同志都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成为坚强的集体。

敌人在集中营里对待我们军官队，威胁和拉拢兼而有之，企图分化和瓦解我们。营里设有政治教官，管理军官队的这个上校是个特务。他常常给我们“训话”，大讲其什么“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只有一个主义，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伟大，共产党投降，红军改编，服从委员长领导”等等。对这些鬼话，我们都公开进行反驳，经常把敌人驳得哑口无言，狼狼收场。因为，军官队里有好多都是政委、部队首长、政治宣传干部，要说讲道理、讲政治、讲主义，敌人根本不在话下。每次“训话”的结果，都使敌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情趣。



記得有一次，上校給我們“訓話”，那是太有趣了：

“……兄弟我，研究過三民主義，也研究過共產主義，可是我……”上校裝模作樣地咳嗽了兩聲，“可是我就不信那一套！”

聽眾譁然，笑出聲來，大家在下面噤里古嚕地談開了。有的說：“他媽的裝蒜。前一天他才講過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今天他就打自己的嘴巴，他卻不信他的三民主義了。”有的說：“你看他豬八戒照鏡子——里里外外不是個人，他還研究過共產主義哩！”……

“你們笑什麼！你們吵什麼！你們要講等會兒講。”他吸了一口大氣，繼續講着：“我奉勸諸位！在患難之中不要相信主義，以後，唉，如果委員長准許你們回共產黨那邊去，唉，回去以後再去相信你們的主義也還不遲呀。”

“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我們管不着！我們相信是我們的事，你也不必操心。”大概是方強同志高聲地反駁。

“相信主義還有什麼這個時候信的，那個時候又不信的！”我們在下面吵成一片，頂得上校面紅耳赤，不住地揩汗。最後，還是不得不大聲急促地喊解散，他這個蠢豬好歹算找了個機會下了台階。

一天，支部獲得消息，國共已經談判成功，國共合作並建立了統一戰綫，而且西安有了我們的辦事處。由於這個原因，支部判斷敵人不敢殺我們，於是我們便利用統一戰綫的有利條件採取了公開的鬥爭。同時，支部也得到這樣的消息：我們被俘人員的伙食，是由延安出錢，黨和毛主席希望我們堅持鬥爭，爭取回

到延安去。支部决定从两个方面向敌人斗争：一是经常公开驳斥敌人“训话”，一是争取伙食自治，反贪污，改善生活。

不久，一次“伙食自治”的大斗争便开始了。

在集中营里，伙食是很坏的，跟我们在西宁监牢时的饭菜不相上下，一天两顿，顿顿清清荡荡，泥沙满碗，吃一顿饭把牙磨痛了还吃不饱。一天晚上，支部通知，决定明天整日罢食，叫大家坚持到底，并且组织了监察队。

第二天，吹吃早饭号了，同志们不是上床去躺着睡，就是到饭堂看看饭菜就往外走。这种意外的行动，敌人成了丈二尺的金刚摸不着头脑。管理军官队的那个国民党上校，大发雷霆，象一条疯狗似的跑到每个房门口狂吹口哨。他一边吹，又一边大骂：“真他妈的不想吃饭了……好，就饿你们几顿！”大家齐心协力躺在床上，谁也没有动弹，都冷冷地看着他的那副发疯、可笑的样子。

吹吃午饭号了，同志们仍然象早饭时那样，静静地躺在床上罢食。这个上校慌张了起来，如果真的这样罢食下去，被他的上司知道了，他的贪污罪就要被揭露，那他要受到责罚；如果这罢食风声传出去被延安知道了，向蒋介石提出抗议，那么这个有关影响国共合作的责任，他更担待不起，小则丢官去职，大则可能引起法律案件。所以这个上校才慌了手脚大声地喊：“司号兵，赶快吹集合号！集合，集合！……”

大家都没有吃饭。上校挨户催促集合，我们才懒洋洋地出来排队。上校按捺怒火，装着笑脸问：“诸位！两顿饭不吃，难道

不餓嗎？……諸位从前都是吃得好好的，为什么現在不願吃了呢？……唉，有什么不周到之处，那就請諸位指教。”

“伙食太坏了，吃不飽！”

“我們要伙食自治！”

“我們要自管伙食！”

同志們在队伍里此起彼落地連声大喊，簡直就象火山爆发了似的。上校有些害怕了，慌忙地說：“諸位！諸位！請靜一靜！既然是伙食問題，那很可以商量的，好商量，好商量。散队以后，你們派代表來談談——現在，解散！”

支部決定不派代表，要各組去一個人。我們小組刘玉亭同志去参加了“伙食談判会”。

我們提出关于伙食自治的两条意見：第一、既然国共合作，建立了統一战綫，国共两方面的軍官待遇應該一样，从現在起就應該按国民党最低級軍官的伙食費办伙食；第二、为了防止贪污伙食費起見，我們要自己买菜，自己上賬監厨。

“这不行吧？你們的要求太过分了，你們伙食不坏呀，兄弟我亲自檢查过的呀！”

“我們一天吃多少糧？多少錢？請公开算賬……”“如果不答应我們的要求，我們將繼續罢食，并派代表到兰州交涉。”

經過一番斗争，敌人考虑之后，怕事情鬧大，更怕把风声鬧到士兵队去，鬧出政治风波，除“买菜”不接受外，其他的全部答应。当然，敌人也是狡猾的，不答应“买菜”，是怕我們与外面取得联系；而我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条件，也正是想利用买菜的机

会更方便于联系，其实支部早就和外面建立了联系。

“伙食自治”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教育了同志们，只要有党的领导，大家的团结，斗争的决心，什么事情都会做成功的，都会取得胜利的。

自此以后，我们的伙食改善了，据说士兵队的伙食也较前好了一点。

在集中营里，除“伙食自治”斗争外，还有一次较大的政治斗争，而且干得很出色，对于看守我们的国民党的官兵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党支部获得了消息，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五月中旬要派代表来集中营慰问我们，只是不知道来的确切日子。支部很快通知了各个小组，准备进行欢迎，并决定向队长（国民党上校）提出请代表公开和大家见面的要求。

从知道党和毛主席要派代表来慰问的那一天起，同志们的心情沸腾了。大家盼望着时间快些过去，早日看到代表，刚一起床就盼望着赶快天黑，有时竟然不自觉地念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成语，就好象这些语句能够催促时间迅速消逝似的。大家一谈话，就兴高采烈地谈到代表来时，应该如何的热烈欢迎，喜形于色的愉快，大家好象忘记了这是个集中营了。我们的高兴、愉快使上校奇怪起来，他忍不住问：“你们究竟高兴什么？有什么喜事吗？”我们嘻嘻哈哈地回答：“伙食改善了，你说是不是喜事？”上校听了如此回答，便支支吾吾地走开了。

在五月中旬的一天，十一点多钟，党的使者——张女宾同

志(原来一方面军三军团保卫局长),在三个便衣特务的跟随下,坐着馬車来了(国民党方面故意不給汽車),随后国民党九十八师的一个政訓处长坐着汽車也赶了来。

由于我們不知道張代表到来的确切日期,所以未能列队欢迎。但是,張代表一来到,消息就飞快地傳遍了整个軍官队。同志們爭先恐后地蜂拥而上,把張代表团团圍住。千言万語,簡直不知从何說起,欢乐的眼泪夺眶而出,象是見着久別重逢的父母一样。旁边国民党的官兵看到这种場面很有感触,失神地呆呆地凝視着我們。

張代表走遍了每間房子,和每一个同志握了手,作了亲切的慰問,并且发給每人一块錢。在每給一块錢的时候,他总是亲切地这样囑咐:“这是党和毛主席給你們买針綫补衣服用的。”这是一句多么亲切而涵意深远的話啊。我們每个同志都十分理解,这是党和毛主席叫我們坚持斗爭,叫我們了解党的关怀和当时的困难。

在我們一致的要求下,敌人終于答应了召开欢迎張代表的大会。下午三时,欢迎会在軍官队的院子里举行了。

敌人害怕我們“鬧事”,調来两連人的卫兵,如临大敌,上着刺刀,架着机枪,密布在院子里的四周。講話台是我們用兩張飯桌并起来的。这里更是警卫森严,台前台后,台左台右,黑压压的站了一片,原来是他們政訓处长要講話的緣故。

主持大会的軍官队的上校队长宣布:“諸位!現在处长給大家訓話,請鼓掌欢迎!”

一陣稀稀落落的鼓掌聲，好象只有十來個人在開會一樣。那位處長講了一段話，很簡短十來分鐘就完了。我一心只盼望著張代表講話，對於他的講話我根本不想聽也沒有聽。我只聽見又一陣稀稀落落掌聲響起來，才知道他的鬼話講完了。

主持大會的人又宣布：“諸位！現在請共產黨的代表張先生……”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暴風雨般的掌聲象春雷震天價响，經久不息，簡直有如浪潮把這院子的墻圍都快沖垮了。

張代表的講話，已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但是，那次的講話給我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所以至今我還沒有遺忘。

張代表首先講到國家民族的危機，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東北、熱河想滅亡中國的事實，他高聲地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和全國各方面的愛國人士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我們堅決要求停止內戰，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為收復祖國的領土而戰鬥到底！”接着，他有力地駁斥了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謾言。他說：“有人想用槍杆子統一國家，這是不可能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槍杆子統一的國家。……至於有人說，共產黨沒有祖國，不要祖國，投靠外國，這只能說明他們顛倒黑白，造謠歪曲。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主張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同時又是愛國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的聲音越講越高昂，他說：“有人說，紅軍是‘土匪’，這就更是無恥謾言。紅軍是工农的子弟兵，來自人民，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紅軍是世界上最革命、最文明的軍隊，它有高度的政治素養，有

严明的纪律，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說紅軍是‘土匪’，可是这个‘土匪’不搶老百姓，专打日本鬼子和卖国賊……”張代表最后講到西路軍的失敗，他痛斥了不顧国家民族利益，不顧政治影响，只顧卖國求荣的国民党的罪行。……張代表又安慰我們說：“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了解你們，同志們非常关怀你們……”“你們到了兰州……承九十八师(国民党看守集中营部队)同仁們的照顧，我們很感謝。”

張代表講話剛一結束，一陣雷鳴掌声，席卷了整个会场，口号声此起彼伏：

“停止一切內战！枪口一致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我們坚决要回延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們对張代表的热烈欢迎，感动了敌人的官兵。散会时，我听见敌人的几个士兵在背地里感动地说：

“他們真齐心！到这个时候还心不死。他們共产党这样坚决，誰也沒有办法对付他們！”

通过欢迎張代表的大会，扩大了党的影响，并向敌人表明了我們坚决要回延安去的不可动摇的意志，确定了今后行动的方針。在張代表未来之前，党支部获悉要把我們送往南京的消息后，曾决定在押送途中举行暴动。現在，支部根据張代表講話的

暗示，为了統一战綫的团結，为了政治影响，决定了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支部研究了如何跑法，在什么地方跑最有利。支部考虑到：敌人从兰州押送我們到西安，途中必經平凉，而我們跑回延安也必須經過平凉，因此，平凉以北乖乖地跟着敌人走。同时，估計到敌人押送我們，由于部队防务的关系，不可能由九十八师直接送到西安，到平凉后就必定移交給平凉部队，再送西安。这是一个很好的逃跑机会，因为移交給另一部队，那个部队对我們不熟悉，摸不清我們的脾气。支部最后决定：服从指揮，不要个人行动，保證都要回去，并且再三强調，行动必須听从支部的指揮。我們的小組长刘玉亭参加了这次支部扩大會議的討論。他回来后，向我們一一作了傳達。

大約在張代表走后一个星期，我們就从兰州出发了。



## 脫險归队

从兰州到西安，敌人派了一个营押送我們軍官队和士兵队。

出发的那一天，我們多么快活兴奋啊！在集中营整整住了一个多月，簡直膩死了，再加上敌人那令人恶心的“訓話”，那更是膩上加膩。望眼欲穿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想到要回到延安，将要看到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将要看到我們亲密的战友，将要看到根据地和平幸福的生活，铁窗生活的一切辛酸痛苦都一扫而光。欣喜若狂的感情不可抑制，不禁手舞足蹈地高歌起来。虽然夏天的烈日当头，热风割面，灰沙刺鼻，但是大家觉得阳光温和，风为我們伴奏，灰沙为我們舞蹈。

延安哪！我們多么想念你啊！

从兰州到平凉共走了九天。一天，我們走到龙德县和尚鋪，士兵队的一个同志脫險后又被敌人捉了回来，打得遍体鳞伤，半死不活。那天，吃过午饭后，軍官队正整队准备出发，忽見几个敌

兵推推搡搡地押着一个血糊糊的人走到我們队前，后面跟着敌人的王參謀，滿臉杀气騰騰；两只血絲的眼睛象只饿狼似的恶狠狠地扫視着我們。我定睛一看，那个被押着的人，渾身抖动着，衣衫撕得稀烂，浸染着血痕，一張铁青嵌着伤痕的臉还不时冒出点滴滴的血水，他紧紧閉着双唇，橫眉怒目地瞪着王參謀。王參謀露出两颗金牙，凶神恶煞地对大家講了起来，他說这是一个士兵队的战士逃跑被捉回来的。他大声地問：“大家看应该怎么办？”好象他能够找到他所希望的答案——枪毙。这是敌人故意拖来給軍官队看的，他們想“杀鷄給猴看”，这批狗东西真是“蚊子咬菩薩”認錯人了。我們看見这个战士血糊糊的慘状，怒火早已不可遏抑，一听王參謀这样的問話，更是火上加油。刘玉亭同志首先站出来激动地說：“你們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已經不象話了，我們要求你們放了他！”接着，軍官队的同志一致高喊：“放了他，放了他！”王參謀气得臉色煞白，咬牙切齿地答不出話来，那个战士扫了王參謀一眼，然后轉过头来向我們点了点头，搖搖晃晃地回到他的队伍行列去了。

快到平凉前三天，我們路过华大岭，意外地遇到我們的一个同志。那天，我們到了华大岭正进入一个小店休息，忽然从小店的一角走来一人，呆呆地望着我們。这人蓬头垢面，面如蜡黃，两眼深陷，顴骨高聳，瘦得象一具木乃伊。他的衣衫襤褸，腰間系着草繩，怀中揣着一个半边破碗和几个山芋，脚上穿着两只不同样式的破鞋，拄一根木棍。

“是个讨饭的，给他一点钱吧！”老曾对我们说。那人呆呆地望着我好一阵。

“你们……难道……真认不出是我吗？”他有气无力地对我们说。

“你是，你是……”我惊奇地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然而我搜索了所有的记忆，也认不出他究竟是誰。

他没有再说话便哭了。

“啊！龔兴贵！”我们端详了一阵，齐声惊讶起来。龔兴贵原是一方面军电台的一个政委（现任解放军某炮校政委），我们都是长征的老战友。我们沿着记忆中老龔往日的模样，仔细地打量着他，才认出来。久别重逢，一种凄愴之感爬上心头，我一把抓着他也哭起来了。大家也都抱着痛哭了一阵。

“老龔，老龔，你怎么……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我擦着眼泪问。

“说来话长啊……”他抽抽啼啼地说不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接着讲述了他的经过：

“我没有被俘，一个人东奔西走、南跑北串地摆脱敌人的追击。几十天来为了不致让敌人发现，白天藏在石洞里、树林里、山坳里、破庙里，夜间赶路，朝着延安方向走。饿极了就摘些野果子，在地里挖几个山芋充饥，黄昏时才到人家讨点残汤剩饭。没有过兰州，在石洞寺附近的山上，病了一个多月，天天发高烧，已经不能说话了，眼看就要完蛋了。庙下面的几家群众知道我是逃难的红军，便跑到四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去买来一服药，当

晚吃了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子好些了。第二天一早，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亲切地对我說：‘先生，您快走吧！馬家的兵知道了就活不成啦！’我也想，不能死在这里呀！总得想办法过黄河。我鼓起勇气掙扎着站了起来，但身子軟搭搭的挪不动步子。老大爷看我往外要走，扶着我的身子說：‘先生，你慢点，我去給你拿点东西。’我摇摇头，沒等我說話，大爷便下坡回家去了。我拖着昏昏沉沉的身子一步一步、搖搖晃晃地往前走。好半天走沒百十米远，大爷回来了，他拿来一个能盛两碗水的沙鍋，一斤多小米，一盒火柴，象是父亲送別儿子似的囑咐說：‘路上不要喝生水，渴了用沙鍋燒碗水喝，想吃就放点米煮煮……。’我被大爷的慈善的心腸感动得只是流泪，咽喉哽咽的說不出半句話来。我扶着拐杖一天只走二、三里路。……你們看，”这时老龔撻起禪脚指着两腿說：“两条腿被狗咬得稀烂……今天，我实在走不动了……想不到碰見了你們。”他露出了一絲笑容，象是我們給他带来了生的希望。停了一会儿，他象是回忆什么似的，接着笑了起来：“我不仅吃野果子、吃山芋、灌山泉，我还……我还喝过尿哩。”

“喝过尿？”我們惊奇地問。

“是啊，喝尿还没有呢。”他望了望大家，很有风趣地講起来：“有一天到了凉州南面，正好走到敌人的堡垒附近天就亮了。再跑不成了，我就躺在沙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了起来，只留一个脑袋露在外边。火紅的太阳往下晒，沙滩的热气往上冲，热得七窍生烟，口渴得心都快燒焦了。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我就側着身子用茶缸把尿尿在缸里，閉着眼睛一口喝了。沒有經驗，第

一次的尿不好喝，又咸又苦，第二次有經驗了，抓了一把沙子進去，沉淀了一會就好喝啦……”老龔講完之後，嘆了一口氣。

我們的心情頓時沉重了起來，老龔的苦難和我們的鐵窗苦楚揉合在一起。想起老龔比我們更加辛酸的歷程，真不知用什麼言語來安慰他好。大家含淚相對，默默無言。

“喂，大家快脫件衣服下來，給老龔換了吧。”

老劉的話打斷了沉默，一時，我們都爭着脫下衣服給老龔換上了。以後我們又告訴了老龔支部決定在路上逃回延安的計劃，大家一塊走。

老劉馬上把老龔的情況報告給辛元林同志。支部決定，要我們負責好好地照顧老龔，把他帶回延安去。老劉去向國民黨營長交涉，要他增發老龔的伙食費，營長不增發，至於大家帶老龔走，他沒有反對。

老龔的兩腿稀爛，寸步難行，即使是站着也晃晃蕩蕩的，我們輪班架着他走。說實話，他若是不遇着我們，也就與世長辭了。

我們也碰到過與老龔“自願收容”相反的事。

那是我們在靜寧的石界鋪附近的路上，看見一個紅軍女同志，狀甚淒慘，和老龔差不多，她狼狽不堪地在道上走着。我們也象收容老龔一樣的勸她跟大伙兒一起走。不過，由於從前不認識就不便告訴她逃回延安的計劃。這個女同志不為困難所動搖，不肯隨我們走，甚至於認為我們騙她當俘虜，因而懷疑我們不是紅軍。的確，當時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我們是紅軍呢？我們只有紅軍軍帽徽，這帽徽我們還是珍貴地保存在自己的懷里，

这时为了証明是紅軍都拿出給她看了。但她仍然不相信，她誤會我們是劝她当俘虏，覺得这是对她莫大的侮辱。她带着胜利的微笑昂然地走了。这是一个多么頑强勇敢的战士啊。我常常这样想：有党教育出来这許許多多的好儿女，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到平涼是下午两点鐘了。果然，不出支部所料，敌人九十八师把我們移交給敌人四十三师。移交手續是在平涼飞机场办理的。士兵队只清点人数，軍官队就一个个点名交人。太阳火辣辣的，沒有一絲风，晒得我們头脑发昏，口干舌燥，想咽口唾沫都沒有，真把人都晒死了。移交完后，交接双方又哇哩哇啦地瞎講了一通話，直到日落西山才完。

我們两个队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敌人营房里。晚飯后，刘玉亭接到支部递来的紙条，上面写着“卧床不起”四个大字。我們七个人看了紙条以后，心里明白了，又兴奋又緊張，因为明天我們就有可能“不辞而别”回延安去了。我們推測了支部的意图，就是在第二天出发前，尽量拖延時間，以打乱敌人預定的行程，晚間最好能走到前不見村鎮，后不見屯子的路上，这样就容易脫險了。說真話，晚間就是紅軍大显身手的时候，用“一当十、十当百”来形容紅軍的战斗力，那是一点也不夸口的。

还未上床，敌人却傳來命令：“明天早上七点前吃飯完毕，七点半集合，八点鐘师长要来訓話。不得有誤！”

“誰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明天早上还是睡大覺。”曾庆良同志一边上床，一边說。

“对，老曾言之有理，照办，不睡死就行。”大家逗趣地对老曾說。

“別逗了。赶快上床睡吧，从今晚要睡到明天太阳照着屁股，你看这个觉大不大。”

老曾說得把大伙儿都逗笑了。

第二天，紅日高照，軍官队还在瞪着眼睛故意呼噜呼噜地打鼾声。集合号声和口哨声响成一片，营长臉紅脖子粗地一边跑一边罵：

“差十分鐘都快八点了，他媽的还不起床，哼……师长馬上就来訓話，你們安心給老子搗乱，是不是？哼……赶快起床！”

我們早就醒了，不过瞪着眼睛打呼呼，故意揉着眼睛，打着呵欠，伸着懶腰，慢条斯理地穿着衣服。

“赶快！哼，你們还象个軍人嗎？”营长喘吁吁地說。

“是啊，我們还象个什么軍人！”一个同志指着大伙儿七长八短、挽了疙瘩的衣服，慢悠悠地說。

“別廢話，赶快給我去集合！”营长象一头狼似的怒吼起来。

尽管他咆哮着，但他不敢对我們怎样，大概在移交的时候，九十八师那个营长告訴了他，軍官队是不好惹的吧？营长看我們穿上了鞋，又接着說道：“懶虫！太阳老高了还睡大觉，哼！”

“誰放屁啦，臭得搶鼻子！”刘玉亭一面捂鼻子，一面瞪眼看营长。

“我們不吃早飯嗎？”我橫眉豎眼地冲着营长問。

“訓完了話再吃！快点！”

營長着急地吹着哨子气冲冲地走了。大家慢騰騰地直到八点半才把队集合好。九点鐘師長坐着汽車怒气冲冲地来了。營長扯長嗓門高声地宣布：“現在，我們热烈地鼓掌，欢迎師長訓話！”接着他用力地鼓着掌。我們开玩笑似的也举起双手，“噼啪噼啪”几声，有如在拍打手上的尘土一样。冷落的掌声，使師長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难堪地开始“訓話”了。師長對我們大罵了一頓：“……共产，共产，这就是你們的下場……哼，你們共产，共什么鬼，倒共到我的头上来了……哼，你們这些亡命之徒……”这位師長姓郑，他的家在甘肃涇源，是大地主兼反动軍官，紅二方面軍把他的家产沒收分配給当地穷人了，原来他今天是来出气的。師長在上面講了几十分鐘，我們也就在下面罵了这个混蛋几十分鐘。我們吵吵嚷嚷的，只忙得營長猛吹口哨，喊：“肃靜！”“肃靜！”

師長“訓完話”后快快不快地走了。我們也要出发往西安走去，敌人仍旧派一營人押送。軍官队吵着要吃早飯，大家对營長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軟丟当。不吃飯是走不动的。”營長被吵着登打不开，只得派一連人留下看守軍官队，命令連長待吃过飯后立即起程赶上去，他自己帶了另外三个連押送士兵队先走了。

士兵队走后，我們开始弄飯吃。弄什么飯呢？敌人連長要我們买点鍋魁（北方叫“火勺”）燒点开水吃吃，快吃好赶路。但是大家吵着要弄好吃的。你一言我一語地鬧个不休。有人提議說：“我們南方人走到西北了，應該來点北方味，包饺子吃，大家



贊成不？”一致鼓掌通过，連长无可奈何，只得在旁边干着急。这一来，南方人包饺子一出洋相，会吃不会包。这一包，把上午时间全包了进去，十一点鐘，餃子才开始下鍋。

营长押送的士兵队已經到前面的四十里鋪了。营长在十二点打电话来催我們，那时我們正在吃餃子哩！营长不敢向前走了，只得在四十里鋪等我們。十二点半左右，我們才拖拖拉拉地上路。

太阳毒花花的，象盆火似的，晒得人的头脑发脹，睜不开眼睛。但是，我們一想到“卧床不起”的計劃已初告成功，大家都高兴得忘記了炎热，何况在路上还要繼續“卧床不起”呢！出平凉約有里把路的光景，方强等同志带头行动起来了，跑得飞快。其他的高級干部也开始行动了：

“报告，我要小便！”

于是跟上一个敌兵去麦地里看守着撒尿的。

“报告，吃过飯我还没有大便哩！”

于是又跟上一个敌兵去麦地里看守着拉屎的。

接連不断地报告：这个要小便，那个要大便，張三要喝水，李四要整理草鞋带。这样，前面带头走的，象溜小跑似的走得很快，后面的却象瞌睡未醒似的软搭搭地迈不开步子，加之許多“报告的人”，这样一来，一百多人的軍官队竟然拖了五、六里长，东一个，西一个，七零八散地把一个队攪得稀烂。我們每个同志的身边还带着一个“警卫員”——敌兵。这时，敌軍的連长找不着排长，排长找不着班长，班长也找不着兵了。这一来，我們便向“警

卫員”做开宣傳工作了，争取他們對我們的同情，使他們對我們疏于防范造成有利的脫險条件。

我和我的“警卫員”边走边閑扯了起来。

“老兄，你是哪里人？”我首先問。

“小弟我是貴州人。”他很有禮貌地回答。

“啊，我們原来是同乡呢。这真是他乡逢故人，太巧了。”我順口扯了上去。

“你也是貴州人嗎？在外面碰上一个同乡可真是不容易！”他想了一下接着說：“你講一下……”

“老兄，你是怎么当兵的？”我打断了他的話。

“唉，一言难尽……不瞞你說，是被拉夫拉来的……”

国民党的兵，一离开了官，什么心里話都倒出来了。誰都知道，国民党的兵大都是被抽丁拉夫强迫拉去的，也有的是在家乡被地主豪紳剝削得一千二淨跑出来当兵暂时混口飯吃的……他們在“国軍”里象奴隶一样，吃不飽飯，穿不暖衣，挨打受罵；打仗的时候长官就在后面，架起机枪，不准他們后退，去前面拚命送死。他的話匣子扯开了，就滔滔講个不停。他講到怎样被拉夫跑到西北来的，講到他們軍队里奴隶似的生活，并且十分感慨地講到他的家，想念他的父母兄妹。最后，他忍不住說了：

“誰願意和你們紅軍打仗啊……中国人为啥要打中国人……”

我順着中国人不應該自相殘杀，應該一致抗日的道理，宣傳了共产党的政策，宣傳了为什么組織紅軍，紅軍的性質，紅軍的

軍紀，天下穷人真正的敌人是誰等等。我也把一年前經過貴州所見貴州被軍閥地主剝削得滿目荒涼的情景，以談“故鄉”的口吻一五一十地講給他听了。他听得那样入神，两眼呆呆地直望着我，听到軍閥地主剝削穷人时，他也憤怒地罵上两句。我們的“家常”嘮得津津有味，彼此之間真象“同鄉”一样，他那一开始和我所表現的敌对情緒，都随着“家常”而消逝了。

太阳象带着針似的扎在我們身上，滾燙的灰沙不时被风吹起扑打着我們的臉，地上热气一股股地往上直冲，我們就象在蒸籠里。他就比我更热得难受了，扛着枪，背着子彈带，汗水淋漓，一摘下帽子，他那个光光的圓脑袋就象剛揭鍋的热饅头一样。沿途公路两旁的树蔭下，有卖茶水的小摊，也有一些小鋪，軍官队的同志們都带着“警卫員”喝茶水，抽香烟歇脚。

我和“警卫員”也走进一个小鋪歇脚。我用張代表发的那一块錢买了一盒香烟，买了两碗茶水。那时，我还不会吸烟，我除順手抽出一支吸着玩以外，一盒香烟都送給我那个“警卫員”了。我們正在吸烟喝茶，看見前面三三两两騎自行車的“商人”，向我們这边跑来，隔一会儿騎自行車的“商人”又回来了，来回地奔跑在西兰公路上，这种景象从兰州出发以来还不曾見過。忽然一个人推着自行車进来了，自行車后面綁着个提籃，里面滿装着鍋魁、香烟。啊，原来是个做小生意的。他进来买了一碗茶水，一边喝一边打量我們，口里不住地說：“好热，好热……”喝完水后，向我們兜攬生意了：

“喂，老总！买几个鍋魁吃吧，行路肚子餓得快……很便宜，

一角錢十个。”肚子的确有些餓了，于是大伙儿用張代表发的那塊錢买起鍋魁来。敌人的兵是沒有錢的，我們每个同志都給自己的“警卫員”买了两个。我們看見这个生意人有些奇怪，給我們軍官队同志拿鍋魁时总是翻下面的拿，你要一个他也是拿两个，甚至于还拿三个呢。每当递給我們鍋魁时，他还挤着眼說：“你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警卫員”兴高采烈地吃着鍋魁，这些情况他們是不曾发觉的。我接着两个鍋魁在桌下注意地一看，中間夹着兩塊錢和一張紙条。我心里明白了，赶快一看，上面写着“四十里鋪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軍偵察員”。我們真是高兴极了，吃着鍋魁更觉得甜了。偵察員同志讓每个同志都吃到了他的鍋魁后，才愉快地推着車子出去騎着走了。我們到四十里鋪后談起此事，差不多每个同志都得到錢和紙条。老龔得的錢比我們六个人还多，大家都笑着对他說：“你是病号，組織上特別照顧你啦！”

我們軍官队磨磨蹭蹭地走到四十里鋪，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要走，等我們弄过晚飯吃了后，那已是黄昏了，晚上在路上跑那才方便呢；不走，我們住下来半夜跑，那也很好。反正敌人營长已經听我們支部指揮了。一到四十里鋪，我們就吵着要弄中午飯，再繼續走。營长的眉毛皺起了大疙瘩，考虑了好久，才决定就地住宿不走了。

这个鎮上沒有營房，也沒有容納我們一千多人的監牢，于是只好分散住在鎮上老乡家。營长派了三个連分布在鎮的四周的麦地里警戒，一个連的两个排分布在鎮上街头，另一个排守營

部。

我們就象已經到了根据地似的，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在树荫下、屋子里开起小组会来，旁若无人地半公开議論着回延安的事。敌人发现我們有动静，但他們考虑的不是我們要跑，而是怕我們晚上暴动。于是营长为了防备起見，把分布在鎮上街头两个排都撤回加强营部的防守去了。营部門口架起了机枪，加了双崗，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党支部发现了敌人的警觉，为了避免无謂牺牲，晚八点鐘递出“按兵不动”的紙条。

这天，我們七个人的晚飯是我做的。我們住的是一間鋪面，沒有厨房，我跑到我們住宿隔壁一家姓郝的老大爷家借用鍋灶做飯。郝老大爷只老两口領一个不懂事的小孙女，儿子出外做生意去了。郝老大爷很和气，对于紅軍很有認識。因为他家是貧农，被压迫被剝削难以生活，儿子才出外謀生做买卖的，一提起国民党的貪脏枉法，他就恨入骨髓。我一面做飯一面和他拉起話来，我們越談越投机，越談越热火，就如同走亲戚串門一样。

“老大爷，……你老人家能不能行个善，把我們几个人藏起来？”我悄声誠恳地求他。

“藏起来！……”他惊慌地回头望了一下門，吸了一口烟，眉毛胡子挤成一团，滿臉皺紋象个皺皮柑一样，考虑着如何答复我的請求。

“有困难嗎？……那就算了吧。”

“不，不……我家太小了藏不住。”他又用力連吸了几口烟，接着用他那顛巍巍的两手緊張地抓着我耳語着：“紅軍同志，就

是我家下面不几步远有一間破窑，从前住了三家人，都逃荒走了，現在沒有人住，那里能藏人。”

“謝謝你老人家，我們永远不忘记你老人家的恩德……謝謝你，謝謝你。”

“不用客气，你們紅軍是帮助穷人的。去年你們毛澤东和刘志丹的紅軍还来过，买卖公平，講話和气，开仓济貧，对人都挺好的，都說从来沒见过这样好的軍隊，百姓都巴望你們紅軍赶快回来啊！”

我高兴地端着飯回去了。我把老大爷和我講的一席話都告訴給同志們听了。老刘快活地說：“接到支部通知跑的命令后，能跑就跑，万一跑不掉就藏起来。等敌人走了，我們再跑。”我們都怀着敬意談着可爱的群众，紅軍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八点鐘接到支部“按兵不动”的紙条后，我們把小包袱捆在腰間，和衣而睡，等待支部发出回延安的命令。

九点鐘，雷雨交加，暴雨打得房頂“扎扎”作响。就在这暴雨如注，电光閃亮，雷声隆隆的时候，敌人鎮外周圍的警戒撤回避雨之时，軍官队大都“逃之夭夭”了。雷雨大約整整下了两小时光景才停下来，我們都沒有入睡，正焦急地等候支部命令。

老等支部命令，仍不見动静，我們也昏昏沉沉进入梦乡了。

一觉醒来，正是午夜两点多鐘。焦急的心再也不能宁靜。我借着弄早飯为名壮起胆子出外察看，才发觉同志們大部分都走了，只有一小部分还在和我們一样“按兵不动”。我惊慌地跑

了回去，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有的埋怨支部不通知，有的催促快想办法，慌乱惶恐的心情使我们一时打不定主意。最后，还是由小组长刘玉亭作出了决定：

“我们还是决定走吧……现在还早，赶快把饭弄来吃下，马上走！”他看了看老龔，接着说：“老龔，你不要跟着我们跑，万一跑不动倒危险。你可以正大光明地走，敌人名册里没有你的名字，不敢刁难你。……好在，路途不远，身上也有钱，一、二天便可以走到游击区了。”

老龔怎么也不答应，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说死就死在一起，不愿离开我们。经过大家好一阵劝说，他才勉强地答应了。

赶快弄饭，谁知道吃过饭已是三点多钟，天快亮了。

“不能走，这太危险了，应该另外找机会。”馮生同志皱着眉头担忧地说。

“是啊，天快亮了，这怎么跑呢？”

“不吃饭就走多好。”老陈也不太同意冒险。

他们三个人一个一句地说起来。

“那我们先藏在破窑里，好吗？”

我和玉亭、俊英对他们说，但是他们却不同意。

“那么，你们是要和我们分手了？”我们三个人难过地问。他们没有回答。

龔兴贵同志急忙从衣兜里拿出昨天“组织上给他的优待”的三块钱说：“你们路费不够了，给你们路上用吧。”我们坚决不要，他却火了说：“这时候不用，留它揩屁股……”最后我们只得收

下了，說：“回延安后，还你双倍……”

“那么，我們就只好各奔前程了……不过，希望能在延安見面……願我們为了革命而永远前进！”我們难舍地握着他們的手，望着朝夕相处甚至于每一条皺紋都难以忘記的臉，告別了。

我們迅速地走进了破窑。有三間屋子，中間的炕已是倒塌得藏不住人了。俊英和玉亭钻进了右面屋的炕洞里，我一人钻进了左面屋的炕洞里。我藏的那个炕洞很小，剛好容納下我这个身材矮小的人。我的脚先进去，头后进去抵在炕洞口，然后用石板盖着洞口，只留了一絲縫，以作观察外面情况和通风呼吸之用。

我趴在炕洞里，足足有四个鐘头。炕洞小得不能侧一下身子，象受刑似的卡在洞里休想动弹一下。整个身子埋藏在厚厚的炕灰里，洞里热火火的，弄得我滿身大汗，衣服湿漉漉地裹着身子，簡直难受死了。

我实在憋不住了，又看这么长的時間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想来敌人早已押着来不及跑的同志走了。那时，我只不过二十多岁，还是缺乏斗争經驗的，我知道一旦离开了組織，离开了同志，将会寸步难行。所以担心着老刘他俩来个“不辞而别”，那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可怎么办呢？我决心爬出来，去找老刘他俩。奇怪，怎么爬不出去了？原来：洞口很小，两个肩头卡住了，怎么也出不去。因为我进去时脚先进去，两个肩头是順着进去的。我着急得什么似的，只得用肩头拚命地撞着炕洞的磚头。两个肩头撞烂了，血渗透了內衣。我顧不得疼痛，一个劲地猛撞，幸



好这个炕已經年久失修，終于撞下了几块磚，才爬了出来。一出来，我早已忘了肩痛，了望了一下，四周沒有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老刘他們藏的屋子里去，小聲地喊：“老刘，老刘！”我打开他們的炕門，嚕，原来他們两个居然呼呼地睡开了。

“快出来，还睡什么！”我悄悄地说。

“你怎么出来啦，敌人走了嗎？”老刘問。

“沒有走，我敢出来。”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

他們松快地爬出来了，这时我才想起来了肩痛。我正想向他們叙述炕洞对我的虐待，但一見他們面似鍋底一身黑灰的怪样子，我就笑了起来：

“看你們那副灶王样儿，”

“哈，你不想想你那副灶王样儿，你沒鏡子，不会尿泡尿照照自己，光說別人。”他們笑着指着我的臉說。

这时我才想起来，自己当然也和他們一个样儿，彼此又都笑了。

估計敌人是走了，但是我們不敢冒失，于是决定仍旧蹲在这破窠里，要是有敌人来就再钻进炕洞去，要是沒有敌人来，就在这儿等到黄昏时再走。关于什么时候走最好，我們也爭論过：半夜走，人們都睡了，夜深人靜，这是一个好条件，但是有狗吠，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安全，何况路不熟，黑夜难辨方向，而且天亮也赶不到根据地；黄昏时走最好，因为麻利利的，干活的人已收工往家走，人来人往的，既看不清人容易混，又不会引起狗叫和行人注意。三个人都同意天黑就走。

决定了走的办法，心里有了底，加上，这半天来也没有敌人来搜查，想起逃脱了虎口，很快就要回延安去，愉快心情油然而生，大家天南地北地唠扯了起来。至今，我还记得自己谈过一段有趣的笑话。我向他们津津有味地说道：

“……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也要享享福。那时，别的不谈，我非得盖一栋洋房不可，比兰州的洋房还要讲究。不过，我要自己设计……”

“嗨，小黄要自己设计小洋房，真了不起，土包子还懂什么设计哩！”俊英逗趣地说。

“设计有什么稀奇。将来还是土包吗？土能变洋，不懂变懂。我设计的没有什么稀奇，不过那门要特别讲究：脚先进去，头先出来的。”

“这真妙，你怎么想起的？”老刘笑着说。

这时，我才吐露真情，把我出炕洞的情况一一地讲了出来，引得大家哈哈直笑。

太阳快到落山的时候，我们突然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向我们藏的破窑走来。我们大吃一惊，正准备回炕去躲藏，忽然又听得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显然是个老人。我从门缝中看出去，原来是郝大爷拿着捡狗屎的夹子和簸兜向我们走来。我的心放下去了，我知道这是郝大爷装着捡狗屎来看我们究竟走没走。不然，哪有黄昏时才出来捡狗屎的呢。

郝大爷见着我们，大家又对他感谢一番。

“你们一天没吃没喝啦。”郝大爷说着便从怀里掏出几个

餅子給我們。

“郝老大爺不要麻煩了。”

“不，不，這是說哪裏話。”我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拿出兩塊錢給他，但他一再拒絕，最後我再三勸他，一定要他收下，不然，我們就不吃了。老人見我們這樣堅持，他才收下了。

吃了餅子，精神來了，也是應該動身的時候了。

“郝老大爺，我們怎么走？請你老人家指點一下好嗎？”

“怎么走，”他想了一下，毅然地說：“這樣吧，我走前頭，你們隔我遠一點，我帶你們一段，送你們出村子。”

這簡直是出人意料之外，老人家有多麼好啊。我至今還想着他老人家為革命而盡了自己一分責任。不知他老人家有沒有看見革命的勝利，要是他看見今天的新中國，他該多高興啊！

走了約五里路遠，到了一條小河边。老人指着河對岸的小山說：“上山後一直向北偏東走，就可以到鎮原，那裏有你們的人。”

“謝謝你老人家……”我們三雙手緊緊地握住老人的粗大的手，流下了感激的熱淚。

“趕快走吧，趕路要緊。”老人就象送自己孩子遠走逃生一樣，也滴下幾點熱淚。

我們依依不捨地向老人告別了。

過河後，在河边我們洗了黑臉，趴在河边，狠狠地喝了一陣水，就快馬加鞭走起路來。

天上沒有星光，分不清東西南北。走了二十來里遠，我總覺

得方向不对,我說:“老刘,錯啦。”他倆堅持說不錯。我也就以为自己迷了方向,乖乖地跟着走。

瞎摸了一个晚上,究竟走了多远,走到哪儿,我們一点也不知道。东方剛剛发亮,遇着一个下地的农民,一問前面,不觉吓得我們魂飞天外,原来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押送我們那一营的宿营地——白水鎮。我們回轉身不顧三七二十一抬腿就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口气跑了大約十多里地才到一个草丛里歇下来。

肚子餓得呱呱直叫,必須弄飯吃了再走。但到哪儿去弄飯吃呢?象我們这副长头发的样儿,挽起疙瘩的衣服,一眼望去就会叫別人吓一大跳。大路是不能走的,只得走山路,大房人家我們不敢进去,小房人家也穷得无飯可吃。我們忍住飢餓走着。忽然在一个山腰里发现一戶人家,从房子来看,有个几間,看样子是个不富不穷的中等人家。我們考虑了一下,这个时候男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屋里一定是女人和孩子。这又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想来不会碰見敌人。我們大胆地走了进去,果然不出所料,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媳妇在洗衣服,还有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

他們看見我們那副模样有些惊慌,但是看見我們既不搶东西又不打人,又感到奇怪。刘玉亭在門上望风,我和刘俊英进去請求他們做飯。我們文明而又和气的态度使他們恢复了平靜,他們很快地給弄好了飯。吃完飯后,我們先拿了一块錢給他們,随后,我們告訴了他們說我們是紅軍,又再給他們一块錢。

“你們是共产党的人？”老人好奇地問。

“是啊，老人家。我們是紅軍，紅軍是幫助穷人，爱国救民的軍隊，你們不要怕。”

老人連連点头說：“怎么不早說，我以为你們是坏人呢！”因为時間关系，不便多談，我們告別了老人，匆匆赶路了。

大概在午后三点鐘，我們走到了距鎮原几十里的地方。这已是根据地附近了。放眼一望，只見花紅、树綠、草青，沉甸甸的麦穗复盖着大地，农民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响起洪亮的歌声。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庄稼”的牌子，墙上大树上还貼着許多“拥护共产党”“停止內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等五色紙的标語，这是多么绚丽的图景啊！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洋溢着生命的欢乐和幸福的光輝。

“终于回来了……到家了……”我們眼泪花花地自言自语地說着。无限的青春活力又重新振作起来了。我們仰起了头，大踏步地繼續向前迈进。

又走了三十多里左右，忽然看見了我們紅軍的哨兵。他也看見我們了。奇怪，怎么不盘問我們呢？當我們走近他身旁时，他亲热地說：“同志，回来了，你們辛苦啦！”我們眼含兴奋的热泪望着他不住地点头：“啊，回来了，……回来了……”

哨兵不盘問的原因，我們立刻就明白了：那天晚上跑的，不是早就回来了嗎？当然，他們是早已知道了的。

走过哨兵不远的地方，看見了一架电台的天綫。

“小黄，你去看看有沒有熟人？”老刘他俩对我說。

“好，我去看！”

我边說边飞跑了过去。过去一看，迎面正碰着跟我一块学无线电的朱忠春和周維队长。

“老朱……老周……”我激动地叫喊。

“小黄，小黄，你回来啦……”他俩惊喜得說不下去了。

三双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股热流顿时傳遍了我的全身，悲喜交集的眼泪成串地流了出来，我說不出話来了。

霎时，电台的其他同志都聞声蜂拥了出来，把我圍在中央，問长問短的声浪把这間屋子快湮沒了。忽然一声喊叫：“快拿衣服来給小黄换了！”这声音宛如一道命令，同志们忙活开了：有的上来按住我就脫衣服，有的跑进屋內拿衣服去了，几个老战友，你湊一块，我拿一元馬上派人上鎮原去买牙膏、牙刷、手巾、肥皂……等，我象是第二次参軍，上下一身新。我这时才抽空說出老刘他俩还在外面，我要去找他們。“你怎么不早說呢！誰要你去，赶快坐下休息。”周队长回头叫几个同志：“你們赶快出去叫老刘同志他們！快！快！”一会儿，老刘他們被同志们拥着进来了，什么話都来不及說，也象我一样被按在那里換上了衣服。

突然，有人爭吵起来了：“不行，今晚一定住我們这儿，明天到你們那儿去！”“今晚到我們那儿住一宿，明天再到你們这儿来住不是一个样！”原来，另外一个电台的李景瑞同志也聞訊赶来，一进门就为我們的住处問題和周队长鬧开了。經過一番爭論，最后决定当天住周队长这里，第二天住李队长那里。

我們剪了发，洗了澡，为我們回来他們还特意杀了一口猪，为我們脫險归队庆賀了一番。这种珍貴的階級友爱，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我这支拙劣的笔簡直难以写出万一。

在世上再沒有比“階級之爱”更寶貴的东西了。

第三天，我們到了援西軍的招待所，看見軍官队的同志們大都归来。他們都換了衣服，修整了“門面”，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两眼閃亮着青春的光芒。这一夜，大家又互述苦难的历程，一直談到天亮。

隔了两天，老曾、老馮、老陈他們三人和龔兴貴也都先后胜利归来了。

七个长征的患难老战友全都脫險归队，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为了革命事业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忆长征 革命斗争回忆录

作者 =

页数 = 1 7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8 9 4 0 5 8 6 8